

133 1.01

K250.6

31

2:5

革命史资料

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一·北京



880402

革命史资料

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沧州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1981年11月第一版·198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¹/₃₂ 印张: 7¹¹/₁₆ 字数: 174,000
印数: 1—14,000册 定价: 0.86元
统一书号: 11224·7Z

目 录

峡江会议前后

- 忆一方面军总前委反立三路线的
斗争……………何长工（1）

在敌人心脏里

- 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
……………张执一（9）

陕北烽火……………郭洪涛（40）

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创和高祁家洼子会议——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神堂沟会议与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南下和红二十六军会合——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寺塬里会议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红二十七军的成立与第二次反“围剿”的初步胜利——周家硷会议与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和十五军团的成立——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及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 忆红十四军……………刘瑞龙（70）

- 铁窗夜长有尽时……………章夷白（83）

- 立三路线与行动委员会……………陈修良（109）

内乱之中

- 王稼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朱仲丽（118）

新决定全家搬出中南海——送书信得到了短暂安慰——
 是委员不知道中央全会——大字报进家办了展览室——
 恳请求翻译校对无人应——讲真理决不去诬陷同志——
 恶语狂激起满腔怒火燃——任批斗光明磊落心无愧——
 抢钥匙施淫威阴谋得逞——忆往昔林江康丑史重现——
 迫害深痛去苦来险身亡——被隔离任审查以心见诚——
 重相逢又疏散发配外地——返北京喜庆余盼国振兴——
 斥批孔心火起英魂永存

记二一二旅粉碎“十二月政变”的斗争

- 曹 普 (149)
- 红旗插上太原城..... 王紫峰 (167)
- 中央军委在上海情况点滴..... 黄 杰 (172)
- 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侯绍裘..... 胡耐秋 (176)
- 我见到的夏曦同志牺牲经过..... 饶 兴 (192)
- 阴谋与斗争..... 郑亦胜 (197)
- 前仆后继十六年
- 忆贵州地下党..... 秦天真 (205)
- 陈克寒同志早年革命活动片断..... 齐 速 (221)
- 同林彪反党集团英勇斗争的王诤同志
- 李而炳 (227)

专 访

- 是江青、康生一伙害死了他
- 王美兰谈李六如同志..... 黄霭玲 (233)
- 红九军团的建立与沿革..... 苏士甲 (237)

峡江会议前后

——忆一方面军总前委反立三路线的斗争

何 长 工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全国革命形势很好，农村革命根据地一块块的建立起来，红军和赤卫武装不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但是，正当革命事业向前推进的时候，党内左倾情绪又有了新的发展。李立三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了起来。在李立三同志主持下的党中央，于一九三〇



何长工同志在学习

年五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以及鄂省党代表会议。这些会议是为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当然它的形成也有其国际背景）作准备的。我以两重身份（红五军、鄂东南根据地代表）出席了这三个会议。会议精神集中到一点，还是“城市中心论”，提出了“打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左倾冒险口号。后来，在这条错误路线推行之中，不论白区党的组织，还是农村革命根据地、人民武装力量，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对此，广大党员、军民极为不满，由怀疑、抵制，走向反对。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二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围攻长沙的部队撤围，进占萍乡、株州待机。为此，在易家湾开了一个会，说服领导干部。这时，一、三军团给养业已告罄，所以把部队分散的萍、醴、攸三县（均是白区）之后，一面大力筹款，一面帮助地方党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织赤卫队。十三日总前委在株州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作出以一军团攻取杏安、三军团攻取峡江、新淦的决策。此后，红军分几路开回江西。我们三军团红八军进驻临江府一带，担任对南昌、九江方面敌人的警戒任务。这样，经过一系列会议，一次次的争论，总算把方面军从长沙周围撤下来了。

可是，事物总是曲折前进的。就在一军团于九月二十九日午后在宜春发出“照原计划拟于明（三十）日由此地（宜春城）出动，经分宜向杏安前进”的命令之后，当晚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同志，带着长江局的命令来了，准备说服一方面军党的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要方面军仍开回去打长沙。周一到宜春就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盛情款待，并同他进行了通宵达旦的叙谈，陈

述打长沙与打杏安的利弊，说明了第一次打长沙进而又出没站住脚的主要原因是群众条件不具备，红军在力量上亦尚不是中坚。第二次打长沙，还是缺乏群众条件，与敌方士兵的配合，成为单纯的红军攻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攻大城市的条件还不具备。……结果，周以栗同志被毛泽东同志说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和来此的使命，并完全接受了正确路线。

之后，在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支持下召开了袁州会议。因为当时我在临江府一带执行任务，没能参加这个会议。事后听说，会是在一个中药铺里召开的。会议决定了不再回师打长沙，也不马上去打南昌，而是要打杏安。此举有其战略转变中的重要一着，可使赣西南广大红区联成一片，而进一步“经营江西”革命根据地。袁州会议可以说是红一方面军反对“立三路线”斗争的一个前因，或者说是思想准备，因为第一次打长沙攻占了又放弃，第二次打长沙为时半月之久未克。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教员。它在启发、教育着一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明显地证明了“立三路线”是行不通的。

十月五日，一军团夺取杏安后，就地召开了杏安会议。之后，于十四日移师北上。在向袁水流域推进中，毛泽东同志在沿途主持召开了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除了开会，毛泽东同志还忙着找干部谈话，继续解决行动问题。

峡江会议和稍后的罗坊会议我参加了，由于当年戎马倥偬，事过境迁，时间久长，一些事情被易逝的岁月冲淡了，但有些事情至今印象深刻，记忆犹新。我记得总前委是十七日在峡江一个资本家的店房里召开的扩大会议，即峡江会议。对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均有决议。参加会议的总前委委员、军以上干部有：毛泽东、朱德、朱云卿、杨岳彬；一军团林彪、罗荣桓、

黄公略、蔡会文等；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邓萍（五军军长）、张纯清（五军政委）、我（八军军长）和袁国平（八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长江局代表周以栗；还有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一部分同志，如曾山、曾炳春、李文林等（陈正人同志参加没参加记不清了）。李井泉、古柏同志作记录。与会者一共不到三十人。

会议开了一夜。上半夜对所议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主要问题是：

- 一，是不是继续攻打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 二，过不过赣江及诱敌深入，也就是说反“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还是赣江以西白色区域。

会上毛泽东同志有个敌情报告，谓敌军罗霖、毛炳文、公秉藩、张辉瓒、邓英、谭道源等六个师的兵力开到南昌，向樟树蠢蠢欲动。正象毛泽东同志十九日在峡江致湘东特委信中所指出的：“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须联合的来进攻革命。”我们打长沙时，敌人曾嘲笑我们“小丑不能跳梁”，可是偏偏“小丑”抄了他们的老家，一举攻克长沙城，几乎生擒何健老贼。从此他们看到了红军的力量，不可小视。这时，蒋冯阎军阀混战已告一段落，他们的反动统治受到了革命的威胁，就勾结、就“和解”，妄图扑灭革命，对我们方面军渐成“围剿”之势。敌人磨刀霍霍要来进攻了，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当时的大前提还是敌强我弱，而具体看湘敌强，赣敌弱，我们要“诱敌深入”，以弱胜强。同时，西岸夹在湘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而赣江之东呢，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实行群众的

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实际上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经验的继续。

三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相反，主张不过赣江，还要打南昌、九江，怕丢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三军团的兵源在这一带的占优势，不愿意离开这里。一军团也有人认为，从秋收暴动时起，在赣江西岸就有基础，也不愿意离开这里。当时立三路线的盖子在下面还没揭开，打南昌，攻九江，取得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份的首先胜利的影响还严重存在，所以会上的争论，使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没为大家所接受。但是，毛泽东同志反复用敌情变化的事实，阶级力量估量的观点来分析形势，教育大家。

会议一直争论到下半夜才休息，这时三军团的同志碰了个头；我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这样坚持下去，势必一、三军团要一个河东，一个河西，就不能集中拳头砸向敌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权衡利弊，赣江西不如赣江东。滕代远、邓萍、张纯清也持有类似的意见。彭德怀同志也感到若再这样坚持下去，一、三军团有可能就要分处赣江东西，则不能集中兵力对付敌人，必然削弱了我们的力量。大家的思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只有袁国平同志思想还未全通。从整个会上看，我记得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意见一致，一军团的罗荣桓同志发言少，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的，地方上的几位同志很少发言，主要是“看会”，看军队同志的态度。曾山同志是很好的，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但是向南得路发展，打南昌、九江的问题还有少数同志并未得到完全解决，因而峡江会议还留下了这样一条尾巴。这反映在一方面军的历史文献和毛泽东同志的信函中。有等待大多数干部、战士觉悟之意，还有斗争策略问题在其中。

总之，我认为峡江会议是一方面军总前委反对以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我们党内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健康开始。

客观形势的急剧变化，给我们提出了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为继续解决立三路线问题，十月下旬的一天，我们一方面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罗坊的陈家闹召开了联席会议，这就是有名的常说的罗坊会议。记得峡江会议的参加者均出席了这次会议。彭德怀同志没参加。

罗坊会议是峡江会议的继续和具体化，具有集体办公会议的性质，把峡江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决定下来了。所以，这次会议不象峡江会议争论得那样激烈，但这次会议还是要割留下的尾巴。主要议题：

一、关于打不打南昌、九江这样的大城市问题。通过这段，大家认识到了敌强我弱的形势，总结了两战长沙的教训和建设根据地的经验，两相对比，感到再不能进攻中心城市了，很需要在吉安、南昌间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壮大革命力量，筹款、筹粮准备反“围剿”。因为敌情较前更严重，高安、上高一带有敌公秉藩、罗卓英两个师，樟树有张辉瓒师之两个团，丰城有邓英师，万寿宫有敌一师，彭启彪旅在南昌附近，许克祥开往湖口附近，谭道源师胡祖玉旅在南浔路，蔡廷锴、蒋光鼎两师已开到鄂南，湘敌李觉师进到袁州，计有敌军十万，开始向我前进。大家深感大敌当前，形势逼人，现在不是进攻大城市的问题，而是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了。从而纠正了立三路线打南昌、九江的军事冒险计划。

二、关于如何反“围剿”的问题。战场是摆在赣江以西。还是以东？是就地打还是后退打？在打法上是“诱敌深入”还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由于前一个问题得以解决，所以在作战方针上，峡

江会议提出的“诱敌深入”，这次会议就决定下来了。红军东渡赣江，退到根据地内作战，打破敌人的进攻，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

会议于二十六日通过并印发了《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简称罗坊会议决议），讲了几个方面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个决议，要历史的看，辩证的看。我体会的基本精神是反立三路线，这只要和立三路线的言行稍加对照就一目了然了，兹不赘述。至于文件中有些“左”的词句、“左”的口号，诸如此类，都是历史的痕迹，要历史的对待，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它的精神实质。同时要看到，一条路线、方针的转变不是一下子能够实现的，不是下一个命令、一个指示马上能够解决的。要团结大多数，尚要等待人们的觉悟。在罗坊会议前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还没传达下来，多数人不了解。其实还有个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纪律问题，尤其部队是打仗的战斗组织，更需保持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

罗坊会议的主要功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不打大城市，一个是“诱敌深入”，决定十一月一日发布命令过赣江。这不仅又回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来，而且在军事上由进攻转入积极防御，由游击战向着运动战转变。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从实际行动上就完全否定了立三路线，基本上解决了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方针、原则问题。这可以说是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的取得是与一方面军党的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和严守纪律，既反立三路线，又团结大多数的政策分不开的，也是和毛泽东、朱德同志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分不开的。

总之，袁州会议是反立三路线的良好开端，峡江会议开始转

变；罗坊会议是峡江会议的继续。文件和基本精神峡江会议就有了，罗坊会议正式形成。现在史料上和论文中一般讲罗坊会议的多，讲峡江会议的少，因为罗坊会议的招牌响亮一些，它把峡江会议的内容决定下来而且具体化罢了。

罗坊会议决定了过赣江的日期。我们三军团大概是在十月五日，在峡江与樟树之间的新淦过的江。过江时是架的双浮桥。毛泽东、朱德同志及总部是在峡江过的江。“文化革命”期间，我到峡江去落实峡江会议的旧址时，峡江县的同志还找了当年的一个船夫同我会面。他忆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峡江过江的情景。现在看来过江是正确的，是英明的，正因为这样才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苏士甲整理）

在敌人心脏里

——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

张 执 一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常委）

〔内容提要〕 一九四六年夏秋之交，中共中央成立上海局。上海局成立之前，准备上海武装起义，派遣干部潜入上海，开展秘密活动；上海局成立之后，建立地下上海市委、南京市委、台湾工作委员会、西南地下组织、外县工作委员会、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创办党的秘密企业，开展情报工作，以及以策反工作委员会进行大量工作：组织蒋军预备干部训练团、伞兵团、重庆舰、长治舰、空军二十余架飞机起义；组织内线提供蒋军海军部、汤恩伯军事作战计划、江阴要塞图、沪宁、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上海设防图及蒋军一个时期整个作战计划；组织蒋军首都警卫师及其它军、师多次起义；组织蒋军工兵团内线实行破坏滞敌退路、爆破江湾大型军火库，等等。

上海局成立之前

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我党在上海的领导机关，初名江（苏）

浙（江）委员会，“八·一三”后，改名为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参加者有张爱萍、刘宁一（负责工运，一九四三年去延安）、王尧山（组织部长）、沙文汉（宣传部长）等同志。刘少文系中调部系统派出的情报工作负责人，在沪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代表名义活动。省委增设军委，以开展上海地区的军事活动。张爱萍同志为军委书记，委员有余立金、陈家康和我。经军委同意，由我通过当时在上海很有名望的洪帮头子向松波（号海潜）的关系进行军事方面的活动，弄到国民政府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游击总指挥部委任的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的一个名义。第一支队长何行健（号天风），是一个旧军人，洪帮，他当时因要取得我方的信任以便进而取得向海潜的信任，表示愿意听我方的话（我是中共方面的人，何是知道的。何后来成为戴笠的人，旋又投降日、汪，被戴笠派人打死在法租界）。当时何某曾委任我为该支队部的上尉书记官，余纪一（当时名俞华）同志为中尉书记官，皆因病早离开。这时经组织允许，便以洪帮名义组成第三大队，发动各救亡团体、各难民收容所的青年去参加这支游击队，人数约五百多人，领到长短枪各二百五十支，每人还发了四个手榴弹。游击总指挥部派了一个黄埔四期生任中校大队长（我们不让他取得实权），党员王际光（任铁峰）任少校副大队长。中队长、区队长、小队长等，均由秘密党员或进步分子充任，可惜领导人员工作不得力，加上反动派的破坏，不久王际光擅自带同十多个干部离队潜逃，以致工作遭到失败。后来王际光跑到南京，我党驻宁代表团，加他以潜逃罪名开除出党。

随后，上海沦为“孤岛”。党的工作为了适应“孤岛”的斗争环境而有所改变。我要求去武汉工作，经党组织批准把我调至湖北，从事群众工作，旋被派往敌后根据地部队工作，即后来新四军五师，直到

一九四四年冬，五师负责同志派我代表五师和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去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当时驻皖东之盱眙县境内黄花塘，后移往天长县境内千棵柳与葛家巷）汇报工作，滞留在军部八个月之久。至一九四五年七月初，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我去上海和在上海附近活动之新四军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民政委陈伟达），研究如何组织地下军配合正规军“里应外合”地解放上海，并开展工商界上层人士的联络工作，这才重新接触上海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上海租界，由于形势突变，组织上把许多干部，分批撤退到新四军江南江北根据地。一九四二年十月，江苏省委机关和主要领导同志奉党中央电令撤退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淮南根据地（顾家圩子）。不久，江苏省委撤销，成立华中局城工部，任刘晓同志为部长，刘长胜同志为副部长。上海地下党就由华中局城工部来领导。上海地下党则以工委、文委、职委、学委、教委等名义，分别在学生、职员、教员、工人等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还有一些单线联系的党员同志和工作关系，分别由设在淮南根据地的城工部联系。一九四四年五月，党中央调刘晓同志去延安党校学习（也准备出席我党七大），城工部部长由刘长胜同志担任。

日寇投降消息宣布之当晚，中共中央华中局连夜召集高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当时华中局代书记兼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宣传部长彭康，城工部长刘长胜，和华中局、新四军各部门负责人。中共淮南区党委和新四军二师负责人谭震林、罗炳辉、刘顺元、方毅等同志也赶来参加了。这时我暂住在新四军政治部（安徽天长县汉涧镇附近的葛家巷），已经入睡，也被唤醒去参加会议（华中局和军部驻千棵柳，离葛家巷约二华里）。我不及乘马，急步赶到会场，

见灯火通明，人员众多，济济一堂。讨论了很久，当会议结束时，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通知曾山（可能还有副军长张云逸）、刘长胜和我留下谈话，宣布：华中局决定派我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代表名义，首先化装潜入上海，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接应新四军解放上海。次日，新四军军部任命刘长胜同志为上海市长，我为副市长，由新华社华中分社广播宣布，此项任命在上海曾以油印传单散发过。）新四军军部命令我调动上海郊区的新四军淞沪支队三千余人枪，分散地隐蔽进入上海市区，发动与配合群众举行起义。担任进攻上海的正规军，将是以粟裕将军为首的集结在天目山地区的新四军一师部队。据张承宗同志回忆，当时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同志曾宣布成立上海市委，由刘长胜同志任书记，委员有张执一、张承宗、陈伟达和陈祥生。我记忆不起此事；我只记得，在我临行前，由饶漱石召集曾山、刘长胜和我谈话，饶当众宣布，决定作为上海起义的领导机关为上海党政军委员会，以我为书记，参加者有陈伟达、朱亚民、顾复生（时为淞沪地区行政专员）等同志，其他人选俟起义时选择各部分起义领导者参加。根据华中局决定，起义成功后，即宣布成立上海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以陈伟达为总司令，我为总政治委员。

到沪后，我和同志们做好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但考虑到如正规军来不及配合，则起义不易成功。为此我曾用淞沪支队的电台发电向华中局并党中央如实地报告过当时的主客观形势（这是与当时华中局夸大的估计不同），认为如仓促发动起义，很难有取得胜利的把握：需要正规军迅速赶来，担任主攻，才能取得成功。正在这关键时刻，忽奉党中央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停止举行起义的电令，大意是：经中央过细考虑结果，认为目前起义对我们和人民是不利的，令即

照本日午电停止起义，保存我们在工人中及其他人民群众中的组织基础，以便将来能够进行民主运动。目前应组织工会及其他人民团体，迅速出版《新华日报》上海版及其他进步报纸刊物等。党的组织尽可能保存秘密状态，只有站不住脚的党员才准备撤退。不久又来有指示，大意谓当时党的战略部署是力争东北，巩固华北现有阵地，收缩华中，撤退华南，督促我们迅速中止起义。因此，我们在上海没有用“上海党政军委员会”和“上海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这两个名义进行活动。不久，毛主席由延安赴渝谈判。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在上海附近的新四军淞沪支队奉命随新四军浙东纵队（纵队司令何克希，政委谭启龙）北撤。为了在上海准备起义，有许多同志暴露了党员身份，部分革命群众也色彩很红，组织决定除将少数人调往其它地区或转移到别的战线上隐蔽外，大多数人均随军撤到华中解放区。

张承宗同志是和我差不多时间到达上海的，刘长胜同志则略迟几日到达上海。张最初的任务是协助上海党政军委员会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并负责联系上海各个系统的地下党，以统一行动；当起义计划停止后，张承宗同志即协助刘长胜同志统一领导上海地下党工作，我则配合长胜同志负责进行工商、文化方面的工作，并担任联系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一九四六年初，刘晓同志奉党中央之命从延安出发，经华中解放区回到上海，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改由刘晓同志负责主持，刘长胜同志协助他，从此我们就在刘晓、刘长胜二同志领导下工作。在这一时期，上海党领导机关，无任何名义，只是由二刘为领导核心，向华中局汇报和请示，党中央有时也直接指示上海的工作。

在此期间，有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我们通过吴大琨同志的关

系，派了几个熟悉英语的得力干部董秋斯、冯修蕙（冯志琼）、王楚良、沈知白等打入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组长科格斯，顾问吴大琨），起了特殊作用。国民党特务机关，如军统和中统，都把美特作为实际上的上级，遇事都向美特机关汇报，科格斯接到材料后，必交吴大琨同志审核，再交英文打字员冯志琼同志打字复印，分送美军驻沪头目和华盛顿。吴和冯均私下多印一份交给组织，因此国民党特务的动向，基本上我们都可以了解，甚至我们还可以通过董、王、沈等同志，伪造一些情报，以迷惑美蒋特务的视听。最成功的一次，为了从另一方面证明我党我军对当时国共和谈的诚意，我们经过一个佛教人士之手，送了一份情报给科格斯，以对外宣传的一些内容，以新四军政治部秘密训令的形式，科格斯如获至宝，直接密电报告华盛顿，而杜鲁门当时的作法是企图以和平手段来帮助蒋介石，逐步逼我军放下武器，在蒋介石尚未准备就有必胜把握之前发动大规模内战，因而据此发表谈话，特派马歇尔来华调处，企图来麻醉我们。事隔半年之久，杜鲁门才知道上了当，于是下令将科格斯撤职，永不录用，并解散了心理作战部上海组，吴大琨等同志亦被解雇。这个策略的成功运用，使美帝推迟原来的反动部署，我军赢得了半年左右的整训时间。

在这一期间，组织上还派原在上海工作的李正文同志参加民主建国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并联系两团体的党员孙运仁和进步人士孙起孟同志（以后入党）等。由于李参加了他们的领导核心，使两团体及其领导人黄炎培、杨卫玉、盛丕华等，在政治上基本上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进行民主活动的。李正文同志当时还参加了上海工商界“双周聚餐会”，其中有陈叔通、盛丕华、陈己生（以后入党）、包达三、张纲伯等上海工商界知名民主人士，开会经常在包达三

家。上海地下党通过这个会，和更多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发生了联系，在配合我党的政治主张上，在支援进步学生运动和营救工作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上海局成立前后，一方面继续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作隐蔽精干、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打算；一方面继续领导蒋管区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美帝“扶日”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推动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推派代表马叙伦与吴耀宗、黄延芳、盛丕华、张纲伯、包达三、阎宝航、雷洁琼（胡厥文也是代表，他因事未及时成行，次日才到南京）等人，还有学生代表陈震中（圣约翰大学）、陈立复（东吴大学）二人，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当这些人民代表在上海北火车站乘车时，党组织发动各界革命群众（原拟定五万人）送行，借以向国民党政府示威。刘晓、刘长胜二同志指定我为这次群众示威大会的秘密总指挥。这个秘密指挥部设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宝山路某弄堂内一个学生同志的家里，一幢三层小洋楼是独家住，我同几个同志（有当时在沪的冯文彬同志）隐蔽在内，各界都有负责同志作联络员，我记得张祺、陆志仁、张本、吴学谦等负责人都曾出场，参预指挥与联络工作。据各方面推算，参加示威的群众，远远超过了原来预计的数字，达到十万以上，我们为这个成就所鼓舞。正要开车之际，我还同冯文彬同志结伴到火车站巡视了一番，并上车到各车厢跑了一趟，我虽对其中的某些代表人物熟悉，为了不致暴露，只以目相示，未打招呼，即行下车，在拥挤的人群中离去。车开走后，群众还沿宝山路结队游行，到旧法租界胜利解散。当晚，听说以马叙伦先生为首的上海人民代表团在抵达南京下关时，被国民党组织的特务流氓痛打，群情更加激愤。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以三十万大军包围我中原解放区，当时中原局为了应付这一艰难处境，大量疏散非战斗人员，有很大一部分干部是化装突围经武汉、南京、上海、原计划进入山东、江北解放区，因不熟悉路经，因而留在大江两岸，我们组织了几个早从该地突围出来的干部，如余秉熹（安琳生）、高纯一（高树颐）、万流一、张翼（张南轩，又名张鸣皋）、甘学标、顾剑平、肖秀楷等同志分头去收容，并资助与护送他们到东北、山东、江北等地。党中央也在这时来电指示我们，组织专门接头点，以便掩护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诸同志化装经上海进入解放区。二刘将此任务交给我，因我是从原中原解放区早先出来的，同这些负责人都熟悉。这几位负责同志虽以后未经上海走，但我们也接待了数以百计的县团以上干部，其中包括王树声、严东山等军事指挥员。在刘邓大军南下进入大别山区之后，我们还派了不少从该地突围出来的干部，如谢威、李蒿田、李炳南、程全（已在游击战争中英勇牺牲）等，重返鄂东和洪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或地下工作，以积蓄力量迎接大军。我们同鄂东、鄂中军政机关取得联系后，还送了大批干部（青年知识分子）和物质（主要是药品，布匹）去援助他们。

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开展，国民党对苏北、山东解放区实行水陆封锁，那里迫切需要电讯器材及药品之类。我们选派了很多干部包括从解放区出来的干部，利用社会上可以利用的各种人（有商人，有走单帮的，有流氓，有亡命之徒）建立了水陆地下交通线，为华中、山东等解放区输送了大批物资和大批干部（有许多自备机帆船，分别到胶东半岛的石岛或石臼所、苏北的天生港等地，甚至经南朝鲜的仁川转道去东北解放区）。其中搞得很出色的有余熹秉、张翼、高纯一、肖秀楷、曹达（曹百年）、龚定中、陈波涛、高平

(戴利国)等同志。这几条水道地下航线，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时止，从未中断过。

为了便于收购药品及与解放区来人接头，我们指定了王辛南、王曦、杨宛青三同志，负责筹建联合药房，设在北京西路石门路口。店面为药房，楼上设诊所，分请上海当时几位名医(如王惠玉、林俊卿、俊华兄妹、邝翠娥等)轮流来应诊。董事长是当时基督教名人吴耀宗夫人杨素兰大夫，董事有名医王淑贞、苏祖斐、邝翠娥及王辛南、王曦等人，经理是杨宛青同志。还由王辛南同志负责，在已停业的进化药厂的基础上开设中华医药化验所，作为几个负责人碰头和掩护机要工作人员之用(当时作机要工作的朱志良和康志荣两同志均掩护在那里，作为中华医药化验所职员)。进化药厂是方行、王辛南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华中局指定他们负责向社会上募股筹建的，以备起义时机成熟时作为指挥人员先行潜入掩护点，所以我于日寇宣布投降时潜入之初就住在这里(地址愚园路愚谷村)。抗战胜利后，美货涌入市场，民族工业纷纷倒闭，进化药厂也于此时停业。

上海局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

约在一九四六年夏秋之交，中央来电指示成立上海局，指定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同志为上海局委员。刘晓任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刘长胜任副书记，主要分管上海工作。刘少文同志负责情报工作，钱瑛为组织部长，她原是周总理为首的重庆局(也称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这时重庆局已迁南京(可能以后曾称南京局)，该局是第一线，负责对蒋帮谈判和搞民主运动。上海局是第二线，负责领导蒋管区地下党。国共和谈期间，南京局和八路军办

事处同时并存，南京局是以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为钱之光同志）作掩护的。对外的公开名义是中共代表团。为了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两者分开，周恩来同志要钱瑛同志带着南方局党的关系，化装来沪与刘晓同志会合。钱瑛同志原来负责联系的地下党，主要在西南，即四川、贵州、云南以及武汉、长沙一带。因抗战胜利“复员”，蒋管区秘密党员的一些人分别到了京、沪、平、津等地。钱瑛同志所带来的这些关系，就逐渐同这些地区的党组织会合起来，四川、云南、贵州、武汉、长沙一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党的关系，仍由钱瑛同志联系，并一度分工负责学运工作。云南秘密党组织负责人是郑伯克同志，四川秘密党组织有几个系统，其中之一是马识途同志，湖南一带是周礼同志，武汉秘密市委书记是曾惇同志。当时中央来电中还提到香港分局（有人称华南分局），以方方同志为书记，尹林平同志为副书记，其它参加者有重庆、南京撤到香港去的党员，如章汉夫、夏衍、潘汉年及原在香港的连贯、梁广等同志。香港分局管辖广东（包括海南岛）、广西、云南、贵州、福建的一部分。在香港分局下，还有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副书记连贯，委员有许涤新、饶彰风、冯乃超、乔冠华、苏蕙（女）、林默涵等，这是第一线，半公开，领导的有新华分社和华商报。尚有第二线，名香港市委，是完全秘密的。书记梁广，委员不详。香港分局有的人称为南方局，这是不对的。我记得很清楚，南方局是指周恩来同志领导的那个局，不是指香港分局。中央曾指示香港分局必要时接受上海局指导，实际上上海局对香港分局没有指导过。因为香港分局条件好，电台和中央联系是畅通的，而上海局的秘密电台，有时不十分畅通。在上海局之下从事秘密机关工作的，除上述搞机要工作的朱志良、康志荣及郑慧英等同志外，还有钱瑛同志由八路军办事处带

出来搞机要工作的程浩夫妇。程浩夫妇初抵沪时，曾由我派他往台湾工作委员会搞机要工作，到台北住了几个月，电台仍未建立，加以人地生疏，生活又不习惯而返沪，住在复兴中路辣斐坊一个秘密机关（此处由万流一夫妇的住家作掩护，同时作为上海局负责人集会之用；上海局负责人集会或碰头的场合，除我和方行同志住的江苏路永乐村21号之外，尚有愚园路愚谷村、新闻路、巨籁达路、南市等处，房主均有合法身份掩护）。程浩夫妇的公开职业是“美而廉”旧货店〔由李星光、唐淑琴夫妇开设，在西门路（马当路口）〕的职员。从事秘密机关工作的还有张毅（刘晓同志的爱人）、郑玉颜（刘长胜同志的爱人）、王曦（我的爱人）三同志，她们分担几个负责人的交通，传递文件，接送电稿，以及掩护机关等工作。刘少文同志的爱人罗晓红同志，同我们工作不在一起，故不详；王辛南同志当时也住在机关内，做一些内勤工作；方行同志除做些工商、文化工作外，主要为上海局主管很大一部分经费的出纳工作。上海局还曾要王曦筹建上海局妇女工作委员会，并有一些女同志的党组织关系由她联系，但恐这一工作与秘密机关牵连，因此工作开展不大，委员会始终未正式建立起来。特别是她同李白同志的爱人联系，由她们交换秘密电稿，李白电台（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背景）被破坏，其爱人也受牵连，王曦就隐藏起来，在家负责收听新华社广播，记录有关内容供领导同志传阅。

大约是一九四七年初，组织上派万景光、冯修惠夫妇到香港建立了一个联络点（也称上海局香港办事处），负责掩护上海局领导人于必要时转移到香港暂住；有的从解放区派出来的人员，不便在上海和他们见面，就通知他们到香港去取得联系。后来上海局曾在港办过几期党员学习班，刘晓、刘长胜、钱瑛、马纯古、张祺等同

志分别主持过学习班工作；并有一部分干部和民主人士转送到香港联络点，然后由他们负责分批转送解放区。这个联络点做了很多工作，直到上海解放后才撤销。

一九四五年底或一九四六年初，华中局随新四军撤至山东，成为华东局。在华东局领导下，将原山东地区改为山东分局，以康生为书记。在新四军原来的地区，即苏北、安徽、徐州以南，成立了华中分局，由邓子恢、谭震林同志负责，分局下又设立了城工部，沙文汉同志为部长，吴宪同志为副部长，下面有几位科长，我记得有周克（负责宣教、训练工作）、唐守愚、刘加林（女，负责搞调研）、田辛（负责组织）、徐宏九（负责总务）等。不久，蒋介石部队重点进攻苏北解放区，该地为适应战争需要，精减机构，华中分局城工部除吴宪、田辛等同志留解放区另行分配工作外，沙文汉等大部分同志都派至蒋管区。刘晓同志找沙文汉同志商量，为了集中和加强领导，电华东局，建议把华中分局城工部全部工作关系交给上海局。经华东局同意，撤销了由沙文汉同志领导的城工部，沙本人则参加上海局工作（不是上海局的委员）。上海局开会时，除上海局的正副书记及委员外，张承宗、沙文汉和我也参加会议。

上海局领导的几个重要组织

1. 上海市委

为了集中力量搞好上海工作，在上海局之下成立了上海市委，张承宗同志为书记，刘长胜同志代表上海局负责联系上海市委，参加市委的有张祺、马纯古、张本、钱柏生（早期，以后调往台湾）、吴学谦、梅洛、陆志仁、马飞海（后期）等同志，在市委下面仍分

学生、工人、教员、职员、警察、科技等系统。

2. 南京市委

一九四六年初，组织上派陈修良同志去南京，建立南京市委，陈修良同志为书记，刘峰同志为副书记，参加者有朱启奎、王明远、史永、陈慎言等同志。刘峰、朱启奎同志原在上海工作。一九四〇年九月，成立南京工作组时派朱启奎同志任组长；一九四二年夏成立南京工委会，刘峰任书记，朱启奎任副书记。参加者有陈慎言、彭原。为整个南京党的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史永同志当时在南京市委搞策反工作，成绩卓著。他原名沙文威，是沙文汉同志的弟弟，文汉为老三，我们称他为阿三，史永为老四，我们称他为阿四，因而他又名阿史，后名史永。史永一直是搞情报工作的，初由张唯一同志领导，后张唯一同志将史永同志关系转交给刘长胜同志。

3. 台湾工作委员会

在上海局领导下，设有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乾（又名蔡前），一九四八年又派钱柏生为副书记（一九五〇年被捕，详情不悉）。一九四六年秋冬之交到一九四八年底，我曾代表上海局四次前往台湾检查与布置工作。早已打入国民党黄色工会陆京士系统的陆象贤同志，渐渐成了陆京士的红人，后被陆京士派往台湾，筹建“台湾省邮务工会”，陆象贤同志当选为理事长并兼任台湾省邮电工人补习学校校长。我到台后，曾多次与他联系。原在上海工作的党员积极分子计淑人（当时改名计梅贞）、钱勤（又名钱琴）两同志，因在上海身份有所暴露，组织上就调她们去台湾邮务工会工作，担任邮电工人补习学校教员，我曾和她们联系过多次。一九五〇年蔡乾叛变，她们被出卖而壮烈牺牲。幸陆象贤同志已于一九四七年底

撤返上海，免遭毒手。我在台时，还联系过在台湾省检察署任检察官的韩述之和在台南盐务机关工作的何世平同志，他们的关系均未交到蔡乾之手。韩是一九四八年间撤离台湾调回上海工作的，何于上海解放后间道返回上海。

4. 西南等地的组织

西南（即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一部分）、武汉、湖南等蒋管区，均分别设有工作委员会或市委。另外两个地区即福建省委（曾镜冰为书记，还有部分武装）和浙南地区（负责人为龙跃同志，有武装活动，党中央曾来电，令上海局派人去联系，但一直没联系上）。

5. 外县工作委员会

上海以外的江浙地区，于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成立外县工作委员会，组织上决定我任书记，林枫（本姓宋，王尧山同志之兄）任副书记，以后陆续增加委员王锡珍、周克等同志。外委所属的浦东、淞沪地区工委、浙东临委，分工由林枫负责，王锡珍协助，杭嘉湖地区的开辟工作，亦由王锡珍负责（后来该地区有零星武装，由方休同志，范精秋同志负责，仍由王锡珍联系）；当时杭嘉湖地区还有其他秘密党组织，也曾交给我手，我是如何处理的，记忆不起来了。由周克联系的有苏州工委（书记卜明同志，后为张云曾同志）、无锡工委（书记诸敏同志，后为高山同志、杭州工委（负责人柯里同志），昆山、青浦、嘉定等县的城郊工作和沪杭铁路沿线及从常州、无锡、苏州至上海铁路沿线的工作，也由周克负责，同时周还兼管浙东机要交通和动员上海人员去浙东工作。

一九四八年秋，组织上派卜明、诸敏同志支援浙东，诸敏任浙东部队政治部主任，卜明去金华、丽水一线应飞部队任政委，筹

建浙东第六支队。后来宁波、嵊县一带以及舟山等地，均划归外委领导，派员前往开辟工作，由周克负责联系。武装规模较大的四明山地区，则由外委直接领导，几年间发展到数千人枪，负责人是顾德欢（化名张×，我们叫他大张）和马青同志，马青任部队司令员。

是年秋组织上调王锡珍任策反工作，改派丁愉同志任外委委员，负责联系邻接上海的青、松、嘉、昆、太各县的工作。

是年十二月，组织上对外委成员的分工作了调整。由林枫任书记，周克任副书记，丁愉为委员，仍由我代表上海局领导外委工作。外委所属机构亦作了调整，杭州由林枫负责（解放前夕成立杭州市委，林任书记），周克分工主管苏、锡、常和江阴、常熟、吴江、宜兴等地区工作。上海周围六个县的工作，由丁愉负责，下设三个工委：昆山工委（王正同志负责），嘉定、太仓工委（徐加、李成吾同志负责），青浦、松江、金山工委（郑蔡贤负责），淞沪工委的浦西部分分别划归上述各工委。浦东各县，仍由林枫、王锡珍联系。至于浙东临委部队，组织上决定移交解放区华中工委。上海局曾向党中央建议以四明山为中心，成立浙东区党委，以我为区委书记兼人民解放军浙东支队政委，顾德欢为副政委，蒋立为政治部主任，李炳南为参谋长。党中央复电批准。我已准备动身前往，因谭震林同志来电，要求将浙东支队拨归华中解放军指挥部建制，经刘晓同志同意，他就通知我不要去了。至于浦东几个县的武装，主要在南汇以大团镇为中心，从事游击战争，是顾德熙同志负责，他是顾德欢的弟弟（我们叫他小张）。另外太湖一带也搞起了武装，但少成就。外县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方针，是搞武装，从事游击战争，以扰乱敌人后方；并在一些点线上发展秘密党组织，积蓄力量，以迎接解放大军渡江。

6. 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

在上海局领导下设有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我是书记，沙文汉为副书记，委员人选始终没有明确。我和沙的分工是：我着重从事工商界与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沙着重从事文化宣传工作。记得在这个委员会下面，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有梅益（不久，梅调南京中共代表团为发言人）、唐守愚、姚溱、李纯青（原在《大公报》任编委，一九四六年入党，对上海新闻界和台湾上层人士开展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董秋斯、吴天、陈白尘、鬲斯熏、杜国庠、姜椿芳、陈虞荪、陈向平等同志；工作关系有许广平、周建人（以后二人均入党）、宦乡（一九四八年宦任《文汇报》主笔时入党）、马叙伦、郑振铎、张志让、沈体兰、吴耀宗、张明养、李国豪、孙起孟（李、孙以后均入党）、曹未风（一九四八年入党）等人。在我党的推动下，这些进步教授组织了“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大教联”的核心骨干，是张志让、沈体兰、蔡尚思（一九四七年入党）、郑太扑、吴泽、曹未风、刘佛年（解放后入党）、潘震亚、马寅初等人。李正文同志因经常参加“大教联”的工作，而成为该团体的骨干。该会活动方法除了在文教界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外，还常用签名方式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声援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唐守愚同志还以党的面目联系过吴有训（大夏大学教授）、夏坚白（同济大学教授）、廖世承（光华大学教授）。当时党组织还利用“合法”关系，创办报刊。报纸有《联合日报》、《联合晚报》（两报的经费是上海局经我手支出的）。派王纪华（王文清）为发行人（可能是总经理），王的组织关系属上海局系统；编辑方面负责人为刘尊祺（可能是总编辑）和陈翰伯，他们的组织关系属南京局系统。其他如郑森禹同

志和另几个参加编辑工作、发行工作同志的党组织关系属上海局系统。还有名记者陆诒参加采访工作，他同我们和八路军办事处都有联系。因此，可以说这两个报纸是南京局和上海局合办的。刊物有《文萃》、《文摘》（是姚溱、陈虞荪、陈向平等同志负责；孟秋江同志当时是我党情报系统张唯一同志下面的党员，也曾参加过《文萃》和《文汇报》的工作）、《消息半周刊》（编委有夏衍、梅益、金仲华、胡绳、姚溱、方行等、经费由贾进孝同志提供）、《现代妇女》（主编是曹孟君同志，负责人是胡绣枫同志，实际编辑是陈蕙瑛同志）、《真理与自由》（陈乃昌同志主编，编委有李纯青、李正文，实际编辑是蔡仪）、《经济周报》（由吴大琨、谢寿天、李正文、吴承禧等负责创办，吴大琨、谢寿天、李正文、吴承禧所筹措的资金，实际上是党组织拿出来而由他们出名的。其中有一小部分是谢寿天和吴承禧经陈伯流（金城银行职员）活动到周作民捐助的）、《新文化半月刊》（创办人为方行同志，主编为周建人，实际编辑先是方行、李正文同志，继而是戈宝权同志，编辑有沈明钊同志，发行是方行、陈波涛两同志负责，一九四五年十月至十二月）和其前身为抗战期间出版的《学习》半月刊（主编张钢、韩述之，编委有姚溱、方行、范乘彝等）。此外，接受我党领导或尊重我党意见的报纸，有《文汇报》、《时代日报》等，刊物有《时代周刊》（《时代日报》和《时代周刊》是姜椿芳同志通过苏联商人名义办的。《时代周刊》以后改为《时代半月刊》。姚溱同志协助撰稿，著名军事评论家“秦上校”、“萨利根”、“马里宁”均是姚的笔名）、《中国建设》（是黄炎培先生属下王良仲出资办的，高祖文为主编，姚溱参加编辑）、《展望》（亦属黄炎培先生职教社系统办的进步刊物，杨卫玉任主编，实际编辑是王元化同

志)。

从事工商界统战工作的，有谢寿天、方行、梅达君、万景光、陈巳生、艾中全、张锡昌、金瓯卜、曹宝贞、张纪元、邝日安、王伟才、陈邦识、范秉彝等同志。从事工商界上层统战工作的还有罗俊（当时是中国银行副经理）、陈维稷等同志，其中有些关系分工由唐守愚同志联系，或一度去联系过。还有一些上层统战工作关系如黄炎培、杨卫玉、吴觉农、严景耀、雷洁琼、王良仲、丁贵堂（海关负责人）等，有时亦由唐守愚同志以党的面目去联系过。自抗战初期就一直同我党有联系，对我党工作有过较大帮助的杨显东（一九五六年入党）和孙耀华当时也同我有联系，接受我们指定的工作。从事上层统战工作还有蔡承祖、何康、田绥祥、史林峰（当时名史近愚）等同志。另外在浙江省长期任国民党政府温州地区（后调丽水地区）行政专员的余森文，诸暨县长祝更生，海宁县县长王××（忘其名）都同我党有关系。唐为平同志曾被派到伪温州专署和海宁县府去任联络员。上海市榆林区长顾叔平，是秘密党员，借其伯父青帮头子顾竹轩的青帮势力竞选为区长的。还有韩述之同志，于一九四二年夏秋间撤退至淮南根据地，后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于一九四六年春返沪，因他与方行同志曾在公共租界法院任过职，经组织上决定，先派方行同志打进伪上海高等法院暂且任职，探明伪法院人员对韩述之同志的真实行踪，并没有人知道，即派韩打入伪上海高等法院任书记官。他毕业于上海法学院，入党时化名张钢，之后转到台湾，取得检查官资格，旋仍回上海，在伪上海高等法院任刑庭推事，对掩护我领导机关和进行营救被捕同志，起过很好的作用。

上层统战人士对党有重大贡献而值得介绍的，有王绍鏊、何

遂、董竹君、徐伯昕（秘密党员）和赵朴初等人，他们均与我党有较长的合作共事关系，运用各自的社会身份，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积极帮助我党开展工作。

王绍鏊，江苏人，参加辛亥革命，作过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和道尹，反对曹琨贿选，南下与孙中山合作，在“九·一八”事变后反蒋，遭蒋逮捕，出狱后即与我党接触，帮助我党工作，接受张唯一同志领导，并掩护张进行工作。我在抗战前即同王相识，在解放战争期间，经张唯一同志同意，由我和他联系，他积极与马叙伦、严景耀、雷洁琼、郑振铎、盛丕华、黄延芳、陈已生、徐伯昕、张纲伯、赵朴初、冯少山、林汉达、包达三、柯灵、唐弢、冯宾符、梅达君、段力佩、葛志成、张纪元、蔡尚思等人开展民主运动，在一九四五年冬成立民主促进会时他们大都是该会的发起人或主要负责人。对进行反对内战，要求民主与和平，该会是有贡献的。

何遂，福建人，出身保定军校，曾任西北军系统孙岳部参谋长。在蒋政府长期任立法委员，抗战初即与我党发生关系，他的三子一女一媳（三个儿子是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震），均为我党地下党员。他在旧军政界的关系很多，我经常与他接触，运用他的关系开展工作。蒋军现役军人吴石，就是通过他的关系，为我方工作，后被蒋帮杀害，是革命烈士。国民政府盐务总署长缪秋杰系何遂先生好友，且系儿女亲家，何常运用缪的关系协助我们的工作。

董竹君，出身贫寒，为辛亥革命时四川督军夏之时的家室，婚变后到沪，后经营“锦江饭店”。早在一九三〇年前即与四川逃亡来沪的革命知识分子曹荻秋、陈同生、李一氓、李初梨、李亚农、李亚群等同志相识，他们运用她的特殊社会关系为掩护，从事党的工

作。她并从经济上接济革命人士（如宋时轮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从广州出狱后来到上海，经人介绍到董处，就曾得到接济）。抗战快要结束时，解放区派田云樵同志，同她联系。我在一九四五年夏秘密赴沪时，华中局即指定我与她接触，领导她为党工作。她曾出资创办美文印刷厂（总经理为任百尊同志）和中国文化投资公司（总经理为胡国城同志），印刷秘密书刊，并创办锦华贸易公司（总经理为刘逊夫同志，在台湾设有分公司），为掩护我同志出入台湾提供了交通便利。她还经常资助党的经费，对党的工作帮助较大。

徐伯昕，抗战时入党，为秘密党员，生活书店创办人之一。抗战后该店由沪迁往大后方，日寇投降后，在上海恢复营业，党由我经手给予黄金一百两，资助他更大规模地开展营业，曾聘请胡绳、史枚等同志为编辑，出版《民主》周刊（郑振铎主编）等进步书刊。还运用该店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掩护我党工作。

赵朴初，佛教徒，抗日战争时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简称“慈联会”）负责难民收容工作，先后共收容数十万人。他把难民中青壮年和少年分别集中在几个收容所中进行教育，动员他们参加抗战。当时收容所很多工作人员是我党秘密党员。我国军队自上海西撤后，上海附近地区游击战尚未开始前，曾有一批优秀青壮年和少年难民连同一批工作人员于一九三八年由“慈联会”租了一条英商轮船，由上海送往温州转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为新四军增添了一股骨干力量。这件事是赵发起，得到我党的同意和支持做成的。早在救亡运动之初，我们就同他合作，抗战胜利后，我们运用他的佛教徒身份和社会关系，开展和平、民主运动，很有成效。尤其是一九四六年上海国民党警察局，在街头巷口普遍设立了“警亭”，以侦查住户的动静，为了上海局负责人的安

全起见，赵朴初和王辛南同志出面，在杭州凤林寺开设了“凤林医院”，以备必要时有的同志可转移到该处，用“养病”为掩护，以策安全。一九四八年夏天，我们从内线情报得知，上海警特机关将在全市清查户口，我们得赵朴初介绍，到杭州西湖净慈寺作客，同行者有刘晓、刘长胜、张承宗、方行和我五人，方行负责对外，我还带有六岁多的女儿张纪生一道。因暑天很少有人去西湖旅行，我们佯称刘长胜同志是山东土财主，从未到南方，我们是上海几家商行老板，特意陪他来游西湖的，整日在寺内打扑克或搓麻将牌为掩护，实际是开会讨论问题或学习。

向松波（号海潜），湖北人，以帮会（红帮）身份，追随孙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倒袁（世凯）、护法等运动，失意后长住上海，成为长江一带红帮领袖（五圣山的山主），同我党从十年内战起就时断时续地发生接触。抗战结束后，又到上海从事帮会活动，我取得上海局同意去找过向谈话，要他从旁协助我党工作，至少要做到不危害我党活动，向都同意了。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军统为了利用帮会来破坏当时工运、学运及革命群众的反内战、要和平、反饥饿运动，约请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向海潜、范绍增等人共同组织“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我们通过向海潜以及大小帮会人物的关系，进行对帮会的争取与瓦解，做到了一向反动的帮会力量不为敌特所利用。这一工作是起到一定作用的。田云樵同志在这一工作中也是尽了力的。

以上关系主要是由我联系的，有时我因工作需要到台湾、香港或杭州等地，曾一度交沙文汉或唐守愚同志去联系。初时我着重外县工作，以后则着重策反工作，对于文化宣传工作，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由沙文汉同志去做的。至于公开的民主运动，都是办

事处即思南路周公馆，由周恩来同志领导进行的。在那里公开以党员身份进行活动的有：王炳南、陈家康、章汉夫、许涤新、龚澎、乔冠华等。在有些工作上，上海党和办事处难免有交叉，如上海党在胜利之初，就搞民主党派工作：如民盟、救国会、农工、民革、民建等，其中不少成员都和上海党有关系，甚至象民进、台盟和民建上海分会中的许多人，原来只同上海局系统有工作关系；又如妇女联谊会，上层大多是办事处系统联系的，基层群众和活动骨干，则系上海局系统联系的。后来的公开活动，一般均由办事处去搞，但很多活动经费则由上海局支出的。我们的经济来源除党办的几个大企业赚的钱外，宋庆龄先生也捐助过一笔巨款；同时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所捐给解放区的衣物药品，也是交给我们代运到山东解放区的。为此，山东分局黎玉同志曾送了一笔巨款给上海党。当时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协助宋庆龄先生工作的，有美国进步分子谭宁邦（Januentum），和德国进步分子安娜王（中共党员）及廖梦醒、俞志英（廖、俞均系中共党员）等女同志。有次宋托廖梦醒同志亲手交给我美钞三万元，至于衣、药等物品，因数量太大，次数又多，恐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是由俞志英同志经手交给赵朴初居士主持的“佛教少年村”（收容贫苦无依的孤儿组织）代收，然后分批交给我们（有时是由上述的联合药房，或由下述的瑞明公司去取）。福利会也捐助过救济物品给佛教少年村。这位我党多年的好朋友赵朴初居士“公私分明”，一丝不苟。在解放后的“三反”运动中经过严密清查，赵一尘不染，生活仍清贫如故，获得了已故的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多次称赞：“在旧社会从事救济工作的，如赵朴初这样一尘不染，真是难得，可以重用，值得信任。”

7. 党在上海创办的秘密企业

抗战期间有广大华行，卢绪章、吴雪之、杨延修等同志负责，先后由刘晓、刘少文领导或联系过。党交我经手创办的，有东方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糖业、渔业、运输等公司，还在广州、台湾和香港设有分公司（谢寿天、梅达君、方行、张纪元、万景光等同志负责）。瑞明股份有限公司（何康、方行、邓裕民、缪希霞、缪蔚君等同志负责，刘长胜同志在该公司任董事，作为他的公开社会身份）、安通运输公司（陈已生、赵朴初、范秉彝、张××等负责）、关勒铭金笔厂于一九四六年底起，由陈已生出面收购其股份，由陈已生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晓同志为副经理，作为他的公开社会身份。另外由陈已生、谢寿天等同志出面，代表党投资的有“大安”、“天一”等保险公司。

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还有两个秘密系统的工商业，一为华东局财委曾山同志派徐雪寒同志驻沪负责的合众贸易公司系统（石志昂同志为总经理），还开设了两个钱庄：一名“同庆”，董事长是蔡叔厚，总经理包序传，副总经理陈其襄（中共党员），经理张又新；一名“鼎元”，总经理为许振东。另为华中分局财委派出的忻元锡同志领导的大华公司系统，大华后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忻幸而脱险。上海局曾派我去联系过徐雪寒同志，忻元锡同志的系统曾来找我们，我们派方行同志去联系过。苏中党曾有一笔巨款，由忻送交上海党，经方行同志往取面交给刘晓同志（以刘晓同志的亲笔收条交忻）。后来忻提出要求，要上海党派个干部到该公司任会计，组织上即派郑惠英同志前往，该公司遭破坏时，郑也被捕，坚不吐实，约半年后经营救获释。

8. 党在上海的情报工作

党在上海的情报工作，除办事处方面外，尚有刘少文和潘汉年两个系统，张唯一同志主要是协助潘汉年的工作，有时也协助刘少文同志的工作。另外有龚饮冰、吴克坚、吴成芳等同志，他们则分属于以上两系统，其中吴成芳系统曾交给我去联系过，吴的方面有王月英、陈来生两夫妇，他们的工作很有成绩，曾多次送来重要军事情报，还策反过几架飞机起义。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工务局长的赵祖康先生，就是同王月英、陈来生同志有联系的。在解放上海之际，赵祖康经上海党同意，出任国民党市政府代理市长，并动员许多技术人员，不要随蒋军逃亡，还设法保护公用器材及设备 etc 不受破坏，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由王、陈夫妇在白色恐怖极度严重的年代，费尽心机，保存了党中央在上海时的档案文件，直到解放后，安全地交给上海市委接收，这是一个很大的功劳。王、陈二同志一度对吴成芳同志的领导方法有意见，我考虑到王、陈所联系的这些关系重要，也曾派陈蕙瑛同志去联系过，因我需经常去找陈蕙瑛的丈夫李正文同志，便于直接找我处理。

上海局也搞情报工作，如中统在浦东的一个区长刘玉昆（即刘友谅，现在上海仪表公司），就是上海地下党派进去的；军统里面，上海局也派人进去。如原由北方党组织派往汪伪特工系统工作而做到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的李时雨同志，乘国民党戴笠特工系统同汪伪系统合流之际，乘机打入军统上海站任组长，起了很大作用。以后因机事不密，引起军统怀疑，但又证据不足，而被军统控以汉奸罪，予以逮捕。在中统、军统系统中也曾有些特务被我们拉过来，供给我们情报。

9. 策反工作委员会

可能是一九四八年中，在上海局系统下，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

会，以我为书记，委员有王锡珍（即陈约珥）、李正文、田云樵等同志，由张朝杰、叶佩仪夫妇在辣斐德路（吕班路）四八五弄十一号租一公寓并装有电话，作为策反委员会的聚会点和联络点，在这个机关负责交通技术工作的有刘毓兰（王锡珍同志的爱人）。这个机关的支部书记是陈蕙瑛，成员有张朝杰、叶佩仪、张朝素（田云樵同志当时的爱人）。策反工作主要是通过我党各方面的关系，在国民党内开展内线关系，其中有几个较有影响的关系，工作都是比较成功的。

（1）段伯宇同志，是经过搞军运工作的王兴纲同志派到国民党军队工作，后晋升到蒋军少将，并在蒋的陆军大学学习过，做过蒋的侍从参谋。因战争环境关系，他和我们原来的系统联络不便，以致失掉了联系，他到处找党，后来经过段在复旦当助教的表弟温尚燧的关系，找到了党。段所联系的一些人，都是蒋的亲信，包括贾亦斌。贾一直递升到蒋介石的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预备干部训练团团团长、第一总队总队长（原局长为蒋经国，蒋保贾继任）。预备干部训练团共有一万人、枪，是蒋经国预备以这些为本钱，用以取代蒋军老一代军人，把蒋军控制在他手里，而且企图在长江以南作为编练三十个新军干部之用，以图垂死挣扎。这时，贾亦斌经段伯宇同志介绍同我们取得联系，他要求率部起义。我们考虑，要是把蒋经国嫡系的这些干部拖过来，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时也难以消化，不如在蒋的京沪命脉地区，来一次部队起义，可以起到动摇蒋的总基地的作用，或使这支嫡系队伍拖垮，起到威慑敌人的作用。后贾亦斌率部起义，由于随即遭到蒋军多方堵截而失败，但已起到了震撼京沪杭总后方的作用。

（2）经过段、贾的关系，又把蒋介石的一个伞兵团（团长刘

农峻)搞过来了(当时蒋只有三个伞兵团)。

(3) 蒋介石的后勤总司令部的运输副司令兼吴淞基地运输司令段仲宇(伯宇之弟)也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他愿意为我党所用,并协助掩护地下电台的转移。蒋的伞兵团起义时,由段仲宇同志派运输船送伞兵团到连云港附近的解放区。

(4) 国民党海军重庆号舰起义。这个工作,开始是南京市委方面陈修良和史永同志等领导下的王琪同志(被重庆号开除的下级军官)搞的,后来交给上海党继续搞,上海党派王锡珍同志去接头,有关情况,曾多次向我汇报。当决定起义时,我们还来不及向党中央请示,策反就成功。当时在王琪策动下的起义小组成员之一、少尉莫香传牺牲了,还有几个水兵也参加了策动。在重庆号上还有一个毕重远(脱党党员),当时在舰上图书室工作,据说起义时他也一起参加。但在起义后,通过清理队伍等工作,把这批策动起义的人,包括王琪都打倒了,毕自命为起义的策动人,史永同志、陈修良同志始终没有承认过。一条军舰上只有五百多人,两百多人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次起义决不会成功;如果当时是毕重远这几个人是主要领导者,那我们所交给起义者去山东解放区的接头暗号决不会被使用,而使用者又恰是我所交给的联络暗号,这就说明王琪等人这支力量当时是主要起作用的力量。

伞兵团和重庆号起义后去解放区,我们用秘密电台和解放区通讯,一时竟来不及,不得已就用我的真姓名作信号而联系上的。后来当我随四野大军去武汉,绕道经过济南时,遇见康生,他一听到我的姓名,顿时就连声说我“策反搞得很成功”。就是这个康生,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反咬一口,说我是特务,真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可笑又可鄙。

(5) 关于国民党海军灵甫号舰，该舰刚有人同我们接上关系，还来不及起义，就被英国要回去了（因重庆号是英国赠给蒋方的，灵甫号是英国借给蒋方的，重庆号起义后，英国害怕灵甫号又被策反，就匆忙索还了）。重庆号和灵甫号失去之后，蒋方就无大的军舰作旗舰了，只好把长治号作旗舰，我们就对长治号开展策反。这项工作是由周克直接组织，王正协助进行的，通过陈健藩、何礼文两同志，找到该舰的枪炮长陈仁珊，从而建立联系。在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蒋帮调该舰去台湾。一九四九年九月该舰先调到舟山，后北上封锁吴淞口。陈仁珊同志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秘密组织了四十一个起义人员，三人一组，互不联系，这些小组统由核心小组领导，总负责人为陈仁珊。某晚该舰在吴淞口起义，当场打死反动军官十一名，胜利地将该舰开至上海。张爱萍司令为避免该舰遭敌机轰炸，自行沉没。后由江南造船厂修复，改名南昌号，为东海舰队旗舰。

在策反长治号的同时，周克同志还对敌运输船昆仑号也展开策反工作，曾将该舰沈舰长父子发展入党，后在吴淞口外举行起义，因工作基础薄弱，起义不幸失败，沈舰长父子惨遭杀害。还有对林遵的国民党长江舰队，进行过策反，在沪宁解放之际，曾带了十多条小舰过来。

(6) 在此以前，我们策曾反国民党飞机起义，先后共计二十余架，有几架是经过南京市委方面史永同志搞的，一部分是经过策反委员会搜集了其它方面交来的关系，而努力促成。第一架起义的飞机为刘善本所驾驶（“文革”中，刘被整死），是通过上海局刘少文同志情报系统的电台和中央军委联系的，军委的复电还叫我们把刘的家属从上海送到解放区去。记得其中一架B24，是史永同志策

动国民党空军上尉余勳为首的五人，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义，飞到石家庄降落；有几架的关系是王月英、陈来生夫妇交来的；其余的是哪些关系交来的，我就记不清楚了。在一个较短时期内，飞跑了二十多架，对国民党反动集团震动很大。他们防范加严，将稍有可疑的空勤人员都剥夺了驾驶权。但这些空勤人员为了立功，有的仍劫持中国民航机飞到解放区（飞到胶东解放区一架）；有的则劫持他人驾驶的飞机，如笕桥机场有两个被取消驾驶权的人，乘别人飞机停落该机场时，潜上飞机飞走，可是该机是来笕桥机场加油的，飞到空中时发现油箱存油很少，就在附近平原落下跑走了。弄得蒋军各机场人心惶惶，在机场停落的飞机，每夜都将油倒出，以免别人偷飞。后来整个民航系统也全部起义了。

（7）国民党海军部办公厅主任金声，通过宦乡同志的关系要求和我们联系，我们当即通知李正文同志前往，经过他的努力，发展了驻浦口的×××师师长李西开，我们派去了联络员。由于解放军行动迅速，联系不及时，李西开在睡梦中被俘；金声还介绍了国民党海军部的机要秘书游侠给李正文，因此，经过游不断及时提供海军情报，我们完全掌握了国民党的海军部署和作战计划。金声对我们的解放战争是有贡献的。

（8）当时最新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工兵第四团团团长王海乔，由段伯宇和段仲宇两同志的介绍，我即通知李正文同志去领导。我们的方针是故意把铁甲车弄坏，堵住浙赣铁路，以使该团拖延执行撤退到台湾去的命令，而且堵塞了铁路，使国民党军队无法顺利向台湾撤退。拖延了几个月，蒋介石集团觉察到该团有问题，要逮捕王，王立即随同我们的联络员逃香港了，解放后回到上海。

（9）交通大学学生党员刘泉琪同志，把他的哥哥刘泉溪（国

民党汤恩伯部队的作战科长)介绍给我们,我也是通知李正文同志去联系,刘泉溪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大的军事情报,甚至汤恩伯的反共军事作战计划,我们都能及时知道。

(10)记得在淮海战役之前,蒋军驻防在××有个姓×的师长(忘其名),要和我们联系,组织上派唐守愚同志前往,唐至该处时×已被撤职,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国民党首都的警卫师(九十七师)原图于南京解放前一个月起义,结果只师长王晏清等少数人进入解放区,起了一些政治瓦解作用。同策反委员会有关系的还有好几个国民党的军、师长,如驻浦口的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部,驻××的×××军军长×××部,李正文同志曾以党的代表的身份,正式同×谈过话,约定接受解放军总部指定的起义时间,因联系不及时,没来得及起义。驻杨中的四十一师刘卫和驻上海的青年军二〇九师方懋楷,这些部队当时经段、贾介绍,都曾同我们有过联系,他们虽未起义成功,但在我们大军渡江时未坚决进行抵抗,自行瓦解了,这对我军作战也是有利的。还有××省保安司令×××、×××,也与李正文同志取得了联系,因起义未成,就不多讲了。国民党徐州绥靖区何基沣、张克侠同志酝酿率部起义,我们一面通知华东部队,一面也派人去联系,后来就听说华东军区已经派人同何、张联络并举行了起义,我们就未再派人去。

(11)文学家丽尼(郭安仁)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国民党军委首脑机关任英文翻译,乘机弄到一份蒋军整个作战计划,找不上党的关系,只好到上海找到作家胡风,胡再找到在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廖梦醒同志,廖再设法转交给我,上海局密电报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曾来电奖励,认为对我军作战有很大帮助。

(12) 通过策反工作，我们弄到国民党的绝密军事地图及重要文件多种。其中江阴要塞地图和蒋军在沪宁线的作战计划上报中央军委；派南京的朱启奎、白沙两同志将沪宁、沪杭沿线蒋军军事部署图携至合肥，面交舒同同志转给刘邓大军渡江指挥部；派周克同志至苏北将江阴要塞和上海蒋军设防图面交三野前委粟裕同志。

(13) 一九四九年一月，蒋军在上海江湾有个很大的军火库突然爆炸，炸声和大火持续了几天。这是周克布置周沙尘同志，通过他的外甥赵聚能同志（江湾军火库修械上士）去干的，他把导火引线通到大库的炮弹房引起爆炸，波及全库，使蒋帮遭到很大损失，社会上为之哗然。蒋军后勤部门的头头，害怕其上级追究责任，瞒上欺下地在报纸上把它说成是“事故”。这次爆破很成功，由于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赵聚能同志在引起爆炸之初即安然脱身，掩护在杨孟良同志处，后由组织上派张惠卿同志把赵护送到浦东游击队工作。

(14) 电影《战上海》中所说的那个“刘义”即刘昌义，事前同我们也是有接触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已进入上海中心地区，国民党残余部队尚死守苏州河以北地区顽抗，田云樵同志当即派王中民（是策反过来的工作关系）冒险过苏州河，找伪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已同王接上关系，候王中民到达五十一军军部。恰在这时，王秉钺负伤离开，这时已由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代军长，王中民也认识刘昌义，即策反刘阵前起义，刘接受了，即约刘过河与我解放军前线指挥员聂凤智同志见面，刘接受陈毅同志的命令：统率所有残余部队集结，放下武器，听候处理。使上海没受大的战斗损失，完整的被接管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刘晓同志忽从香港派人来沪通知我，说中

央要刘晓、钱瑛和我速到北平，并谓他们在香港等我。于是我将未了的工作移交沙文汉同志负责（在此以前，我短期离沪时间，也曾将有些工作交沙暂管，个别关系则交唐守愚同志代为联系），便于四月上旬到香港。刘、钱已先我北上，于是我和李正文、谢寿天等同志随即到了北平，向中央城工部（当时刚改名统一战线工作部）报到。五月初，刘晓同志等一行随三野大军渡江南下，接管上海，我与钱瑛同志则随四野大军南下到武汉，从此分配在中南局工作。

以上讲的是我所接触到的一个侧面，不是全貌，且事隔三十多年，可能记忆有误，或有不够详尽之处。脱稿后曾送给刘晓同志看过，他认为大体上是这样，也曾送给其他有关的同志如张承宗、梅益、方行、王辛南、唐守愚、周克、丁瑜、段伯宇、田云樵、贾亦斌、万景光、陆志仁、史永、韩述之、李正文、陆象贤等同志校正，并参照他们所提意见作了修订。为力求翔实起见，希知情的同志们指正。可惜有关的同志，如刘长胜、钱瑛、姚溱、谢寿天、张纪元等同志在十年内乱中含愤离开人世，刘少文同志则被整得失掉记忆，沙文汉同志早在不正常的党内斗争中默默死去，无法求得他们的校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都已先后得到昭雪。在这一段生动的历史中任何反动力量都无法将他们的名字勾掉。他们对党对人民作出了贡献，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些先烈！

又，上海有些单位找我搜集这方面的材料，我曾将草稿送以参考，据说竟已作为采访记录发表。此未经我的同意。因是草稿，许多事情不尽翔实，特此申明，以此稿为准。

（一九八一年二月）

陕北烽火

郭 洪 涛

(全国政协常委 国家经委副主任)

陕北是革命老根据地，陕北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下面，我就自己经历和知道的陕北革命斗争史实，作一些片断的回忆。

陕北（不包括陕甘边）的建党活动开始于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榆林地区也开始建党活动，建立了党团特支，直接由北方区委领导。一九二六年春，北方区委李大钊同志派耿炳光到陕北巡视工作，并筹备成立党的陕甘区委，同年年底，又派绥德地区书记蔡楠轩同志来榆林，把榆林特支改为榆林地委。地委成员先后由马云



作者近影

程、周家干、刘景象、郭洪涛等同志组成，马云程同志为书记。下辖横山、神木、府谷、靖边四县的县城高小，榆林中学、女师、高小、单级师范和榆林兵工厂等支部。这时陕北地区党团员人数又有较大发展，仅榆林中学已有党团员七十余人。一九二七年春，陕甘区委正式成立，由耿炳光为书记。绥德和榆林两地委，以及延安中

学特支统归陕甘区委领导。

由于陕北党的力量日益扩大，领导群众斗争的规模也愈来愈大。“五卅”惨案后，党领导群众掀起了反日高潮。在榆林的一次反日大会上，榆林中学的教员、学生和当地的工人代表讲了话，有的教员还当场把自己头上戴的一顶草帽（日本货）撕碎，表示坚决抵制日货，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当英帝国主义军舰炮轰万县并制造了沙市惨案后，陕北又掀起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新高潮。在反对陕西军阀的斗争中，陕北党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陕人治陕”的口号，广泛开展驱逐陕西军阀刘镇华（河南人）、吴新田（安徽人）的斗争。当北伐军北上和西北国民革命军占领西安时，党领导榆林中学的学生发起游行请愿，要求陕北军阀井岳秀出兵山西娘子关，响应北伐军北上。李大钊同志惨遭杀害后，党组织群众在米脂县城举行了追悼李大钊同志的活动。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时，又响应上海三次暴动，开展了反蒋活动，公开唱出了打倒蒋介石的歌曲。在农村，主要是组织农民协会，对地主豪绅展开斗争。当时还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号召青年学生组织农民协会，参加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当时我在榆林担任榆林中学学生会会长，经杜斗垣老先生介绍，与正要出任米脂县长的梁海峰先生相识，梁是陕西省革命政府派来的，是杜的学生，进步人士。杜老先生告诉梁，米脂县的豪绅很厉害，同豪绅斗争要多同他们商量。一九二七年夏，学生放暑假，我回到米脂，参加了党领导学生反对大豪绅高家的斗争。在斗争高家时，我们同梁县长商量后，由学生先将豪绅高家夫妇抓起来，在群众中历数他们的罪状，然后抓到县衙门击鼓控告，梁县长当即审问高家夫妇，当场打了板子，用刑后关入牢房。这一斗争大大鼓舞了群众反豪绅斗争的情绪。不久，陕西开始“清党”，陕北也接着“清

党”，军阀井岳秀除撤掉梁县长外，还下了通缉令，被通缉的有马云程、周家干、郭洪涛、杜聿德同志等七人，我们随即先后离开了陕北。杜聿德同志到了安徽，参加了魏野畴同志领导的太和兵变，担任了副总指挥，不幸兵变失败，被俘枪杀。我离开陕北到了山西，一直至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才回到陕北。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期间，陕北党领导群众进行了艰苦斗争，我因为不在陕北，这段时间的情况就不多谈了。下面我就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创至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段时间作些片断回忆。

一、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创和高祁家洼子会议

一九三二年春，在我未回陕北以前，陕北特委已经开创了游击战争，建立了陕北游击队九支队。到九、十月间，陕北特委派毕维舟同志在延川高石崖正式宣布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九支队，队长高朗亭同志，政委艾龙飞同志，经济员张承忠同志。全队共十二个人十二支枪，在清涧、安定、延川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一九三三年一月，高负伤，陕北特委又任命强世清同志为副队长。一九三三年春，毕维舟、强世清等同志在安定县栾家坪桥头打死了敌安定县刘县长，并以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名义出了布告，扩大了政治影响。这是陕北党组织的一次武装斗争。以后，根据陕北特委指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九支队改编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先后由强世清、白德胜、马佩勋等同志任正副队长。五月中旬，队伍南下至盘客壩与红二十六军会合，红二十六军给这支队伍先后去派魏武、杨仲远同志任政委。

一九三三年旧历六月，陕北特委在葭县高祁家洼子召开了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特委委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舟、

崔逢运、鲁笨、王兆卿等同志，还有各县参加会的张达志、高长久、高朗亭、崔田夫、崔田民等同志，共十八人。会议分析了陕北革命斗争的客观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认为陕北地区已经具备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决定扩大与巩固安定一支队，在绥清建立二支队，神府设立三支队，开辟安定一带、绥清边、神府边游击根据地。会议还决定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提出发动群众的口号是：抗粮、抗税、抗债、分粮吃大户，公开组织赤卫军、贫农团、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等。这次会议吸取了过去对敌斗争的经验，确定了发展陕北游击战争的正确道路，对于开展陕北革命斗争具有历史意义。

扩大会前后，在特委马明方、马文瑞、毕维舟等同志领导下，在陕北开展了游击战争。绥清地区的王巨德、崔正冉两同志，根据绥清中心区委的决定，徒手夺得土匪三支驳壳枪，会后正式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这支游击队由王巨德、崔正冉、高朗亭同志负责，先后在绥德南区和清涧东区一带活动，开展了杀土豪、镇压收款衙役的斗争。旧历八月十五日，杀了绥德南区（薛家岭）区长薛运统，鼓舞了群众斗志，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九月，在神府边贾家沟成立了神府特务队。十一月初，特委指示神府特务队正式改编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由高朗亭、王兆相、马万里同志先后任队长、政委。

至此，陕北游击队已有一、二、三等三个游击支队，建立了神府、绥清边、安定一带三块小的游击根据地。

同年五月间，在安定一带活动的一支队，在谭家岭遭受敌人两个连的袭击，政委杨仲远在战斗中牺牲。同年八、九月间，在枣树坪攻坚受挫，队长强世清负伤，养伤中被俘牺牲。以后又在延川县

清平镇打了一仗，损失也很大。一支队因群龙无首，未经上级批准就偃旗息鼓，枪枝也埋了。这时，二支队的三支枪先调给特委成立特务队，以后，又将这三枝枪转给三支队。绥清二支队的三支枪被调走后，又搞到一支盒子枪和一支冲锋手枪，以及从黄河东阎锡山部兵变过来的两个士兵带来的两支六五步枪，共计四支枪十余人，在绥清地区活动，由白雪山任队长，以后又任命王怀德任政委。

当年旧历腊月间，在绥清边活动的崔田民、白雪山等同志，派人取出了埋藏的十三条枪，一支队又开始恢复了活动。一支队和二支队于“腊八”这天，在清涧县解家沟杀了豪绅兼高利贷者高潘，并镇压了催收税款的衙役。这次抗税抗债斗争，壮大了绥清边群众斗争声势。之后，二支队仍留原地活动，一支队返回安定活动。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任命谢子长同志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西领导游击战争。派我回陕北工作。子长同志先走，于一九三四年一月间到清涧，由二支队队长白雪山同志派人护送到安定西区。我留在北平参加中央驻北方代表召开的陕北党团特委委员联席会议^①。这次会议正好是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纪念

^① 据陕北团特委书记、宣传部长李铁轮同志回忆：“1933年12月11日（广暴纪念日）我接到少共河北省委的通知，拿着‘关系’去北平西城平安公寓鲁笨同志寓处，参加了陕北党、团特委几个委员的联席会议，会议是由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人主持的，参加会议的有从陕北到北平的党、团特委委员常学恭、崔逢运、鲁笨同志以及新派去陕北工作的郭洪涛同志和我，会上由常、崔、鲁等同志汇报了陕北工作情况，北方代表派的会议主持人李华生同志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除纵谈国际国内形势外，对陕北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了充分的估计，要求陕北党、团特委抓住有利形势，普遍发动群众抗捐税、分粮、吃大户的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创造苏区根据地。对陕北特委的工作，除指出成绩外，也有所批评，例如认为安定一支队埋枪，二支队改为特委特务队后并入三支队是代表富农利益犯了所谓富农路线，领导游击战争消极怠工，忽视城市工人运动与抗日斗争等错误。由于当时与会人受认识水平和时间限制，对这些问题未充分展开讨论。李华生同志还宣布北方代表决定，常学恭、崔逢运、鲁笨三同志留下，另行分配工作。”

日那天开的。会议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李华生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从陕北来平的党团特委委员常学恭、崔逢运、鲁笨同志，以及新派往陕北的李铁轮同志（指定为团特委宣传部长）和我（指定为党特委组织部长）。会上，由陕北来的三位同志汇报了情况，李华生同志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会后，我即与李铁轮同志离开北平，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下旬到达陕北，通过张达志同志与陕北特委接上了关系。

在陕北特委和谢子长同志的亲自领导下，正式恢复了一支队，任命谢绍安同志为队长，刘志清（后叛变）为政委。之后，一支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扩大，积极开展打土豪和消灭各地小股民团的斗争，建立了安定、横山、安塞、靖边等县边界游击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六月，窑子峁河战斗，队伍发展到近百人，队长仍为谢绍安同志，政委贺晋年同志。

二、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

一九三四年一月，陕北特委在葭县南洼村召开了党团特委联席会议^①，参加会议的有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高长

^①据李铁轮同志回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下旬，郭洪涛同志和我来到陕北葭县，与张达志同志接上关系，一九三四年元月由崔田夫同志召集了陕北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会议是在葭县南洼村一个偏僻窑洞里秘密举行的。

会议由郭洪涛同志传达北方代表的指示，各委员分别汇报了各自分工范围内的工作情况和问题。对北方代表的指示进行了讨论，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对北方代表的批评，没有提出异议。但对陕北革命形势，工作情况，党团组织问题，组织与武装群众，发动群众斗争，发展游击队武装问题，都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和部署。会议夜以继日地进行了六、七天，安全顺利地完成了开好会议的任务”。

久、李铁轮同志和我。会议传达中了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研究了进一步开展陕北游击战争等问题。北方代表由于听了不符合当时陕北革命斗争的情况汇报，因而批评陕北特委把二支队的三枝枪调给三支队，实际上是取消了绥清的游击活动；一支队冒险攻坚，没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受挫后又未采取分散活动，而是埋了枪支散了队伍。并据此错误地批评陕北特委是犯了富农路线和领导游击战争消极怠工的错误。

实际上这些批评是错误的。一九三三年的九、十月间，特委决定将二支队的三支驳壳枪调给特委，成立特务队，队长樊文德，任务是保护特委机关，不久，即取消。约于十一月间，又将这三支枪调给神府三支队，这是事实。但是二支队的番号并没有取消，不久，绥清的同志又先后搞到四支枪，继续以二支队的名义在绥清地区活动。再说，一支队的埋枪，在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过程中也是个别的、暂时的问题。北方代表的批评是错误的，我在会上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也是错误的，对此我曾多次作过检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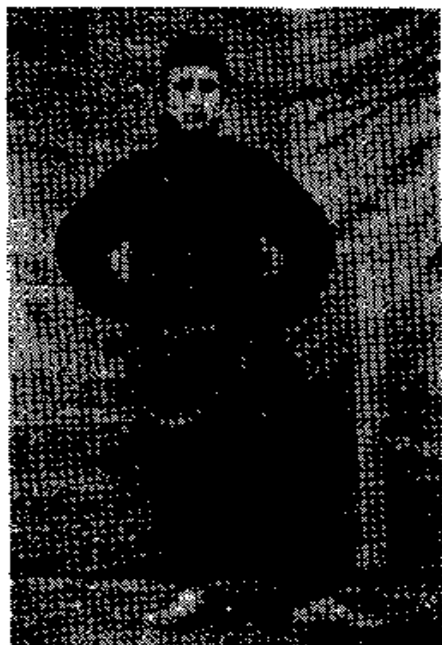
至于北平会议上，北方代表提出，李铁轮同志和我回到陕北后，告诉特委，要普遍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造苏区根据地；派谢子长同志回西北领导游击战争，这是完全正确的。

南洼村会议对当时发展陕北游击战争的形势作了正确估计。认为：陕北在大革命时期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工作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的武装斗争，对于陕北革命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压榨剥削，使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各阶层人民形成了反抗军阀井岳秀和豪绅统治的共同要求；陕北反动统治相对薄弱，当地驻军少，地广山多，交通不便，有利于发动游击战争，尤其是在几个县的边界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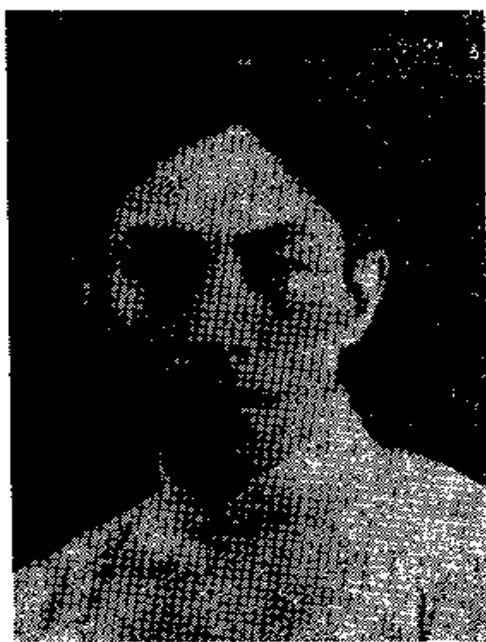
区；加之党团员已经发展到八百多人，建立了三个游击支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成为创造与发展陕北游击根据地的基础和骨干力量。特别是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战略战术传到陕北，在指导陕北游击战争方面起着极大的作用。因此，这次会议决定：扩大和发展一、二、三支队，新建绥、米、葭、吴边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

会议还决定：分别健全党团组织，在各地普遍成立赤卫队、少先队、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

以后，为了加强各地党的领导，除神府县委外，又将绥清县委划分为清涧、绥德两个县委，还建立了吴堡、葭县、安定、米东等县委。扩大和发展了一、二、三支队和安定一带、绥清边和神府边三块游击根据地。特委还派李铁轮、高长久同志和我到绥、米、葭、吴边筹建一支新的游击队。到了樊家圪塔后，我们派人找到了



刘志丹同志



谢子长同志

宋华居同志(外号宋四瞎子)，宋在宋家川开店，是我党的接头处。通过宋又找到了胡海江(是我在山西监狱中发展的党员)和马佩勋同志。通过他们的关系收编了几个土匪和两支手枪(山西太原造的五轮子枪，其中有一枝枪因为撞针短，打的时候，还要用斧子砸一下才能打响)，在樊家圪塔成立了吴堡抗日义勇军(因为队伍中有土匪成份，开始时没有给红军游击队的番号)，由薛俊山同志任队长，马佩勋同志任政委。抗日义勇军成立后，先在绥德东区打了一家地主，继由我与木头峪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子义同志(原名苗从模)取得联系，具体布置攻打木头峪民团的计划。攻打木头峪战斗由高长久同志带路，马佩勋同志指挥，刘子义等地下党的同志负责策应，里应外合。他们摸清了民团住在商店里的情况后，即在旧历十二月三十日晚，派刘子义同志到商店以买东西为名，叫开大门，队伍随即冲入，给正在饮酒作乐的民团来了个措手不及，一枪未放就缴了民团的枪。接着，包围了民团团总住宅，打死团总张东皎。以后，又组织二次袭击木头峪，大大鼓舞了群众斗争情绪。一九三四年二月，吴堡抗日义勇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活动于绥、米、葭、吴边一带。

木头峪战斗后，白如冰、白雪山、王怀德同志和我一起商定，调四支队来清涧与二支队会合，有四百余名赤卫军配合，攻打店子沟李成善民团。这一计划由于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政治特派员杨濮被捕(以后叛变)，临时决定提前二天行动。队伍在马佩勋同志指挥下，一举击溃民团三十余人，缴枪十支。三月间，又在绥德新成立了一个绥德五支队，队长崔正冉同志，政委王子文(即王海珊)同志。二、五支队活动于绥清边一带，并扩大了绥、清、延川东区一带游击根据地。同一期间，在神府边的三支队和安定一带活

动的一支队，都得到了新的发展。

南洼村会议是继高祁家洼子会议以后又一次重要会议，对进一步开展陕北游击战争的几项决议和战斗部署都是正确的，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

三、神堂沟会议与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成立

根据陕北游击战争日益开展的形势和斗争的需要，陕北特委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清明节）在葭县南区神堂沟召开了陕北党团特委联席会议。参加的有崔田夫、马明方、高长久、张达志、崔田民、李铁轮同志和我等七人。会议决定：继续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队，提出为创造一师红军而斗争的奋斗目标；组织突击队，武装突击公开村庄，扩大已有游击根据地并进而将几个苏区联成一片；普遍成立赤卫队、少先队、游击小组，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成立各种群众团体，普遍地把群众组织起来；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发动群众斗争，进而实行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决定召开一次游击队和游击区代表联席会议，对神堂沟会议决定进行具体部署。会后，特委同志分赴各地工作。

同年五月二日，在葭县南区王家畔召开了游击队和游击区代表联席会议。党团特委委员共七人，参加会议的有崔田夫、马明方、高长久、李铁轮同志和我等五人，崔田民、张达志两同志未参加（张达志同志是在会议刚结束时来到樊家圪塔）。参加会议的还有各游击队的领导同志。会议传达了神堂沟会议精神并形成了决议。会后，特委同志分赴各地，我去安定，马明方、李铁轮两同志留特委机关工作，并筹备把机关迅速转移到清涧。

不久，党特委又增加白如冰、马佩勋同志为候补委员，团特委

书记由李铁轮同志接任。

七月初，为了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将一、二、五游击支队集中起来，于七月八日在安定县杨道岭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由谢子长同志兼任总指挥，我兼任政委，贺晋年同志任参谋长。下辖一、二、五支队，谢绍安任一支队长，白雪山任二支队长，马万里任二支队政委，崔正冉任五支队长，王子文任五支队政委，总指挥部成立后。即带领一、二、五支队和赤卫大队四、五百人（赤卫大队长薛兰斌同志）一举攻进安定县城，歼敌数十人。同时，打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数十人。攻打安定城的胜利，震撼了陕北各地，大大鼓舞了群众斗志，扩大了政治影响，推动了游击战争的发展。

在这期间，陕北游击战争和群众斗争已扩展到十余县境。绥、米、葭、吴边的形势也有迅速发展，以后又建立了葭县游击队、米东十五支队，扩大了绥、米、葭、吴边游击根据地。神府边的三支队，在王兆相、杨文模等同志领导下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后又成立了七支队和十七支队，活动于神、府、葭、榆边区，扩大了游击根据地。在安定民团作地下工作的栾兴初、贺吉祥等同志，打死了民团中三个反动分子，把队伍拉出来，改编为横山八支队，活动于横山、安定、米西边界。

此外，绥清苏区也有很大发展，已扩大开辟了延川东区一带。

这段时期，在陕北特委领导下，红军游击队是以打击和消灭白军民团武装为主，同时也领导群众斗争，进行打土豪、分粮吃大户、抗捐、抗税、抗租、抗债等群众工作。赤卫队和游击小组是以打土豪、抓反动，开辟苏区，守卫放哨，进行分粮、抗租、抗税

为主，同时也单独或配合游击队作战。这种武装部队和群众斗争紧密结合的形式，有利于打击与消灭敌人。而且，红军游击队的斗争艺术和策略思想水平都迅速提高。在镇反时，一般采取“枪打出头鸟”的策略，对罪大恶极的豪绅和恶霸给以坚决镇压，用“苏维埃”的名义张贴布告，公布其罪行。当时由于到处看到苏维埃的布告，白区群众搞不清楚“苏维埃”是谁，于是在陕北农村群众中流传起“苏维埃”的故事。说这个姓苏的是个大人物，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到处为民除害，他到哪里，那里的穷人就有了出头的日子等等。

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游击根据地的扩大，红色村庄也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有的村庄原来基础很好，又没有反动分子，游击运动一开始，就把这里的群众组织起来，成为游击队的根据地。如安定县（即子长县）西区的枣树坪一带、清涧东区的王家山和曹家洼一带、吴堡北区的樊家圪垛一带、神木的贾家沟一带等都是如此。各级党委还派出游击小组，专门负责突击公开村庄的工作。因此，凡是有党的工作基础的地方，都相继开辟相邻的村庄，敌人称之为“赤化”村庄。有的村庄还有反动分子，游击队或游击小组一进去，先镇压反动分子，发动群众，分粮吃大户，烧毁豪绅地主的文约、地契、帐簿等，然后公开村庄（即正式成为苏区村庄），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公开村庄后，又向四周不断扩大发展。如清涧的王家山、曹家洼、小岔子一带，开始只有三、四十个公开村庄，以后发展到绥清边一大块和延川东部；原来樊家圪垛也只有少数的村庄公开，以后扩展到葭县南区、吴堡和米脂东区、绥德北区一大块。神木贾家沟一带有少数村庄公开，以后发展到葭县北区和神府边一大块（神府地区是独立的游击区，在陕北革命斗争中起了很大

作用，由于我没有直接参加这里的工作，因此对这一地区的发展知道得比较少）。安定西区以枣树坪一带公开村庄为基础，发展到米西、横山、靖边、安塞等几个县边区的一大块。

在这些村庄里，普遍建立了党支部，成为农村革命的领导核心。同时，建立了青年团、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还建立了赤卫队、少先队、游击小组等群众武装组织。在乡村政权未建立前，由贫农会负责代理一切行政职权。这种贫农会负责行政职权的形式，实际上是乡村苏维埃政权的雏形。

神堂沟会议和王家畔会议是很重要的会议，对于发展陕北红军和扩大根据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两次会议上我也有某些错误，如曾经说过北方代表批评特委的所谓犯了富农路线和对游击战争消极怠工的错误，已经得到部分纠正。事实上特委并没有犯过这些错误，因此也不存在什么得到部分纠正的问题。

红军游击队有根据地作依托，活动余地就大得多了。既可以出去打击敌人，又可以迅速返回根据地休整。而敌人打进根据地来，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如同瞎子一般，既找不到吃的，又不得安息。而我军对敌人的情况却了如指掌，随时可以找到时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种紧紧依靠根据地广大群众的作法，是符合毛泽东同志关于创造农村根据地和发展游击战争的原则的。

四、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南下和红二十六军会合

谢子长同志回到陕北后，根据陕北党和群众工作基础较好，地形也较有利等条件，曾经主张红二十六军的主力一部到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活动，以利于扩大和发展红军部队。事实证明，这种主张

是正确的。到了一九三四年六月，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游击队攻打安定后，率一、二、五支队和赤卫大队约三百人，即到南梁与红二十六军会合，以取得帮助。

两军会合后，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在南梁附近阎家洼子召开了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郭洪涛、贺晋年、龚逢春等，陕甘边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连以上干部，以及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支队长以上干部。

在这次会议上，一致决定调原四十二师政委高岗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并一致通过政委一职由谢子长同志担任，杨森同志仍任师长。还决定由贺晋年同志接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政委仍由郭洪涛同志兼任。并决定红二十六军红三团北上，配合游击队打击敌人。八月，红二十六军红三团（团长王世泰、政委黄罗斌同志）进入陕北根据地，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一起，配合陕北广大群众武装，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

在会议上，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这两封信是因为他们和二十六军没有直接联系，而委托陕北特委转交的）。信中对红二十六军进行了不正确的批评，例如批评二十六军是“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这两封指示信宣读后进行了讨论，由红四十二师党委书记龚逢春同志做了会议记录，并送上级。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两封指示信表现了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思想，我在会上也表示拥护这两封指示信。

以后，我回到特委工作，根据指示信精神和讨论记录还写了一篇《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刊登在《西北斗争》刊物

上，也送了上级。这篇文章宣传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及北方代表的错误观点，拥护了这些错误批评。长期以来，我为写这篇文章而犯的严重错误，多次做过自我批评，引为内疚。

阎家洼子会议决定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到陕北和陕北红军一道活动是正确的，对于陕甘边和陕北两支兄弟红军进一步加强团结，亲密协作，统一步调，共同对敌斗争，以及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是有重要意义的。

五、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由于陕北游击战争和群众斗争的广泛开展，很快建立了神、府、葭、榆边，绥、米、葭、吴边，绥、清、延川边，安定一带（包括横山、靖边、安塞、米脂西、绥德西区）等四块根据地，引起了敌人的严重注意。当陕北一、二、五支队南下会合红二十六军期间，军阀井岳秀的八十六师倾巢出动，并配合地方民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进合击各根据地，进行烧杀、抢劫和破坏村庄。面对这一局势，陕北特委和地方党组织领导游击队、赤卫队以及广大群众，与敌人展开了极其艰苦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一九三四年八月，由谢子长同志统一指挥的红二十六军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以及赤卫大队进入安定一带。八月中旬，敌人一个连从石湾方向进入安定的金吴塌“清剿”，我军决定集中力量歼灭这股敌人。清晨，我军到达金吴塌，由红三团主攻，当时敌人在山下，我军占了山头，居高临下展开攻击。我们估计与敌战斗开始后，敌人因地势不利将会向石湾镇方向逃窜，因此事先又在那里布置埋伏。战斗打响后，敌人很快被歼灭，残部果然向石湾方向逃窜，被我埋伏的部队全部歼灭。接着，我军从安定往绥德

方向前进，经过白区的南沟岔、老君殿，绕道至绥德南区的张家圪台。此时，老百姓因受反动宣传，大都已经走散，敌人也纷纷逃窜。为了争取白区的工作，所到之处，吃了老百姓的粮食，都在锅内留下大洋和简单的信。走了以后，群众对我军军纪严明反映很好，到处传说来了“天兵天将”。我军在张家圪台击溃了敌人从薛家峁来的一个连，并消灭其两个排，还有少数敌士兵向无定河逃窜，有的淹死在无定河内。以后队伍进入苏区，但这时在苏区内，敌人还设有一个“钉子”——河口镇，兵力一个连，这个敌据点设在黄河和无定河汇合处。我军稍作休整后，即组织力量拂晓进攻河口镇，击溃了敌一个连。敌人因背水作战，无路可退，损失惨重，被迫逃往清涧城，我军胜利地收复了河口镇。河口战斗中，子长同志不幸胸部负伤。负伤后，子长同志仍继续指挥战斗，以后因为流血过多，伤口很痛，子长同志才揭开衣服指着伤口对我说：“我负伤了。”此时，敌我战斗相持不下，我即建议部队撤退，并要子长同志先撤走。部队随即撤退。接着，子长同志率红三团和一支队到安定西区，红三团南下回陕甘边，子长同志暂离部队养伤。在他养伤期间，特委派薛兰岗同志带了一个中队，保卫子长同志，直到子长同志逝世，部队才回到省委，薛兰岗同志任省委保卫队长。

在整个战斗中，我军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缴枪百数十支，敌大部被歼或被俘，粉碎了白军和民团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我根据地广大群众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成绩显著。在根据地内，建立起村与村、县与县之间的联防。每当敌人从据点出动，各村群众迅速查清敌人的武器装备、人数和动向，并向四面八方传报，使敌人一举一动置于我广大群众的监视之下。这种传递情报的

办法，群众称之为“土电话”。地方党还领导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和广大群众与敌周旋，他们站岗放哨，捉拿敌探，骚扰敌人驻地，坚壁清野，使得敌人一进入苏区就象到了死胡同里，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吃不上饭，睡不好觉，疲劳沮丧。每当我军部队和游击战士到来时，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群众杀猪宰羊，运粮抬担架，站岗放哨，帮助战士洗补衣服、做饭，有时还给大家包饺子吃，大大鼓舞我军的士气。在斗争中，还进一步扩大开辟红色村庄，由一个村向四周各村扩展，由一点红发展到一片红，使苏区逐渐扩大。

实践证明，陕北党的群众工作和领导游击战争的工作是做得好的，我们所以能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就是因为有根据地这样一个可靠的依托。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后来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有一次彭德怀同志到了清涧县，表扬清涧县的群众工作做得不错，说不亚于中央苏区兴国县的工作。

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战略上敌人处于攻势，我军处于守势。但在战斗中，我军运用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基本原则，针对敌人兵力分散，到处寻找我军作战的特点，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之，使敌人丧失了有生力量，他们只能变分散进攻为集中固守据点，即无法以连排为单位四出“清剿”，也无力以营为单位组织进攻。担任第一次“围剿”的敌主力井岳秀以他自己的兵力已经再也不能继续“围剿”根据地了。这是陕北革命战争一次很大的胜利，这次反“围剿”，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同时使我们积累了反“围剿”的经验。

不幸的是，杰出的红军指挥员谢子长同志在河口战斗中负伤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因伤重逝世，时年三十九岁。陕北革命根据地从此失去了一位深受西北人民爱戴的领袖和杰出的军事领导人。

六、寺塬里会议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一九三四年九月，在清涧寺塬里召开了陕北特委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分配土地，并决定将红军游击队一、二、三支队改编为红军一、二、三团。还通过了粉碎第二次“围剿”的决议。

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被粉碎后，并不甘心失败，而是增调兵力，准备发动第二次“围剿”。在粉碎一次“围剿”和敌人的二次“围剿”开始前这个间隙时期里，陕北的游击战争和工农民主政权建设蓬勃发展，苏区得到进一步扩大。

打罢河口一战，我们用缴获敌人的枪武装我们队伍，成立了延川九支队，支队长高朗亭同志，副队长王保民同志，政委王文良同志，活动于延川一带。其后，又相继成立了靖边十支队、安塞十一支队、绥德十二支队、米西十四支队。此外，还有区游击队或突击队等等。由于贯彻了神堂沟和王家畔会议决议精神，陕北的红色区域得到迅速扩大，红色政权也相继建立。红二十六军红三团返回陕甘边根据地后，陕北游击队为避免与敌主力作战，即开始分散活动，解决小股民团武装，争取白军、民团哗变，进一步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九月间，在赤墀（现在的子长县）、吴堡、清涧三县，先后成立了县、区、乡革命委员会。以后秀延（即安定、绥德、

清涧和米脂各一部)、靖边、安塞、米西(米脂西部)、横山、绥德、延水(即延川东部)、延川、延长(北部)、葭县、米东(即米脂东部)、葭芦(葭县北部)、神木、府谷等县的各县、区、乡革命委员会也相继建立起来。至一九三四年年底,除神木、府谷、葭县边苏区外,安定、米西、安塞、靖边、横山边苏区,绥、清、延川边苏区和绥、米、葭、吴边苏区,共有十四个县(有的原来是一个县,当时被分为两个县,有的是一个县的一部分或一个区),纵横数百里联成一片。

一九三四年旧历年底,在安定白庙岔召开了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大会选举马明方同志任主席,崔田民、霍维德同志任副主席。通过了《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工农民主政府组织法》等法令。省工农民主政府下设秘书处(先后有张毅枕、吴居第负责)、财政(艾楚南)、教育(彭飞)、土地(王子文)、劳动(祁××)、经济(惠子明)、粮食(先高旭光后罗成德)等部和保卫局(先后由崔正冉、刘子义负责)及巡视员(强晓初、白栋材等)。陕北总工会高长久任主席。陕北团特委书记由慕纯农接任。

根据神堂沟会议和王家畔会议决议,陕北的分配土地是从一九三四年九月间开始的,特委决定先在清涧东区袁家沟等几个村庄试点。

开始由于绥德、清涧两县委不懂得如何分配土地,在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后,未分配给农民。当时正值春耕,没收来的地主土地和军烈属的土地都无法下种。绥德、清涧两县委虽经过多次讨论,对分配土地仍无办法。最后,他们不得已采取了一个不分土地先种地的办法,依靠贫农会的组织,以村为单位集体种上述土

地^①。在收获的粮食中，属于军工烈属地内的交军工烈属，地主地内的绥德县除给地主留些口粮外，其余均交公粮，在清涧县有些村子发生过集体吃饭的问题。这种作法，没有把土地分给农民，没有确定土地所有权，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

绥德、清涧两县委还决定同时焚烧地富的文约和帐簿。但在执行的时候，有些村庄也发生过偏差，如有的把地主、富农连同商人、中农、贫农的一切文约和账簿全部烧毁，影响了商人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债权债务。

陕北特委认为，绥德、清涧两县委的某些做法是不对的，主要是缺乏经验。针对这些情况，特委马明方同志和我先后在清涧批评过他们上述一些不妥当的做法。随即又指定我参加袁家沟等村分配土地试点的工作。

袁家沟分配土地的主要政策和作法是：

- (1) 没收豪绅地主和富农的土地；
- (2) 中农土地不动；
- (3) 红军、贫雇农分好地；
- (4) 参加革命的富农子弟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可以一样分地，其他富农分坏地；

^①据当时担任绥德县委负责人的李景林同志回忆：“一九三四年春季，因为正当春耕紧张，敌人围剿，地富土地没收无人种，我们只有土地革命口号而无办法，群众问我们，地没人种，荒了没粮食怎么办？县委要我写土地革命的具体办法……，大家同意了我的第三个办法，实行了集体种地，同时也推广到了清涧县境。夏季（按：实际是秋季），陕北特委到了清涧，特委也指出清涧县委不分土地是错误的。我承认错误是没办法的办法，……秋后，绥德收的粮除了军工烈属的交军工烈属外，地主地内的粮，除给地主口粮外，都做为公粮用了，问题也不大。”

(5) 参加革命的地主子女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地主一样分地，其他地主不分地；

(6) 单身汉分双份地（考虑以后成家）。

通过试点，取得经验，然后组织训练班培训干部。经过训练后的干部被派到各县帮助分配土地的工作。

其他各县，分配土地的政策和作法又有些变动。如有的地区改变了中农土地不动的政策，采取打烂了平分土地的办法，侵犯了富裕中农的利益。有的地区对参加革命的富农子弟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富农，采取全家一样分地的办法；有的只限参加革命的本人一样分地，其他富农分坏地。有的地区给地主分坏地、远地，有的不给分地。

土地政策在某些方面虽然有错误，但总的说，这次分配土地是陕北历史上第一次土地改革，它彻底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摧毁了地主豪绅黑暗统治的经济基础，解除了反动政权强加给广大农民的苛重捐税，废除了高利贷等。特别是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完全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通过分配土地的斗争，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和为革命斗争的积极性。

工农民主政府对于社会肃反、统战、边界工作等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因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但在社会肃反方面，对待反革命的地主、富农、特务、叛徒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般地采取严厉镇压的办法，未能很好地采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以及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等措施，还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动分子，也发生过错杀人的情况。对待各种社会上层分子，不懂得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待边界地区的各项工作措施，也没有很好地与中心地区区别对待。有些地方造成了某些边界地区

的赤白对立现象。在进入城镇后，个别地区，对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没有与地主的封建剥削区别对待，采取没收的政策，显然是不妥当的。有的地方还发生了一些违法乱纪以及乱烧乱杀行为，一经特委发现，都坚决加以制止了。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使党成为领导和开展各项工作的核心力量，在县一级分别加强和建立党团县委组织。先后建立了吴堡、葭县、米东、绥德、清涧、延水、延川、延长、赤堡、靖边、安塞、横山、米西、秀延、神木、府谷、葭芦等县委。在粉碎第一次“围剿”后，除米东、葭县县委撤出外，又建立了宜川、延安等县委。在红军游击队中，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分别归县委和特委领导。

群众斗争和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涌现出一批群众领袖人物和积极分子，党的政治影响迅速提高。大批的积极分子要求入党，为大量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创造了条件。执行的干部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当时受到过唯成份论的影响，如第一把手一般要选工农分子担任。对出身地富家庭的干部一般是大胆使用；还从地富家庭出身的中学、高小学生中提拔了一批干部。也有个别地区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执行得不好，对个别犯错误的干部处分重了些等等。从总的方面看，提拔起来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的，能够积极领导群众为保卫苏区而斗争。

七、红二十七军的成立与第二次反“围剿”的初步胜利

为了适应陕北对敌斗争的需要，九月间改编陕北游击队一、二、三支队为红军一、二、三主力团。红一团由贺晋年同志任团长，先后由刘光先、马佩勋同志任政委；红二团由任三同志任团

长，马万里同志任政委，红三团由王兆相同志任团长，杨文模同志任政委。同时，又在安定、清涧、神木分别建立了新的第一、二、三游击支队。各县都成立了游击队，有的县有两个游击队，同时还在内蒙古乌审旗成立了骑兵游击队（队长曹动之同志）。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陕北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动摇了敌人对陕北地区的统治。一九三四年底，反动头子蒋介石，陆续调集了六个师的兵力，发动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其中除原有的井岳秀部一个师外，又调高桂滋一个师，深入绥德、清涧、安定苏区；调冯钦哉一个师，到延长、宜川一带；以后又调山西阎锡山部孙楚、李生达两个师，到葭县、吴堡、绥德、神木沿黄河一线；此外，调傅作义一个骑兵师，到府谷、横山沿长城一线。

为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陕北特委决定于一九三四年底，在赤源县白庙岔集中红一团、红二团，正式成立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先后由杨琪、贺晋年同志任师长，张达志同志任政委。红三团改为神府独立团，仍留原地神府边活动。在葭、吴两县县委领导下，集中了几支游击队成立的红五团（团长王士杰），后改编为红三团（团长李仲英）。以后绥吴一带以游击队为基础，又成立了战斗团（团长慕生忠），即红四团。在此期间，还陆续成立了延安、延长、宜川等新的游击队，开辟和扩大延长、延安、宜川等地的游击区。陕北除了已经成立红军主力部队外，各县都有游击队，并普遍建立和扩大群众武装组织，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其时，敌高桂滋部进犯陕北苏区，他们四出分散活动，寻找我军作战，捕杀我根据地干部和积极分子，抢劫牛羊，破坏村庄，组织保甲，企图摧毁我生存活动之基础。为便于领导和有力打击敌人，陕北特委决定特委机关从清涧迁到安定。在敌人兵力分散的情况下，集中红军二十七

军八十四师红一团、二团，在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两同志指挥下，配合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各个击破敌人。先歼敌两个排于秀延南沟岔；又在清涧高家村击毙高桂滋部一个连长，俘敌三十余人；后在延川贺家湾击溃敌人一个连。三仗缴枪百余枝，红二十七军第一次缴获捷克式轻机枪数挺，俘敌百余人。这次战斗的重点是打击高桂滋部，作战方针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四出活动的小股敌人，使敌人不敢以连排为单位向苏区内活动。由于指挥正确有力，有效地打击敌人，收复为敌占据的地区，取得了反二次“围剿”的初步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巡视员黄汉来陕北巡视工作，当时陕北党团特委委员只有我和李铁轮同志在清涧特委机关，其他同志都在外地工作。我曾向黄汉同志建议，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一部迅速调来陕北，协同陕北军民开展反二次“围剿”的斗争。由于谢子长同志养伤，我还建议调刘志丹同志北来统一指挥。黄汉同志采纳了这些建议，并写信给陕甘边特委。至于两军会合后采取什么组织形式，那些同志担任什么职务等，当时都未具体商定。一九三五年一月底，陕甘边特委派刘志丹同志来安定，与谢子长同志以及陕北特委其他领导同志会晤，共同商讨两个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两支红军统一指挥的问题。

八、周家峪会议与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在赤源县周家峪召开了两个特委的联席会议，参加的有刘志丹、崔田夫、高岗、马明方和我（白坚同志担任记录）。会上，先研究了军事问题，大家认为，为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需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

北军委)。在决定成立西北军委时，就产生了西北军委归谁领导的问题，于是又决定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

西北工委成立后，原陕北特委随即撤消，原陕北特委所领导各县委，改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所属各县则由陕甘边特委领导。根据陕北党团委委员崔田夫、马明方、崔田民、李铁轮等同志回忆，陕北特委内部是团结的，特委在总的方面认识是一致的，总的路线是一致的。

周家硷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统一了两个特委、两个根据地和两支红军的领导，并确定集中红军主力在陕北作战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会上，对于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计划进行了讨论，确定集中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主力，打击深入安定、清涧等苏区之敌，当时大家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会议还通过了打通陕北苏区和陕甘边苏区及打通神府边苏区的问题。认为打通神府边苏区需从两方面进行，一面从米脂西区和横山东南区向神府边发展；一面从葭吴边向北发展。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是需要由游击队发动群众进行的。

会后，西北军委根据周家硷联席会议精神，发布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由刘志丹同志亲自起草），号召红军指战员、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和全体人民群众为粉碎敌人二次“围剿”而英勇斗争，这个动员令起了极大的鼓舞和号召作用。

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红二十六军红三团、义勇军与红二十七军在赤城县白庙岔会师，并举行了大会。接着部队开到秀延县玉家湾，在玉家湾召开全军大会，西北工委正式宣布成立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前敌总指挥部，并任命刘志丹同志任总指挥，高岗任政

委。两军会合后，敌高桂滋部郭子封营（所谓高桂滋部的王牌营）。进入苏区杨家园子及其附近几个村庄。前敌总指挥部决定：乘敌人脚跟未站稳，集中力量消灭这个营。部队根据前总指示，即向杨家园子方向前进。但当突击队接近玉皇岭寨时，发现那里壁垒坚固不好攀登，又不宜强攻。当红一团撤至吴家寨时，又发现从瓦窑堡方向出来敌军一个连，正向吴家寨行动。于是红一团当即决定消灭这一连敌人，在吴家寨以西设置了埋伏。当敌人进入埋伏圈后，我军发起猛攻，敌向后溃逃，追击歼敌于张家岭一带，俘敌百人，缴枪近百。此时，敌郭子封营闻讯向我军追来，并占据了吴家寨和一些制高点。我红二十七军第一团所属部队和红二十六军主力第三团会合，一方面向敌人展开攻击，一方面断其后路。此时，红二十六军所属义勇军也奋勇冲杀上来，抢占了几个制高点，给了敌人以有力打击。经过激烈战斗，我军将敌人层层围住，全歼了敌高桂滋部的所属王牌营。此战共毙敌营长以下五十余人，俘敌四百余人，缴枪五百余支。

正在此时，清涧之敌一个营，护送敌军军官家属和枪支弹药向瓦窑堡方向前进，行至马家坪被我九支队和赤卫军围住，又全歼一个营。此战毙敌四十余人，俘敌四百余人，并缴获敌一个团的军饷和军服。

这次战役在刘志丹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共歼敌七个连，俘敌千余人，缴获捷克式步枪千余支，捷克式轻机枪六十余挺，这是一次重大胜利。战斗结束后，在玉家湾村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群众踊跃参军。会后，西北工委即在玉家湾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崔田夫、高岗、马明方、张秀山、高长久、张达志和我。会上决定了红军向东出击，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并决定

打通陕北、陕甘边两大苏区，使之联成一片。会上还决定我任西北工委秘书长，组织部长由王达成同志接替。

由于这一战役的胜利，使安定城内敌人闻风丧胆，弃城逃窜，安定县遂告解放。随即部队又东向至绥德张家圪台全歼守敌一个连。

之后，部队又攻占了延长城，消灭了敌军一个骑兵连，解放了延长县。同时，延川守敌和民团也闻风弃城逃往清涧，延川县也告解放。六月中旬，我军开始围攻安塞县。由于敌人顽固不化，政治争取无效，即用挖地道炸开城墙的办法，攻进城内，歼敌二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解放了安塞县。从此，陕北、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

接着，部队北上采取强攻的办法袭击靖边城，经过激烈战斗，全歼高双城部一个营，缴获枪支五百余支，还缴获迫击炮两门。这是我军第一次缴获迫击炮，当时有的战士没有经验，见了迫击炮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往地上砸，结果造成误伤事故。这次攻坚，我军伤亡也较大，但全歼敌一个营，使敌大为震惊。靖边县解放后，保安县就完全陷于孤立；敌人被吓得弃城而逃。

一九三五年七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朱理治同志来到陕北，筹建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朱任书记。八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又派聂洪钧同志参加代表团。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主力红军又乘胜前进，东向绥德一带，打击入陕之晋军，先在吴堡县一举全歼慕家壩守敌一个连，并击溃敌增援部队，共消灭敌四个连。以后又在定仙壩围点打援，先后击退敌人一个旅，歼敌一个团，俘敌二百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八月底，部队北上袭击横山之敌。

至此，我军解放了安定、延川、延长、安塞、靖边、保安等六座县城，根据地空前扩大，敌人遭到完全失败，在西北工委、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西北人民的领袖、杰出的军事领导人刘志丹同志的指挥下，我们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彻底胜利。

九、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和十五军团的成立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蒋介石慌忙在洛阳开会，纠集张学良、杨虎城等杂牌部队，主力是东北军，兵力约十多万人，发动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敌人的主攻方向是由南向北，先头部队是东北军的王以哲军，进驻陕甘边区之郿县、甘泉、延安一线。

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二十五军转战来到陕北，于“九一八”四周年那天，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合于延川县永坪镇。三军会合后，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同志组成，（程未经上级批准）朱理治同志任书记，代表团驻延川永坪。除代表团全面负责西北的党、政、军各项工作的领导外，还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和我分任正副书记。同时，改组军事领导组织，由聂洪钧同志任西北军委主席，徐海东、刘志丹同志分任十五军团正、副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另外，马明方、习仲勋同志仍任陕西省和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戴季英任西北保卫局局长。

为庆祝十五军团的成立，于永坪召开了两军联欢大会。十五军团成立后，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积极投入反“围剿”的战斗。主力部队向陕甘边所属地区打击进犯的敌东北军，包围甘泉城，采取围城打援战术，在崂山设伏打击增援之敌。十月初，崂山一仗歼敌东北军一一〇师两个团和师直属全部，击毙师长何立中。

当时我们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报纸上，了解到中央红军已经北上，并到达甘南一带，但还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前方对十五军团的行动意见不一致，正在后方养伤的程子华同志提议，可由十五军团南进打击郿县、洛川之敌，调敌北移，牵制敌人，以保卫陕北根据地并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朱理治同志和我同意他的意见，并由他去前方解决。随即部队南进，攻打榆林桥，榆林桥战斗歼敌一〇七师四个营。

一九三五年七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推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执行了错误的肃反政策。当时担任西北保卫局局长的戴季英采取逼供信的办法，在党内进行了错误肃反，逮捕了刘志丹同志等一批红二十六军的老干部，前方还错杀了一批干部，造成了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铸成这一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于错误肃反中我应负的责任问题，中央已于一九六〇年重新作了审查结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央组织部又就此事摘要发了通知，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及 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榆林桥战斗时，我正在前方，当听到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后，程子华同志和我立即从稻草堡前往迎接。赶到下寺湾时，遇到了贾拓夫同志，带来一个连，并带一部电台给十五军团。程子华同志和我把十五军团在崂山、榆林桥两次作战情形和十五军团的情况，以及陕北、陕甘边红军和苏区的情况，用电报向中央和毛主席作了报告。接着，毛主席和中央红军来到下寺湾，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在下寺湾一带胜利会师，我向中央

来的干部介绍了苏区和红军的情况。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毛主席、周副主席留在前方亲自指挥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作战，中央和中央军委由我迎接进驻瓦窑堡，五千多群众结彩欢迎，群情激动。

为了及时纠正错误肃反，党中央还确定成立了有董必武同志负责的五人领导小组负责处理肃反问题。听取了王首道同志的审查报告后，经中央批准，基本上解决了陕北的错误肃反问题。除了当时认为几个有问题的给了处理外，释放了所有受冤被捕的同志。

在中央和红军进入陕甘苏区时，敌东北军部队跟踪追到了直罗镇。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德怀同志亲自指挥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一举歼敌东北军一〇九师一个师，击毙牛师长，又追击歼敌一〇六师一个团于黑水寺，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中央到达瓦窑堡后，又将陕北的一部分独立营和游击队改编，新成立了红二十八军、三十军和两个独立师。

从此，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忆红十四军

刘 瑞 龙

(全国政协常委 农业部副部长)

一九八〇年，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建军十周年。当年的领导人之一刘瑞龙同志满怀激情，写下了这篇回忆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红十四军产生的背景和它诞生、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这支部队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不幸遭致的失败……

红十四军产生的背景

红十四军产生于江苏北部通（南通）海（海门）如（如皋）泰（泰兴）地区。

通海如泰这个地方，位于长江北岸，黄海之滨，邻近上海、南京，交通便利，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但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是极为严重的。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很集中，租额很高。高利贷盘剥名目繁多。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一方面阻碍着地方民族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打击和破坏了农村家庭手工业。例如，日本洋纱的倾销，在大生纱厂开工之前，就已在南通、海门地区大量进

行，销售額一年多达银洋二百万元。土纱逐渐被排挤。而洋布的倾销，又严重地排挤了在国内市场上素有声誉的南通土布。这就加速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贫困、破产。就是民族资本办的工厂和垦牧公司，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压迫与剥削引起了反抗和斗争。在阶级敌人的残酷统治下，人民群众怀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自发斗争此起彼落，前后不绝。一九二三年冬到一九二四年春，泰兴横巷发生了自发的农民暴动，大闹“震东市”，把大地主黄辟尘的宅园烧光，打得泰兴知县狼狈逃走。后因内奸告密，领导人被害，暴动遭致镇压。那时，沈毅在黄桥警察分局当巡士，由于身受巡官虐待，他对暴动的农民十分同情，偷偷地将拘押在警察分局的三十多名参加暴动的农民放跑了。他自己也逃走了。以后，经友人帮助，去广东参加了彭湃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走上了党指引的革命道路。再后，又受党的派遣，回如泰地区从事革命活动。这说明，在那样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从自发的群众斗争到自觉的革命是很自然的。

通海如泰这个地方，和全国其它比较发达的地区一样，较早地出现了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和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因此，在全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这里的政治反应也是很灵敏的。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就曾在南通、如皋等地引起巨大反响。一批进步青年，从此开始努力追求真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寻求解放和改造中国的道路。其中，吴亚鲁同志就是一个杰出代表。他毕业于如皋师范，一九一九年考入南京高师，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多次利用假期回乡，在如皋潮桥、马塘、掘港等地，向进步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述社会主义发展史，并和如皋一带旅外学生组织“平民社”，定期出刊《平民声》。

到了一九二四年，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知识分子进一步加紧了活动。江苏第一代用师范（后改通州师范，今南通师范）学生丛永琮、徐家瑾、王盈朝等在校里组织了“晨光社”，他们团结进步同学，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向反苏、反共的国家主义派展开了斗争。而这时，在上海工作的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同志，同丛永琮同志建立了密切的通讯联系，给“晨光社”以热烈的支持，并在当年六月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三十六期上，以显著的篇幅，介绍了“晨光社”的活动。恽代英同志还亲切地指导和帮助他们开展革命活动。这年暑假，丛永琮和吴亚鲁在如皋潮桥组织了“学友会”，团结农村进步青年，讨论和研究农民生活为什么苦，怎样才能过好日子等社会问题，并在农民中间进行了宣传。

类似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组织还有如皋师范的“劲社”和海门曹家镇（今属启东）的“青年协会”。

这些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活动，为通海如泰地区的建党工作准备了条件。一九二五年春，南通师范“晨光社”社员丛永琮、王盈朝经恽代英同志介绍加入共产青年团，随后加入共产党。不久徐家瑾、杨文辉相继入党。党的通师支部于是成立，归党的江浙区委领导。在这以前，中共江浙区委曾派陈延年同志到南通开辟工作。

一九二五年五月底，上海传来了“五卅”惨案的消息，南通学生无不义愤填膺。五月三十一日晚，通师由徐家瑾同志主持，南通师范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控诉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群情激愤，一致决定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并着手筹备南通学生联合会，以便统一行动。于是运动迅速展开，学生、工人、市民纷纷参加进来，组织“五卅”后援会，举行示威游行，开展“三罢”

(罢工、罢课、罢市)斗争。

如皋、海门等地的学生、工人、市民也积极响应了这个运动。

“五卅”运动大大地提高了通海如泰人民的政治觉悟，锻炼、培养了一批骨干，并使党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久，在中共江浙区委的指导下，不仅在南通的许多学校里，而且在农村中间，如泰兴刁家网和如皋鄂家埭等地，都建立了党的支部。如泰地区的党组织，还配合北伐战争，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孙传芳“联军”的斗争、发动上千农民抗议“联军”为非作歹，吓得“联军”不敢下乡，并从防地撤走。到一九二七年，泰兴、如皋、南通、东台、海门等地，相继建立了中共县委，党的领导大大加强。党在学校、农村和工厂，积极地开展了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在群众中扎下了根。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大革命遭受失败，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党和人民面临着新的斗争。通海如泰地区各县的党组织，陆续把工作重点转入了农村。泰兴的沈毅，如皋的徐芳德，南通的聂洪纶以及启海地区的陆铁强、俞甫才等同志，都先后致力于贫苦农民的宣传教育和发动工作。他们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启发群众的思想觉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群众倾吐了长年埋在心里的郁结和愤懑，而把仇恨集中在绞杀革命、屠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身上，要求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一九二七年九月，中共江苏省委向通海如泰党组织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省委决定成立江北特区委员会，统一领导南通、海门、崇明、如皋、泰县、泰兴、东台、盐城等八县的工作，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一九二八年二月，省委派黄澄镜（黄逸峰）同志到南通、泰

兴、如皋等地了解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但不久，黄澄镜在东台被捕。三月，中共江苏省农委书记王若飞同志到南通、如皋巡视工作。若飞同志分析当时斗争形势，指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政权的重要性，指出要把农民工作深入一步，领导群众进行武装起义，以支援苏南和全国各地的斗争。若飞同志的到来，使同志们受到很大鼓舞，促进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四月底、五月初，“五一”起义，即如泰农民武装起义终于爆发了。

起义首先在泰兴发动。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沈毅等同志带领农民武装在八字桥袭击了国民党反动军警，打死巡官和警察四人，收缴了他们的枪枝。接着，就在刁家网竖起了起义红旗。泰兴县委则在这里成立起义指挥部，举行誓师大会。附近村子的农民胸挂红布条，扛着大刀、铁叉、土枪和缴获得来的七、八枝长短枪，纷纷到这里集合，很快就组成了一支四百多人的起义队伍。他们打土豪劣绅，扫荡地主巢穴，领着农民分地主的粮食和衣服，捣毁国民党警察所，所到之处，红旗招展，锣鼓震天。各处农民闻风响应，队伍不断扩大。五月一日，起义队伍到达古溪、周庄时已近万人。第三天，三岔河以南的分界、珊瑚庄一带的农民也起来了。队伍分为南北两路，参加斗争的群众达三、四万人，风起云涌，声势浩大，威振黄桥。

在如皋，当听到泰兴已经发动的消息后，徐芳德同志就立即带领群众起来响应。五月一日，由如皋县委主持，在朝西庄广场上举行了三千多人的誓师大会，宣布如皋农民开始起义，并高呼“土地归农民”、“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等口号。他们向大地主的庄园发起了进攻，打下了东燕庄、北小庄、蒋家埭，歼灭了周庄头

的地主武装“保卫团”，烧毁卢庄大恶霸地主卢锡三、卢植斋的住宅。起义队伍还在周严墩小学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如皋县苏维埃政府。

面临着农民起义的巨大风暴，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惊恐万分，赶忙纠集省保安队、各县警察大队，以及其他各色各样的反动武装进行反扑。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水陆公安处还派遣兵舰，分踞沿江港口。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也派兵驻崇海边境。各路反动军队，对起义地区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刚组织起来的起义队伍缺乏相应的准备，作战经验也不足，先后遭到挫折。经过三天战斗，终于失利。敌人开始了残酷的镇压，对起义农民大捕大杀。沈毅同志也遭逮捕，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五一”起义虽然一时失利，但从此开始了通海如泰地区的武装斗争，为红十四军的产生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 红十四军的诞生和发展

“五一”起义的失利，使革命力量受到一定的损失。但由于党组织已扎根于群众之中，群众始终保持着强烈的革命要求，所以，在省委的关怀和领导下，经过各地党组织的努力，整顿和恢复工作进行得很快。一九二八年秋末，省委把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向通海如泰地区党的领导干部作了传达，并指示成立党的南通特区委员会，以加强对革命斗争的领导。十一月，特委在海门茅镇召开了通、如、海、启、泰（兴）、靖六县县委联席会议，根据“六大”决议，检查了本地区的工作，总结了经验，并讨论研究了今后的工作。会议决定，各县党组织要深入群众，领导群众进行各种

各样的斗争，并在群众斗争中发展和巩固党组织。会议还着重指出“游击战争必然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赤卫队是准备工作之一”，要求各县都能组织一支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骨干队伍。

联席会议之后，党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重要的标志是作为领导革命斗争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通、如、海、启四县党组织给特委的报告所作的统计，那时四县共有党员一千八百五十六人，其中南通七百六十人，如皋八百人，海门一百九十二人，启东一百零四人。南通县委的报告最详细，对七百六十名党员的家庭出身也作了统计：工人四十三，农民六百七十七，知识分子和学生三十七，其他成份三；还说，每个党员可以带领群众少者一、二人，多者四、五人。可见那时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是做得比较扎实、细致的。

那时，党组织已注意教育党员，结合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去组织斗争。例如，如皋西乡有个地主霸占公共池塘，不准农民捕鱼。党支部就发动群众二百余人去捕鱼，地主也就束手无策了。在海门乡间的一个小镇旁边，地主因怕所谓“土匪”抢劫，把一座木桥拆掉了。农民因走路不便，嚷了起来。党支部就组织党员带领群众，到地主家搬取桥板，把木桥重新架好。地主阻拦无效，就恐吓农民。但农民因为有党撑腰作主，就不怕地主。他们说：“地主再来拆桥，就打他！”这样，革命力量就在农民日常斗争中日积月累，由小而大。

至于武装斗争，在如泰地区，王玉文、徐芳德等同志在“五一”起义以后不久就开始领导的小型武装游击活动一直很活跃。他们发动群众，惩办豪绅恶霸，收缴地主枪枝，又迅速扩大了农民武

装。不久，就打起了红军旗号，一九二九年六月，由特委在宝庆寺大会上宣布了如泰工农红军的成立。在通海方面，经过一九二八年冬和一九二九年初的旧历年关斗争和春荒斗争，群众比较充分地发动起来了，三益、余中、余东、余西四个区都成立起武装小队，后来便发展为活动于通海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农协会、妇女会、少先队以至儿童团，则随着赤卫队去打土豪、分粮食、烧田契。国民党的基层政权瘫痪了，穷苦百姓耀武扬威，红色游击区域逐渐形成。

中共江苏省委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斗争形势，于一九二九年秋决定成立通海特委，指定李超时同志为书记，王玉文、张辛（吴锡仁）、陆克、顾臣贤和我为委员。特委成立不久，即领导通海如泰人民胜利地进行了粉碎敌人对红军“包剿”的斗争。同时，在革命队伍内部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工作，大大提高了战斗力，进一步发展了革命形势。

到了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江苏省委召开了党的省二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除各特区及上海各区的代表外，有李立三、周恩来、项英、李维汉、李富春、陈云、李硕勋诸同志。通海特委向大会汇报了本地区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情况。此后，党中央和江苏省委决定在苏北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那时，中央苏区已有一个红十二军，浙江西南部有一个以胡公冕为军长的红十三军，向北排到通海如泰地区就列为红十四军。江苏省委先后派何昆、徐德、黄火青等大批熟悉军事的干部加强部队工作。任命何昆为红十四军军长，通海特委书记李超时兼政委，薛衡竟为军参谋长，余乃诚为军政治部主任，徐德、黄火青分别为如泰边境和通海边境的军事特派员。

红十四军军部的成立，标志着红十四军的诞生。

军部成立后，将红军武装进行了整顿，加强了党的建设和纪律教育，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军部将全区游击武装统一编制。通海方面红军编为第一支队，刘廷杰为支队长；后改为二师，秦超为师长，陈雪生为政治部主任。仇建忠、唐楚云、陈宗恒、俞海清等分别担任各大队（营）的领导工作。如泰方面的红军编为第二支队，后改为一师，由何昆兼任师长，黎时中为政委。张爱萍、何扬、许坤（周方）、曹玉彬（郑文林）、沈诚（孙大椿）等分别担任各大队（营）的领导工作。

经过整顿，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大大加强。在反击敌人的“六县联合包剿”中，接连打了许多胜仗。三月下旬，通海方面红军一大队接连打下敌重要据点四扬坝和四甲坝，如泰红军打下了卢庄。红军声威大震。

一九三〇年四月上旬，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军部在如皋西南乡贲家巷召开了有数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建军大会。红十四军指战员和周围几十里内的赤卫队员、农会会员、妇女会员、少先队员，兴高采烈地来到会场。通海特委代表张辛同志在万众欢腾中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的成立，宣读了负责干部名单。会上，还发表了红十四军宣言——《告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书》。这一宣言还印成传单，在上海等地散发。

贲家巷大会之后，红十四军进行了两次规模空前、影响很大的战斗，即围攻如皋老虎庄和南通汤家直（今在海门王浩公社汤家沟境内）的战斗。

老虎（户）庄的位置在通海和如泰两大游击区之间，高堡深沟，易守难攻。敌人驻有保安团，县警察大队和省保安队一个中队，严重地妨碍我东、西两个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四月十六日，红

十四军二支队（一师）三个大队，加上赤卫队和自动前来支援的群众共一万几千人，分三路进攻。二大队由张爱萍同志指挥，从东老虎庄和前老虎庄之间渡河，直取中老虎庄敌保安团团部。进攻发起后，我担任主攻的二大队奋勇向前。由于敌人集中火力顽抗，加上河水很深，部队冲不上去，军部重新调整部署。何昆军长亲自带领战士冲锋，端着手提式机枪向敌人炮楼猛扫，把敌人机枪打哑，战士们纷纷冲上去。但就在这时，何军长不幸中弹，英勇牺牲。部队撤了下来。

何昆牺牲后，由李超时继任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我接替通海特委书记，张世杰（朝鲜籍）任一师师长。

老虎庄战斗结束不久，活动在通海方面的红军二师，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组织了进攻汤家直的战斗。五月二十日，我二师指战员带领广大赤卫队员浩浩荡荡向汤家直进攻。战斗发起后，敌人躲在碉堡里扫机枪。南北两路的红军和赤卫队便放火烧碉堡。这一仗烧死、杀死敌人六、七十人。

汤家直和老虎庄的战斗推动了群众斗争的新高潮，在苏北农民的斗争史上，留下了很大影响。此后，红十四军乘胜转战，挫败了敌人的“八路围剿”。

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通海如泰东西两大游击区得以形成和发展。通海方面（东区），以南通东五区为中心，北到如皋东乡（今属如东）的掘港、马塘、南坎、北坎，东到余东、五里墩、土地堂，南到海门凤凰桥，西到石港、骑岸、十总渡等地。这个游击区的红军主力约七百多人（二师）。如泰方面（西区），以如皋的江安、卢港两区为中心，西起扬州的吴家桥、高汉庄，东抵南通的平潮、白蒲，南到江边，北至东台的莫庄、青墩。这个游击区的红军

主力约六百多人（一师）。

军事上的胜利推动着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一九三〇年春夏间，在宣布红十四军建军的鼓舞下，游击区各地纷纷建立了工农革命委员会，通过了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建立和扩大红军游击队，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并开始逐项实施起来。东西两区，都进行了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的尝试。至此，红十四军的斗争，达到了高潮。

红十四军的失败及原因

一九三〇年夏，革命斗争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内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也有了发展。这年六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主持下，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就使得本来在局部地区部分工作中已经存在着的左倾错误，变成全国性的问题，给革命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

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通海特委在游击区中实行了若干“左”的政策，脱离了一部分应该团结和争取的中间力量。对红十四军的活动，有人曾在会上提出过“准备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南京”等不切实际的口号。虽未形成决议，组织行动，但左倾冒险的思想苗头已大为抬头，以致在敌人集结强大兵力、形势对我显然不利的条件下，多次进行了缺乏准备的进攻，使部队遭到重大损失。对此，我们特委是负有责任的。七月底、八月初，特委和军部发动和领导了“八三”黄桥暴动，认为这是“江北革命政权与反革命政权最后决战”。八月三日这天，配合红军作战的武装农民约

有四、五万人。红军主力部队由李超时、徐德两同志指挥。这一仗开始打得很好，但在关键时刻，由于内奸破坏、暗通敌人，使我军腹背受敌，伤亡很大，不得不撤出战斗。

此后，敌人疯狂反扑，我军化整为零，进行艰苦的游击战。到九、十月间，在敌人重兵进攻下，红军主力部队被打散，许多同志在作战中英勇牺牲，少数转移到中央苏区或其他革命根据地，还有一些荫蔽下来继续战斗。红十四军遭到失败。

此后，从一九三〇年底到一九三三年间，江苏省委曾多次派同志到通海如泰地区进行恢复工作，但都没有成功。到一九三三年六月，南通地区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至此，本地区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武装活动，实际上已暂时停止。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新四军和上海地下党江苏省委分别在西部和东部恢复、发展和重建党的组织，革命斗争又进入了新的阶段。

红十四军的失败，有着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是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特别是由于通海如泰靠近上海、南京，敌人便于调集兵力，就近组织“包剿”。据不完全统计，敌人用来进攻红十四军的反动武装，包括正规军和地方团队在内，不下万人，武器装备优良，力量大大超过我们。从主观上说，除了缺乏经验和少数组织不纯等因素外，主要是左倾路线，特别是立三路线的影响。起初，地区的领导受到“不顾环境，一暴了事”的影响，使“五一”起义遭到挫折。以后，又给红军提出了力不胜任的要求，并在游击区实行了若干“左”的政策，致使红十四军遭到失败。在红十四军失败以后，恢复工作也因未能注意荫蔽、坚持和积聚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了例如以武装小组与强敌硬拚等不适当的斗争方式而终于失败。

红十四军虽然失败了，但他以近两千名红军战士，在共产党领导和广大人民支援下，战斗在蒋介石国民党盘据的腹心地区南京、上海之间，高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旗，抗击着近万余国民党主力的进攻，在一定程度上拖了蒋介石的后腿，牵制和分散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对中央苏区红军以及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进攻，支援了大江南北的革命斗争。由于它在群众中的革命影响始终存在，革命火种也从未熄灭。一些转移到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同志，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中始终坚持着战斗。在本地区荫蔽下来的同志，则在继续斗争的同时，积极寻找党的关系。后来，到了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经过顾民元等同志的多方联系，上海党的地下机关终于在南通地区重建了江北特委。以后，新四军东进，在进行著名的黄桥战役时，如泰人民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支前工作。黄桥附近的一位老大娘对儿子说：“你父亲的队伍回来了，快去吧！”一位当年参加过赤卫队老的农，用一根支前扁担当武器，缴获了反共顽军的一架机枪。当年的红军战士、赤卫队员，拿起埋藏多年的武器，投入了新的战斗。这说明，红十四军的革命精神被继承下来了。

李维汉同志在《回忆红十四军》题词中写道：“红十四军和通海如泰地区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革命传统永放光辉”。对红十四军斗争意义作了精辟概括。

一九八〇年二月，我从如皋专程瞻仰何昆军长陵墓，写了《怀念红十四军军长何昆、李超时烈士》诗：“奋战不顾身，忠党爱人民，勇开光明路，青史育后昆。传颂垂半纪，后继欣有人，四化建设者，循序快攀登。”

铁窗夜书有尽时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章夷白

章夷白

出了叛徒

一九三一年三月，上海麦根路某大资本家住宅的楼上，是当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个秘密工作机关。我在那里负责秘书工作，黄埔军校六期学生黄文华（江苏人，又名黄大霖）负责文印和交通。上海当时租房是“非眷莫问”的，因此组织上安排了一位四十多岁的杨嫂嫂（其爱人被捕在狱中）带一个五岁多的男孩，和我们组成了一个四口之“家”。

一天下午，房东要佣人突然上楼来找黄文华说：“黄先生，请接电话。”黄接完电话回来，面有紧张不安之色，我问他是谁来的电话，他答：我的一个朋友。我便批评他不该违反秘密工作原则，把机关电话告诉外人，他不说话。我把这一情况向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谭寿林同志作了汇报。

过了几天，组织上通知黄文华，立即搬出机关到旅馆去等候分配工作，并叮嘱他搬出后不要再回麦根路机关。黄走后两三天，谭寿林同志又通知我立即迁至上海四马路石路同仁旅馆，等候组织分配。我马上收拾行李，坐人力车到了指定旅馆。

这是上海一所普通旅馆。南来北往的旅客多在这一带旅馆落脚，因而比较便于隐蔽。我用章慕勇的假名开了个单间，房间正好在走廊的尽头处。

住进旅馆后，每天除了买张半价的隔天日报看看外，就是读带来的几本创造社出版的小说。极少外出，静候组织派人来通知分配工作。时间似乎特别过得慢，度日似度年，五天过去了，还不见组织上来人。等到第六天，即四月二十二日早八点钟左右，我正躺在被窝里看头天没看完的报纸。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没等我穿衣下床，两个身穿深灰色长袍，外罩黑背心，歪戴一顶灰礼帽的彪形大汉就推门进来了，一看便知是上海滩头的“包打听”。其中一个把着门，两只贼眼滴溜转。另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皮笑肉不笑地嘿嘿两声，问我：“你是章慕勇吗？”

我略略欠起身子冷静地答道：“是的。两位有何贵干？”

“哦，有一位朋友要找你叙谈叙谈，等一会你就会知道是什么事。起来跟我们走一趟吧！”话中已露出不容分说的味道。

我故意慢慢地穿着衣服，脑子却在想着如何应付他们，除几本进步小说外，我没带任何文件，只是贴身衣服的荷包里有一纸秘密通讯处，万万不能落入敌手，必须设法毁掉……。我一边结着扣子一边便往外走说：“我刚起床，要出去小便。”想借机把一纸秘密通讯处毁掉。哪知“横肉”立即迎了上来，张手一拦说：“你不要出去！”

我扫了他一眼，说：“那么对不起，我只好在房间里小便了。”说完，慢慢向房角落放马桶的地方走去，嘴里若无其事地和他俩闲扯着今春上海天气反常之类的闲话。我背对“包打听”，作出慢慢宽衣小便的姿势，迅速从荷包里取出纸条，撕成碎片，丢入

马桶。他们竟然毫不觉察。我长长地舒了口气……

正当我再多穿几件衣服，以备抵御狱中之寒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党中央地下报《红旗报》社的肖伯唐同志（被捕时改名周绍文）突然出现在门口，他是来找我的。一看房内情势不对，便装作路过的样子，但前面是个尽头，只得转身往回走。把门的家伙马上扑过去，一把抓住他，质问他找谁？肖伯唐同志连忙说：“我找错地方了。”那“包打听”毫不放松，非要他说出要找哪间房不可。肖伯唐同志只好胡说乱说了个房间号以求脱身。老奸巨滑的“包打听”拉着肖伯唐同志找到该号房间，那位房客端详一阵说：不认识这个人。这家伙便把肖带回我的房间，两条狗为这意外的“收获”狂笑着，用一副手铐，铐上我们两人，推上囚车，径直解往英租界老闸捕房。

敌人怎么知道我在旅馆呢？是我回麦根路机关看望杨嫂嫂时被敌人盯上了？莫非机关出了事？……

到了老闸捕房，我们先被带进一间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我仍用章慕勇的假名，接着便是按手印，让我十个指头都蘸上紫色印水，逐个指头在特制的纸上按下指纹，然后除大姆指外四指并拢一齐按，左右手各按一次。据说每个人的指纹是不相同的，从指纹上可以查出是初次被捕或重复被捕。办完手续后便把我俩关进一个铁笼子里。这是个名副其实的铁笼子，只有三米见方，水泥地，四周围罩着一层铁丝网，只要铁门一锁，就是善变的孙悟空也难逃走。不过，却可以看见铁笼外的过往行人。我向四周扫视着，忽然，看见谭寿林同志穿着西装从过道一头匆匆走过，没带手铐，后面紧跟着两个人。他怎么也来了呢？我更惶惑不解了。过了一会儿，他也被推进铁笼子来了。我向他使了个眼色，装作互不相识的样

子。

傍晚，我们三人一起被押进巡捕房看守所装有铁栏杆的号子，这里已经关着几个人，谭寿林同志悄声告诉我，组织上发现黄文华有叛变嫌疑，故通知我立即离开机关，现在我们两人均被捕，肯定是黄文华叛变出卖无疑了。

敌人一天没给我们东西吃，肚子饿得难受，同监一个年青的刑事犯从衣兜里掏出块年糕给我，说：“开过晚饭了，吃吧。”我毫不客气地几口吃了下去。

晚上，春寒料峭，躺在阴湿冰冷的水泥地上，觉得透心地凉，每人发一条破毯子根本不能御寒。寿林同志挨近我说：“明天各向何方，实难预测，今晚我们紧挨着睡，亲热亲热吧！”我被寿林同志深厚的情谊所深深感动。

第二天上午，寿林同志先被提审，临走时他用目光向我示意，要坚定。之后，就再没见他回来，我颇感不安。接着便提审我，只见审讯席上坐着几个中国人，当中一个用恶狠狠的腔调问过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后便说：“你是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的？在共产党里干什么？”

“我刚从湖北来上海谋差事，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更没替共产党办过什么事。”我平静地回答。

此时，原告席上传来一个结结巴巴的话音：“有人……控告章慕勇是……是……共产党，请法……法官允许将犯……犯人引渡到上……上海市公安局审……审理。”此人身穿国民党警察服。又矮又胖，象个肉球。他是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派来的。

律师席上霍地站起来一个戴眼镜的人，他假装一本正经地说：“章慕勇只有两本带共党色彩的书，说他是共产党，证据不足。如

果没有证人，本律师认为不够引渡条件。”这个戴眼镜的人是英国巡捕房为标榜所谓民主法治而设的公共律师。

“原告有无证人？”法官问。

“证人没有……没有来，法官先……先生。”“肉球”毕恭毕敬地回答。

“没有证人，不能引渡。”法官说完便宣布退庭。

因为我住的旅馆地处英租界，根据国民党卖国的治外法权规定，在外国租界里，国民党政府没有逮捕权。要逮捕中国人必先通过英国巡捕房，故有引渡此举。

第三天提审，法官直接问“肉球”有无证人。“肉球”回答：“证人还没来”。便又退庭。这次提审前后只有几分钟。

又隔了一天，看守进来，一把抓起我的衣领，气势汹汹地往外推。到了法庭，当法官宣布开庭后，只见“肉球”滚到法官身边，踮起脚跟，在法官耳边嘀咕一阵，法官便宣告：“被告章慕男退庭等候！”我退回候审室，过了约半小时，重又被召出庭。这回法官问也不问便宣布：“准予引渡！”立即把我解往上海市公安局。而那个所谓“公共律师”这时却闭口不言了。

我在巡捕房前后被关押一星期，这短短的七天却使我领教了帝国主义的所谓文明。七天里只让我洗一次脸，每天两餐食不充饥的无菜黄米饭。

路上，我分析一周来的情况，引渡，固然是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合演的一出双簧戏，他们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共产党人，却还要装模作样！我暗暗发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与这些恶魔斗争到底！

担心的是，不让我会面的叛徒“证人”，这条自动投敌的“癞

皮狗”将会去伤害更多的革命同志。但身入牢笼的我，此刻却毫无办法。果然不出所料，继我之后，又有十多位同志因叛徒黄文华出卖而先后被逮捕。

初 受 考 验

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一排三间关押男犯人的号子。寿林同志已先我关在第二个号子，我和肖伯唐同志关在第一个号子。隔着砖墙，传来寿林同志亲切的声音：“不要怕，至多皮肉受点苦，没什么了不起。我已把我们被捕情况转告监外党组织。”寿林同志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安慰。

第二天上午，我、寿林和伯唐同志同时被提审。我们带着手铐脚镣，出了监房，穿过院子向刑讯室走去。突然看见叛徒黄文华西装笔挺地站在通往刑讯室的路旁，我鄙视地瞥了他一眼，他脸上惶惑不安的表情暴露了他内心的恐惧与空虚。他为什么在此时此地出现呢？是偶然相遇？不！这是敌人的特意安排。其用意是告诉我们：隐瞒是无用的，不招供不行。但是敌人枉费心机了。叛徒告密，我们不仅早已知道，而且早有对策。

到了候审室，寿林同志趁看守不注意，用脚在地上画一个“不”字。我立即心领神会。是的，不要害怕严刑审讯，不能泄露党的机密，更不能动摇变节出卖组织和同志。这个“不”字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寿林同志平静地走向刑讯室。

突然，一声惨叫划破了候审室凝固的空气。接着听见寿林同志愤怒的高喊：“不知道！”寿林同志正受着“老虎凳”的折磨。但从敌人的嚎叫声中，我仍然清晰地听到寿林同志一再重复的三个字；

“不知道！”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寿林同志被两个打手架着出来，他的双腿在地上无力地拖着，人已经昏迷过去。

轮到我了。一进刑讯室，只见主审人铁青着脸，打手们站在旁边喘着粗气。看到这群家伙的模样，我只感到自豪，心里充满了蔑视等待着酷刑的考验。

“你认识谭寿林吗？”敌人暴躁地问。

“不认识。”我大声回答。

“你认识黄文华吗？”“不认识！”

“他妈的！一问三不知。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从实招来！”主审人已经近乎吼叫了。我脑中突然闪过黔驴技穷的典故，心里觉得好笑。

“我没有参加共产党，我是到上海谋差事的。”我仍然平静地回答。

“他妈的，不招供，给我打！看你们这些共产党骨头有多硬，给我打！打！……”主审人疯狂地喊叫着。

几个打手蜂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一阵棍棒下来，顿时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寿林同志用脚画的那个“不！”我忍住火辣辣的剧痛，仍然是一问三不知。敌人无计可施。只好愤愤地嚷：“你不讲有人会讲！”便把我架回号子。

过了半个月，我们三人被解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因地点在龙华，又称龙华司令部）。一下囚车，寿林同志被单独带走，后来才知道，他被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并于八月一日前后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二岁。

谭寿林同志是广西贵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很有才华，对党无限忠诚。工作中他是我的好领导，监狱里他是我的好榜样。他用生命和热血写成的“不”字，鲜明地刻划出他英勇不屈的高尚品德。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寿林同志的形象一直鼓舞着我前进。

临 难 节 独 全

在我被解到龙华司令部看守所以后，才知道罗重民（谢宣渠）、李曼蒂（现名李尔嘉）因到同仁旅馆找我而被捕已先解来了。在我被解到之前，看守所已有我党特别支部。负责人是焦允平（焦敏之）、王明汉（刘晓）、罗重民（谢宣渠）。女监支部负责人先是陈秀英（曹芹），后是吴如（李沫英）。党支部除了解每一个党员的案情和在看守所表现以外，更重要的是及时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党员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严守党的机密；稳定情绪，准备“口供”；努力学习，互相帮助；联系和教育党外群众，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英勇献身。因此，狱中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铁骨铮铮的好汉，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如关向应、刘晓、陈为人、李沫英、陈琼英、张月霞等。特别是杨匏安和肖开元两烈士的英雄事迹更应该名垂史册。

杨匏安同志是我党五届中央委员，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在上海被捕，关在龙华看守所第三弄。敌人的严刑拷打，丝毫动摇不了他的革命意志，终判他以死刑。但匏安同志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他拳拳于心的是要鼓舞狱中战友，尤其要争取挽救同监中消沉动摇的罗绮园。在他临刑前夕，他与罗促膝长谈，并写就义诗一首相赠：

慷慨登车去， 临难节独全。
余生无足恋， 大敌正当前。
投止穹张俭， 迟行笑褚渊。
这番成永别， 相视莫潸然。

杨匏安同志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其英灵与天地共存。周恩来同志十分钦佩杨匏安烈士的崇高气节，经常吟诵这首大义凛然的诗篇以自勉，并常用它教育后来处在艰险环境中的同志。

肖开元同志是我党派到国民党熊式辉第五师做兵运工作的，被捕后关龙华看守所一弄，和我同住一个号子，敌人以军事政治犯的罪名判他死刑。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敌人给他作了临刑前的照相，预计下星期一执行处决。肖开元同志照相归来，非常镇定，谈笑自若。晚饭后，他为难友们唱了几段京戏。星期日，我们这些政治犯凑钱买了点酒菜为他饯别。我们一边喝着苦酒，一边说些鼓励安慰他的话。他举起酒杯说：“同志们！我当共产党那天起，就准备好有今天。共产党员不怕死，怕死不当共产党！希望你们安全出狱，继续奋斗。干杯！”一饮而尽。

星期一清晨，大家很早便起床。全看守所沉浸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不久，传来刽子手的嚎叫声。开元同志站起来，徐徐脱下青色的学生装，捧到一个青年面前，深情地说：“小左（左万如），谢谢你借给我的衣服，现在我用不着了，还给你。好好保重！”小左一下扑到他的胸前。开元同志抬起他的头叮嘱说：“要坚强！”接着便与难友们一一握别。

难友们涌在弄口，一个个含泪无语，目送着战友奔赴刑场。肖开元同志一出弄门，便拚尽全身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声震屋宇，气壮山河！致使押解他的看守宪兵也不得

不称赞肖开元烈士“确实是个共产党的英雄好汉！”

制服牢头

龙华看守所共有三个弄堂，每弄十个号子，每个号子有四张双层床，关八个人。我被关在第一弄顶头靠厕所的号子里，整天被臭气熏得头晕眼花。

各弄口的铁门日夜紧锁，但同一弄各号子的门白天都敞开，故号子之间是可以互相串门的。只要有钱，还可以买到酒菜之类的食品。于是，几个被捕较久的绑票犯、盗窃犯、自称“牢头”，经常聚众赌博，并结伙成帮，仗势欺人，硬要抽取头钱以自肥。他们天天在牢里喝酒吃肉，引起其他难友的强烈不满，但又慑于“牢头”的恶势，敢怒而不敢言。

自从我们大批政治犯关进来以后，感到有必要制止这股恶势力，狱中党支部决定把这笔头钱夺过来，以加强狱中济难会，接济有困难的难友，于是，决定由我出面，制服“牢头”，接管头钱。经过党支部和政治犯们暗中串连后，一天，我向全弄难友公开宣布：“我是犯人总代表，自即日起，头钱统归我管，用来接济生活困难的难友。”我话音刚落，一片叫好声，有的还鼓起掌来。几个牢头见众人齐声拥护，便不敢吭声。自后我每天挨赌摊收头钱，那些只靠吃牢饭，外面毫无接济的难友便可以从我这里领到理发钱、买药钱……皆大欢喜。我用一个英文练习本记下头钱的收支账目。由于我有人多势众的“政治犯”作后盾，又秉公无私，几个牢头虽因不能再大吃大喝而对我恨得咬牙切齿，却也不敢不从。但他们都是上海滩的“地头蛇”，绝不会对此善罢甘休的。过了一两个月，他们终于向我报复了，

一天，看守长喊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说：“有人告发你在看守所里进行共党活动。”我一眼瞥见他手里捏着我那个头钱收支账本，顿时明白，是牢头们偷了我的账本诬告我。但他们作贼心虚，不敢说出我那本儿是头钱账，因为聚赌抽头钱是他们干起来的，揭发出来，他们也难免因违反监规而挨一顿打。我想：你们不提那一壶，我也不端那一锅。便说：“那是我自己的账本，难友借了我的钱，我怕忘了，记下来。”在牢里是不许有笔，更不许写东西的，连写信也要到指定的地方去写。我记帐犯了监规，但从账面上敌人找不出任何共党活动的字据，只好以违犯监规之名，毒打我一顿，并加钉一副大脚镣，从一弄调至二弄关押。我虽挨了毒打，但牢头们也不敢恢复他们剥削难友的旧规。

照相之谜

平日的龙华看守所，百十个人在一起，吵吵嚷嚷，人声嘈杂。

一天上午约九时左右，铁门咣啷一响，姓蒋的看守班长进来大声喊我，还有肖伯唐同志和他的新婚妻子李曼蒂同志，以及焦光华一案的五个人出去照相。大家一听说“照相”，便以为要枪毙人了，特别是认为我是本案的主犯，要遭枪毙肯定无疑的。顿时全看守所鸦雀无声，人们都悄悄回到各自的号子，心情沉重地关注着我们几个人。我整理了一下衣服，步出牢房。到了照相的地方，我对肖伯唐、李曼蒂同志说：“我们刚被捕那次照相，为使叛徒不易辨认，都故意低着头照，现在就要枪决了，不怕暴露面貌。我们要昂首挺胸，横眉怒目地照，以示对敌人血腥屠杀的抗议！”他们都点头赞同。唯有一个姓焦的怕得直发抖，又要充硬汉。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怕……什……么”。我生气了，说：“看你这熊样！怕什

么？别怕！”

照完相回到监房，难友们都围了上来，有的问蒋看守班长是不是要枪毙人？姓蒋的说：

“不是。是判徒刑押送江苏第二模范监狱（因地点在漕河泾，亦称漕河泾监狱）执行。”

“你别骗人，在司令部照相都是要枪毙的。”

“别胡闹，规矩改了，不是枪毙。都回号子去！”姓蒋的说完，排开众人走了。

谁也不相信他的话，都以为他是为了稳定人心在故意撒谎。

按龙华看守所一般情况，死刑都是照相后第二天执行的。我便抓紧时间给党组织和关系较好的同志写信，将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告诉党和同志们。还写了一首诗，记得有这么几句：

今朝，只有今朝，

今朝呵，我还是这么逍遥。

明朝，悲壮的明朝，

明朝呵，我将要辞你永别了。

永别了，永别了，

光荣的永别，何须畏惧，

这是共产党人的骄傲。

留得英气在，万代人间照。

但祝愿，亲爱的同志们，

逃出这人间地狱—反动统治阶级的监牢。

监牢，监牢，

不知牺牲革命志士多少！

呵，革命怒涛到处汹涌，

必将埋葬蒋家王朝！

……

信未写完，当天下午三点钟，又听到看守喊我，难道等不到明天，提前执行了吗？难友们紧张地打听消息。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刘行之同志缠住蒋看守不放，要问个究竟。我说：“蒋班长，我不怕死，你明白告诉我是枪毙还是判处徒刑解到监狱执行，我好有个准备。”姓蒋的说：“别胡闹嘛，不是枪毙，是判有期徒刑。”我还是不信他的话，把长袍和西裤脱下，准备留给难友。只见刘行之同志兴奋地跑来告诉我：“确实不是枪毙，我见到公文了。写的是判十年徒刑，解往漕河泾监狱。”

“真的不是枪毙？”“不是！”“不是！”大家兴奋地传递着这一消息。我深深为同志们生死与共的精神所感动。我重又穿上长袍西裤，昂首奔赴法庭，听“五堂会审”（即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法院和上海市公安局联合会审）的宣判。这时，看守所里重又热闹起来了。

十八层地狱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经“五堂会审”宣判十年徒刑后，当即被解往漕河泾监狱关押。进了漕河泾，我真有点留恋龙华看守所了。如果说地狱有十八层，漕河泾应该是最底层。

该监为一个八卦形结构，除了一个通道以外分甲、乙、丙、丁、戊、己、庚七个监房。我被关在庚字监，这是专门关押刑期长的犯人的。一进监房，发给我一件长到膝盖的灰色囚衣，衣后面缝上一块正圆形白布，上面写着我的番号“121”。从此只叫我的番号，不叫姓名了。我所在的号子，宽不够横伸两臂，长不足两个铺位，关两

人。因为放不下两个床，只好把两块床板头对头重叠起来，高个子的睡上一层，矮个子睡下层。一人下地走，另一人则必须坐或站在床上，否则转不开身。号子门日夜紧锁着，仅留一个三寸见方的洞口递送饭食和看守监视犯人用。门后放一只马桶，大小便都在号子里。后墙上那个只有二尺高一尺宽的小窗，被密密的铁棍和铁丝网紧封着。室内光线昏暗，空气污浊。尤其在炎夏，汗味加马桶的臭味，简直令人窒息。所以国民党官吏们都不愿意到监房里来查询，偶而来一次，也是匆匆掩鼻而过。

每天两餐的霉臭米饭，合起来也只有四两左右，里面稗子成堆，砂子、老鼠屎比比皆是。我刚进监狱时，每次还将饭中稗子拣出，后来，因饭量不足以充饥，便把稗子统统吃掉。菜更是难以入口，发臭的烂菜帮，稍为煮一煮，没有一点油星，倒还经常从中拣出大使用过的脏纸。我们只好化点盐水下饭。每天只有两小碗开水，不够喝，渴得难受。而臭虫、蚊子则多得惊人，咬得通宵不能睡眠，有的难友用臭虫血在墙上作画。

看守既凶又狠，常常无故毒打犯人，他们受了上司斥责就拿犯人撒气。有时更以打犯人取乐，让犯人把手摊在板凳上，用木板使劲打，称之为“两面疼”，监狱当局对犯人禁锢极严，不许出号子，不许大声说话。除了听教悔师读佛经、圣经之类外，不许阅读进步书报。由于营养极差，卫生条件极坏，牢内各种疫病流行，浮肿病更为普遍，而狱医极不负责，不管什么病，都喝一种既喝不死人也治不了病的中药汤，大家称之为“大锅药”。狱医把脉时根本不看病人，一次有位难友悄悄把手背翻转向上，狱医按不出脉动，大吃一惊，一看原来按在病人的手背上了。因此狱中死亡率很高，平均每天都有一至二人死亡。不少同志经住了敌人的严刑拷问，却经不

住恶劣环境的长期折磨而病死在狱中。

为了生存，“庚”字监的犯人酝酿着与监狱当局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斗争，后因上海“一二八”战争爆发而转移了。

“避难”与斗争

“一二八”战争爆发，日机轰炸频仍，狱中犯人特别是政治犯群情激愤。通过秘密串连，各个号子同时喊出：“要求释放，参加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宁愿战死在抗日疆场，不愿被炸死在牢里！”……敌人更害怕轰炸中犯人逃跑，便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以避轰炸为名，把三年以上刑期的八百左右犯人，强行押往杭州陆军监狱。

那是一个清晨，漕河泾监狱好比开了锅一般。难友们的抗议声、敌人的吆喝声，响成一片。敌人把我们每两人合铐一付手铐，合钉一对脚镣，然后用一根粗铁链把五对犯人串在一起，押往上海火车站。我们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两人必须合拍走，否则脚镣就把脚蹠刮得皮破血流。大、小便更是受罪，一人解手，九个人都要一齐去。

到了火车站，在共产党员、政治犯的鼓动下，全体难友拒不上火车，口号声此起彼伏：

“立即释放我们出狱去抗日！”

“大丈夫宁为抗日死！”

“我们不到杭州避难！”

押解我们到杭州去的敌营长急的团团转，他跑到高处，两手作个喇叭筒状，喊起话来：“同志们！……”

话音未落，哄的一声，大伙骂开了，

“他妈的，谁是你的同志！”

“找你的同志避难去吧，我们不怕死！”

“听着、听着！”敌营长嘶哑着喉咙继续喊，不敢再称同志了。

“不上车，日本飞机可没长眼，炸起来可不得了哇！”

“我们不怕轰炸！谁怕死谁上车！”大家又叫嚷起来。虽是寒春季节，敌营长急得满头大汗，军帽被推到后脑勺上，又打手势又叫喊，无奈还是盖不过这七、八百人的声音。

不久，增调来大批军警，前拉后推，连打带踢，用了好几个钟头，才把我们推上火车。

到了杭州火车站，下了车，步行去杭州陆军监狱。大家离开了人间地狱“漕河泾”，来到这号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西子湖畔，心情非常愉快，和着脚镣铁链的叮当声，不约而同地放声唱了起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

歌声雄壮豪迈，唱出了囚徒的心声，唱出了中华民族的心声。我和许多难友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站在马路两旁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被我们的歌声与激怒所打动，有的不住地向我们点头微笑；有的怒视押解我们的看守和宪兵，有的向我们招手致意；有的不顾军警阻挠，走上前来把纸烟塞到我们手里……此景此情，真是永生难忘！沿着西湖走，我们饱赏了西湖美丽的景色，浩淼的湖光水色，几乎使我忘却了囚徒的身份。

杭州陆军监狱已有人满之患，从漕河泾来的八百多人他们只收容了六百。余下二百多人临时关押在著名的杭州昭庆寺里。

昭庆寺寂静的殿堂突然热闹起来，金色的如来佛祖似乎一改往日的善颜善面，正以惊异的目光，看着我们这群衣衫褴褛的“不速之客”。这时，与我合钉一付脚镣的颜孟平同志（因为他在上海当律师，常为被捕的共产党人作辩护，因而被捕）。因不堪敌人的折磨，突然休克倒地，我不能走动只好站在他身旁眼巴巴地等候姗姗来迟的狱医前来抢救。待到孟平同志苏醒过来，我却几乎累倒了。

在漕河泾，我们整年整月被关在窄小的号子里，现在竟有二百多难友聚会一堂，大家格外高兴。为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开展对敌斗争，我们马上讨论研究成立临时党支部。大家一致推举肖伯唐同志当支部书记，黄瘦农（现名黄石如）同志当支部宣传委员，我当组织委员。为什么让我当组委呢？大家认为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有点军事常识，一旦有机会越狱，要我多出点主意。但不久，因几个绑票犯试图逃跑未遂，敌人赶紧把我们统统押上轮船，并出动炮舰护航，如临大敌般把我们解往苏州军人监狱去了。时间是一九三二年的三月三日。

狱中的火种

国民党苏州军人监狱共分改、过、自、新、病五个监房，可关押五百多犯人。我们这批从杭州昭庆寺来的大部分关在新字监，部分关在自字监。苏州军人监狱在我们来之前已建有党支部，我们来后，通过在狱中当狱医的黄昙同志（即黄鼎臣同志，他曾曾在日本学医，一九二八年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被捕，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党支部通过活动，让他作狱医，以借行医之便，来当狱中“交通”。）与狱中原党组织取得联系，合并为一个总支。不久，因苏州军监过于拥挤，敌人又把一百犯人解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原党

总支负责人李满书、张志华等均被解走。为了保证党的领导，重新改选党总支。徐建三（徐迈进）同志为总支书记，肖伯唐同志（一九三三年在苏州军监病故）为总支宣委，我为总支组委。各字监的支部成员不变。两三个号子的党员合组一个党小组，组长由总支指定。

新的总支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工作：

一、加强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取得有关党的方针、政策等材料，及时传达给每个党员学习讨论，提高认识，坚定为实现共产主义继续奋斗的决心。

二、加强狱中党内外难友对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的学习，把监狱变成一所学习政治、文化、科学的大学校。

三、加强对党外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扩大进步力量。

四、领导狱中斗争，改善生活待遇。

为了更好地联系狱中斗争实际，发挥宣传教育作用，党支部创办了一个秘密小刊物——《囚声》，由我当主编。党内外难友均可投稿。刊物只有练习本的四分之一大，由钟明同志为封面画了一个囚徒在铁窗后愤怒呐喊的形象，颇有震撼力，每期均由我和其他一、二个同志轮流秘密抄写，然后在政治犯中秘密传阅，这在当时，确也成为狱中文化沙漠里的一掬清泉。在同志们的精心保护下，始终没被敌人发现。后因敌人加强对犯人的控制而被迫中断出版。

当时，我们与狱外组织建有经常性的联系，广大党员也能自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在狱中威信日渐提高。

狱中党的工作是在敌人严密监视下进行的。苏州军人监狱有一批既凶狠又狡猾的坏家伙，如二科科长游湘，看守长朱××（犯人

称之为“大耳朵”）等。他们千方百计企图破坏我们的秘密联络。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的斗争艺术也越来越高，达到使敌之无可奈何的程度。

各监房之间，由黄县(黄鼎臣)和其他负责狱中外役的同志如沈少华(沈德纯)、杜国政(桂家鸿)，温凉文(温济泽)等作交通，把大家联成一个整体。监房号子之间，我们又创造了几种联络方法：

一种是在床铺底下靠墙根处穿一小洞，把纸条卷在一根筷子上，捅给隔壁号子。递完随即把洞堵上，下次用时再打开。

第二种是空中投掷。敌人为了省电，在两个号子之间的隔墙高处开一方洞，共用一盏灯。我们把字条揉成团，从灯洞扔过去，后被敌人察觉，灯洞加了铁丝网，我们又用搭人梯的办法，把字条从铁丝网眼直接捅过去。

第三种是“打电报”，我们发明了好几种“密码”，通过敲打墙壁传递消息。

第四种，与对面或后面监房的通讯是把消息写在一块小石板上，举给对方看，还可以直接打手势传消息。

为了避免敌人截获字条泄密，我们又创造了一套代用语，即使字条被敌人拿去也看不出真实内容。比如把党支部称为“柜台”，党支书叫“掌柜的”，阶级斗争称为“物价变动”等等。这些代用语曾使我们避免了一场大灾祸。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三三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大家都睡了。徐建三同志代表党总支向监外组织写报告，他先用代用语拟好草稿，正用浆糊水抄写成隐形信。我和他合睡一铺，他睡里边，我们在他的被子里塞进衣服好象人躺着的样子，我睡在外边挡着，他则坐到瞭望孔不易发现的床角落去抄写。我先睡了，不知什么时候李麻子看守查铺，

发现了破绽，悄悄绕到后窗一看，清清楚楚见到徐建三同志在埋头写东西。他立即向“大耳朵”报告，纠集七八个看守，轻轻扭开号子门，猛地扑了进来，几个看守夺走了徐建三同志手中的报告底稿和文具，另外几个则把我紧紧压在被子里，动弹不得，无法起来掩护徐建三同志。

报告草稿和隐形信都被抢走了，怎么办？如果隐形信被破获，上面开列的十多个真名实姓的共产党员都要遭殃，狱中党组织也要受到破坏。我俩异常忧虑，彻夜不能合眼。天刚发亮，我们便起床商量对策，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我们商定，如果敌人发现隐形信的内容，必须作好牺牲的精神准备。如果敌人没有发现，则由建三同志单独承担责任，绝不牵连其他同志。要一口咬定因为本人身体不好，家贫无力接济，便捏造几个假名单骗取监外，托一个朋友多寄点钱来，买药品和补品。

第二天一早，敌人把徐建三叫到二科办公室，只追问他的信准备交何人带出，没问其他。建三回答说：等候有人获释时带出。敌人给他加钉一付十几斤重的脚镣便送回号子。过了一星期，把徐建三、张志华、杜国政等先后解至南京伪军法司审讯。审讯中，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愚蠢的敌人只注意了用代用语写的草稿，并没发现隐形信内的秘密。徐建三同志便按我们预先准备好的口供应付敌人，而张志华等同志经过徐建三同志的暗示知道了徐的口供，便采取与己无关，一问三不知的态度对付敌人的审讯。敌人在徐建三同志等的口中间不出所以然，就妄想转向我找缺口。

一天，一个从南京伪军法司来到苏州军人监狱的家伙提审我，他先是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对我说：

“你坐几年牢啦？生活很苦吧？年青青的，把大好时光都错过

了。”

我说：“我进监牢快三年了，生活确实很苦。”

“你想出狱吗？”

“当然想。”

“好嘛，现在有个好机会。共产党在狱中的一切活动徐建三都讲了，只要你也讲出来，我们马上释放你。”

我一听便知敌人从徐建三同志口中什么也没捞着，便说：“我完全不知什么共党活动。既然徐建三都讲了，何必又来问我呢？”敌人无话可说，就转了个话题：

“徐建三信上说，每一个月向监外共党写一次报告，上次是什么时候写的？”徐的草稿上确有一个月写一次报告的字句。

“难道你们忘了徐建三到我们号子还不到一个月吗？我怎么知道一个月前他在别的号子干什么呢？”

敌人恼羞成怒，悻悻地说：“你不讲，你就在监牢里长期呆下去吧！”

我马上接口说：“把我送进监狱，叛十年徒刑，本来就是冤枉的。你们不释放我，我也只好长期坐下去。”

古语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不怕坐牢，以长期坐牢相威胁是徒劳的。

敌人毫无所获，只好将徐等解往伪江苏省高等法院审讯处理。该院第三庭庭长是吴笑予即吴显恒，据说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党，后失掉关系，但仍与党有联系。吴的儿子吴其超，是中共党员，与周绍文同学，由于这个关系，遂写信给吴要求帮助，在吴显恒同志帮助下，宣布徐等与监外朋友通信无罪，不作处理，才避免了一场牺牲与损失。

加 刑 何 所 惧

一九三五年三月的一天，看守突然点名叫出四十个政治犯，我是其中之一。到号子外面集体照相。怎么回事呢？大家都摸不着头脑。有人说是出了“扒灰匠”（即有人告密了），但告密人是谁呢？被照相的同志都猜测着。

过了半个多月，又把我和陈广和（即顾卓新）、陆锦恒（即王致中）、陈复生、肖炳生（陈、肖后在中央军人监狱里牺牲）、郭忠（即潘尔波）、连丕烈（即海潮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等一共九个同志，外加陈某某和钟策。一起解往南京伪军法司审讯。这时，从种种迹象我们已窥察出告密人就是陈和钟。

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钟策买了张小报，看后递给我，该报头条登载着瞿秋白同志被捕的消息，同时登了署名瞿的一首七言诗，只记得诗中情调比较消极低沉。

钟策对我说：“怎样，识时务者为俊杰，不错吧？”

“这是国民党造谣，你就那么相信？我认为是国民党造的谣。说完，就把小报往地上一扔，心想，你想动摇我，找错了对象！”

到了南京伪军法司，敌人把我们九人关在一间大房子里，陈与钟另关一室。我们仔细分析各方面情况，肯定敌人没有抓到我们进行党的活动的任何证据，叛徒告密是妄图出卖我们以换取他们从狗洞里爬出去的资本。只要坚持人自为战的方针，各打各的官司，矢口否认，绝不受骗，绝不出卖，敌人便无所施其技。但是我们九人都已被判八年以上有期徒刑，特别是陈福生同志已判无期徒刑，现又被叛徒诬告，都需要作牺牲的精神准备。大计已定，我们从容等候提审。

第二天，头一个提审我。审讯室里，除了坐在审讯台上的军法官外，台下旁边还多了两只“癞皮狗”——陈某某与钟策。两人猥琐地站在一起。

军法官问：“章慕勇，你在监狱里进行了哪些共党活动？”

我一听，还是那一套。便从容地回答说：

“我不论在狱里狱外都没搞过什么共党活动，本来我被捕判刑就是冤枉的。”

法官说：“他俩说你进行了共党活动。”

我说：“他们说 I 进行共党活动，要拿出证据来，凭空造谣是不行的。”

法官转向陈、钟说：“你们说！”

叛徒嗫嗫嚅嚅，半天才卑微地说：“他确实进行了共党活动。”

我大声说：“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就纯粹是诬蔑。”

法官又问：“你们两人明白说，他究竟有没有进行共党活动？”

叛徒答：“是有活动的。”

我又大声说：“拿出证据来！不能胡说，血口喷人最可耻！”

敌人对我的审讯毫无所得，遂顺次提审其他同志，也以失败告终。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是法西斯专政，对共产党人从来都是实行残酷镇压，虽然他们找不出任何证据，我们亦无任何口供，但仍然对我们九人加判徒刑。我、陈广和、陆锦垣、陈福生各加判八年两个月；肖炳生、郭忠、连丕烈等各加判八年。加刑后被解往中央军人监狱南监过字监九号关押。因我们是加刑的政治犯，敌人视我们犹如洪水猛兽一般，对我们实行严格的隔离和看管。除增加看守

人员外，还调来一个盗窃犯监视我们。以后我们采用各种办法把他赶走了。洗澡、放风以及向监外亲友写信，都是单独隔离进行。并且从一九三五年八月初进监狱起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出监狱止，未调换过号子，这在监狱中是极少有的。而且看守经常无故毒打我们，陈福生、肖炳生两同志就是被敌人残酷毒打成疾而死亡的。陈福生同志（上海劳动大学学生）被捕前任江苏省团省委秘书长、副书记，年仅二十岁。他年青有为，聪明能干，学习努力，理论和文化水平都颇高。我们都很喜欢和钦佩他。肖炳生同志原是上海码头工人，参加过广州起义，曾到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政治理论、文化科学都有较深的造诣。回国后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在他弥留之时，还用微弱的声音唱完《国际歌》。对这两同志的牺牲，我们无比悲痛，失声痛哭。我们发誓：如能幸存，一定要为他们报仇雪恨！

我们擦干眼泪，送别了罹难的战友，又继续和敌人展开斗争。正如狱中难友时时歌唱的《囚徒歌》（徐迈进同志作）中所写的那样：

铁窗和镣铐，
坚壁和重门。
锁得住自由的身，
锁不住革命精神……

别了，牢笼！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略气焰日益嚣张，侵吞我大片国土，屠杀我无辜同胞。蒋介石反动派在国难当头，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掉转枪口，对肩负着拯救民族重任的共产党人实行惨无

人道的血腥屠杀。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芦沟桥一声炮响，狱中大多数犯人，尤其是共产党员和政治犯们，更是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大家强烈要求释放出狱，奔赴抗日前线，收复失地，挽救国家。

党支部决定发动全监难友分头向国民党政府写呈文，要求释放出狱抗日。我们七个幸存的同志提议在呈文中三不写：

- 一、不写拥护蒋介石；
- 二、不写拥护三民主义；
- 三、不写出狱抗日将功赎罪（因为我们没有犯罪）。

不久传来国共合作、释放全部政治犯的消息。大家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

我是第三批释放的。那天看守在喊被释放者的囚号：“273号”（这是我在中央军人监笔的番号。）我应声出了牢门，一看苏州监狱二科的游湘、“大耳朵”几个家伙都在那里。他们见了我，不冷不热地说了句“嗨，是你呀！用不着核对了，走罢。”我头也不回地步出了人间地狱的大门，深深吸了几口自由的空气，慢步向前走着。忽然想起身上一文不文。必须等着同案的几个同志出来一齐找党去。我找了个离监狱大门较远的地方等候着。远远看见罗志方向我走来，我迎上去，紧紧抱着他，高兴得只顾笑，说不出话来。罗是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派来专程接待我们的。约半个小时，同案的几位同志陆续获释，一齐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专门为了招待出狱同志住的旅馆，开了房间，我们又聚住在一处，大家既兴奋又无限感慨：

“唉，真没打算出来。”“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今天！”“我们应该感谢党和毛主席！”

由黄霖带队，我们一行数人从南京坐火车到了西安。刚到车站

口，两个国民党军人在检查同行的几个同志的行李。我一看自己那身破长袍，怕又被他们当作逃犯抓回去，便躲闪着混出了车站，找了个不显眼的地方等他们出来。可是等到同下车的人都走光了，还不见他们的身影。心想糟了，莫非他们又都被捉回去了？我不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什么地方，又不敢贸然打听，只好自己找个廉价旅馆先住下，整夜忐忑不安。第二天一早，我还到火车站去，希望能碰上从监狱出来的同志。我正努力寻找熟悉的面孔时，那不是李逸民同志吗！我心里十分高兴，匆匆走到他面前告诉他我昨晚走散的情况，他说了句“跟我走”。便把我带到八路军办事处。一看和我一路的同志们已经在那里。原来检查行李的国民党军人知道他们是刚获释放的，就说：“现在国共合作了，是一家人了。”送他们到八路军办事处。他们找不到我，很着急，即向林伯渠同志汇报，林老连夜到处打电话查找我的下落，生怕我在混乱的西安出什么事。

几天后，我们到了陕西三元县云阳镇中组部为接待出狱同志的招待所，略事休息，并接受检查。之后，我与刘芝明、李逸民、吴三龙等五人，由刘芝明当组长，徒步奔延安。

延安离西安有七八百里地，我双腿残废不能走远道，雇乘牲口要组织上花钱太多，坐汽车需待一个月以后，我上延安心切，决心克服困难与身体健康的同志们一道，走到延安去！我们每天走七八十里地，一共走了九天，终于胜利到达日夜想念的革命圣地延安。新的生活开始了！

（黄霭玲整理）

立三路线与行动委员会

陈 修 良

(上海市政协常委)

回 国 之 前

一九三〇年七月，我刚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结业，奉中共代表团之命，调回上海工作。我是随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赤色职工国际的中共代表）和陆定一（少共国际中国代表）等同志一同回来的。回国之前，多数同学已经作了准备，回去后参加职工运动。当时，为什么对职工运动特别重视，这有一个指导思想——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先占领城市，后占领农村，所以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他们反对统一战线，谁要提出团结其它阶层，就必然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上海被认为是中国的彼得格勒，产业工人最集中，因此也成为党的工作重点。以向忠发与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基本观点是实行城市总罢工，进而转变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以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夺取全国胜利。我回国之前正好是立三路线的高潮时期，据国内去莫斯科的同志说，由于红军猛攻长沙，使敌人惊恐万状，上海的报纸头条新闻也登载了红军进攻长沙的消息。他们鼓励回国同志都去大城市领导工人罢工，进行武装斗争。为了

这个目的，立三路线领导的党中央取消了党、团、工会等各级组织，把这些组织合并成为一个行动委员会，以便集中全力，在短期内进行总罢工，用工人群众的力量去占领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至于我们有多少党、团员，有多少赤色工会的会员，当时并无统计。如果根据实际情况说，是实在少得可怜的，党员大多数集中在行动委员会下面，基层很少。

由于要到工人中去工作，我们回国的女同志都留了头发。据说上海女工多数是梳发髻的，短发象女学生，不能同女工打成一片，所以都留了长发。而且大家还要学一门生产技术，我学的是织布。

当时我们不大清楚中国党内的情况，但莫斯科中山大学中议论很多，从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兼中大的校长）和王明等“布尔什维克”的言论中，我们觉得他们同立三路线观点基本相一致，并无“左”右之分，王明之流公开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十分看不起农民运动与农民武装的斗争，自以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米夫就想用王明一伙人来代替中国党当时的领导人。

因为上海是最大的工业城市，所以一九三〇年这一批中大同学回国之后，多数留在上海搞职工运动，只有少数学过军事的同学被派到中央苏区。

这就是行动委员会

回到上海，我住在一个小旅社内，过了几天一位全国总工会的同志来找我，分配我到丝厂工作委员会去工作，领导人是阿金同志（女，浙江镇海人，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死于苏联）。她告诉我，根据中央决定，上海已经取消了党、团、工会等各级组织，丝委就是

党、团、工会合并起来的行动委员会。工作任务是专门领导上海一百零四家丝厂工人的总罢工，配合全市其他产业工人进行总罢工，以便武装工人，夺取政权，同苏联十月革命先占领彼得格勒一样，进而发动全国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成立苏维埃政府。

工作分配后，我住进了李振瀛同志（当时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原来住的一间三层阁楼。李同志已调到北方去工作，所以让出了这个地方。他仅有一桌、一小铁床，还留下了无数的臭虫和几本连环图画。楼下房东是木匠，看来没有文化，不管楼上住的是什么人，倒使我觉得安全。这个地方在武昌路上，离虹口的丝厂比较近，我觉得方便。我们丝委在虹口区租了两间厢楼，连阿金在内共有七、八个女同志。我们天天开会接头，住机关的是阿金的母亲，她还给我们烧饭。她老人家经常问我，“什么时候可以革命成功？”这代表了我们的机关内部的一种情绪，仿佛就要举行革命暴动了！

到丝委工作后，正巧赶上“八一”起义纪念日，中央决定工作人员都要在“八一”当天到南京路上去参加示威游行。那天上午九时，我也到了南京路的热闹地区。使我惊奇的是，一路上碰到了不少留苏同学，但并不见一群群工人队伍到马路上去示威，也不见有人扛着旗子喊口号或散发传单，只不过与平日不同的是看到许多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在慢慢沿着马路走着，我估计多是各机关来的干部。我看到了在中央机关工作的陈原道，因此更证明我的估计有点根据，巡捕也没有去公开抓人，不过便衣侦探相当多，他们的狰狞面目还是掩盖不了的。在“游行”中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每逢五一、五四、五卅、八一和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牺牲的日子，都要去南京路游行示威或者举行“飞行集会”呢？这不是明白地去暴露我们的身份吗？

行动委员会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我本来是不懂的。在我参加了丝委以后，在开会与实际行动中，逐步地懂得了，原来就是要发动工人总罢工，准备暴动。我到了好多家工厂去实地调查，丝厂里面并无党员或团员，那么工会会员有多少呢？这就很难说清楚了。阿金介绍我去接洽过几个女工，我很坦率地问过他们，是否参加过工会，她们说“参加的”，但仔细一问，原来她们参加的是国民党包办的黄色工会，并非我们所说的赤色工会。至于赤色工会到底有没有成立过呢？根据丝厂情况看，恐怕未必有过，只不过是停留在干部的计划中，工人群众的心目中并不知道有赤色工会。我曾试探过几个女工，问她们知道不知道赤色工会的章程，她们都说不知道。我说赤色工会的章程上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女工产前产后休息一个月，她们说：“好是好，只是办不到。”她们问我赤色工会在哪里，我当然不能告诉她们。其实赤色工会的所在地，就是党的秘密机关。这种做法后来刘少奇同志称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不分”的错误。王明路线时代依然沿着立三路线这一条道路走下去，结果遭致党、团组织的严重破坏，这在当时的领导干部中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女工们还说，我们要同资本家打交道，要有工会，而且要挂牌子，要有一个地方。这样的工会在那里呢？我亦只好含糊其词回答说：“我也不知道。”结果往往碰钉子。女工们说：“我们实在忙，没有功夫谈这些，以后别来找我们吧！”钉子碰了不少，但我们并没有动摇决心。于是布置了有朋友关系的女工带头发动罢工，然后带领一批女工，冲到各个丝厂门外去大喊大叫：“关车！”有的丝厂的女工听到外面喊声，真的关上了车，拥出厂门外看热闹，这样连锁反应，常常有好几个丝厂同时罢工，这就叫做“总罢工。”这样的罢工方式，据说是丝厂工人的创新（在大革命

时期用过这种方式)，当然在丝的出口情况较好的时节，这样做，资方有时也只好让点步；但在外销情况很不好的时候，如一九三〇年夏，世界市场萧条的时候，资方并不让步，对罢工置之不理，工人最后只好忍饥耐饿去上班。

领导上当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敌人即将垮台，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到来，只要我们登高一呼，赤手空拳的工人群众就可以占领上海，成立苏维埃政府。可是当时并无解放大军包围上海，我们是孤军奋斗，铤而走险。

丝委成员每天早晨到各丝厂去发动工人罢工，有一个困难，我们每个住宿的地方不同，穿的衣服也不同。如丝委的一个女同志姓楼，是蔡叔厚同志的爱人，“蔡老板”当时开一个绍教电气公司，楼同志当然要算“老板娘”，她平时穿的衣服当然要相当时髦才行。到工人地方去，非要化装不可。因此，阿金设法在热闹区找了一个旅社，开了一个房间，我们每天天没有亮就到这个地方去换上工人的服装。时间长了，不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一次全总有一个干部去找我们，发现敌人已在那里等候，便立即通知我们，让大家不再去这个地方，才得以避免了一次危害。

由于上级催任务太急，我们明明知道当时的做法冒险性很大，早上出去，下午可能已经进了监牢，可是谁也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怕说是“右倾”，因此只好奋不顾身，不管日晒雨淋，奔走于丝厂附近，去找女工们或者去看丝厂的罢工动静。有一天早晨，我走到一个丝厂门口，果然看到这个厂已经罢工了，女工们正在拥向其它丝厂，大呼“关车”，我想“总罢工”真的实现了！正在暗自高兴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女工模样的老女人抓住我，高喊“共产党来捣乱了！”四周埋伏的包探一涌而出，不由分说地把我同一些罢工的

女工押上警车，拉进虹口密勒路捕房，随后又送到看守所，同一些妓女、人口贩子、吸鸦片的女犯关在一起。好在我是一个乡下人的打扮，人家以为我是“阿木林”，根本没有人会相信我是“共产党”。敌人在讯问我时，问我到厂门口去干什么，是不是来捣乱的？我说不知道，我是从乡下来上海探望亲戚的，因为我不认识路，走到那里正在看热闹，被人抓来的。好在全无人证物证，只好以“误拘”释放了我。我出来后，丝委的同志说她们早已知道我的口供（当然是有内部的线索），所以她们没有搬走，照常进行工作。她们同我热烈的握手，又欢迎又表扬。中央妇委负责同志杨之华也立即来到我那个三层阁楼上慰问，并告诉我，考虑到我再去丝委可能发生危险，党已经决定我去海总工作。

立三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吗？

海总（全称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当时也已成为行动委员会，机关设在东华德路（现在的长治路）。这是一个沿马路的二开间的二楼，进口处在衙堂口，我们进进出出的人员虽然很多，但不容易被发觉，所以尚称安全。海总有几十个党员干部，名为工会，实际上是党的领导机关，它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党团（即党组），党团书记是陈郁（前广东省省长）。海总下面分两条线，设长江工作委员会与与外洋轮工作委员会。长江委员会的书记是朱宝庭，成员中有文学家王任叔（巴人）、吴福海等，专门管长江上面的轮船。另一个委员会是专门跑外洋轮的，也有一批干部，多是广东人。我担任海总的机关报《赤海报》的总编兼秘书。陈郁同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员出身，参加过省港大罢工。他经常去外洋轮上听取海员们的意见，我也时常跟着他上船去采访新闻，或者去找海员要

他们写一些文章。各条船上并无党的组织，照例也只有所谓赤色工会会员。到底有几个人是工会会员，当时没有统计，估计也是很少的。海员工人要求在上海办一个海员俱乐部，但这是不可能的，国民党政府决不允许建立这样一个集中工人活动的俱乐部，因此我们就只好在虹口开一个小酒店，海员们如果问工会地址在哪里，就说是那个小酒店。这个地方陈郁同志常常去，我也有时去听听情况。来的海员很少，不敢扩大交往，因为这个地方到底还是秘密机关。管店的全是党员，幸而没有出事，否则会牵涉到党中央机关，因为陈郁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他是经常要到机关去开会的。

我们的工作方法，大致与丝委相同，就是每天碰头开会，听汇报，然后分头到各条进口的轮船上去进行宣传工作，或者去发展工会会员。宣传的主要内容是讲述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情况，要求国际工人阶级支援中国革命。我没有看到外国海员同我们有什么关系，来往的都是中国人。我们没有去发动“总罢工”，因为敌人的压力很大，力量太悬殊，要进行罢工，谈何容易。所以事实上只好做些宣传工作和调查研究，唯一的文字宣传工具，就是《赤海报》。这个刊物是油印的，份数只有几百，它通过外洋轮船的关系，把中国革命的呼声传播到国外去。这件事本来是很有意义的，可惜当时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收效实在不大。

一九三〇年十月间，党的三中全会热烈讨论立三路线的“左”的错误，海总党团表示拥护中央的指示。十一月间，党中央发出了九十六号通知，更加明确了立三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我们正在考虑改变工作方针与方法，不料第二年一月间中央突然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为首，召开了党的四中全会，说是以瞿秋白为首召开的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完全推倒共产国际原来对三中全会的

指示，指出立三路线是无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所以还要继续反右而不是反“左”。事实上米夫的目的是要捧王明一伙所谓“布尔什维克”“马列主义”者出来领导党中央。右比“左”好，所以胡说立三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对于过去党内真正反立三路线的许多做实际工作的老干部，一律斥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样来，造成党内思想的极大混乱，党就分裂了。以罗章龙为首的一派人主张召开党中央的紧急会议，讨论路线问题，并成立了非常委员会；另一派人主张坚决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但不主张召开会议，组织上实行分裂。海总党团则属于后面一种主张。以陈郁同志为首的海总党团成员有吴福海、王任叔、朱宝庭等，均一致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我当时也参加了党团的会议，表示对四中全会决议有不同的意见，认为立三路线推迟了中国革命，是“左”倾不是右倾；四中全会批评立三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比立三路线还要“左”倾，在实际工作中行不通。会议结果，全体党团成员推我起草一个给中央的申明书。这个申明书现在已经找不到，只有在中央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发表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报告大纲》，（登在《宣传者》创刊号〔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上，可以看到一段有关文字。报告提纲指出海总党团决定起草人的“右派”罪名是：他们认为，“立三路线破坏了党团的组织，是破坏了工会和其他的群众组织，是破坏了红军，破坏了中国革命。”当时中央工会工作分工给康生领导，他十分投机米夫、王明的意见，亲自召开了海总党团会议，要求我们承认错误，撤消这个申明，还要写悔过书，申明自己犯了右倾错误。对于起草者的我他尤为痛恨，给我带上“右派”帽子，并要严厉处分。当时大家都不同意，思想不通。为什么要严格处理起草人呢？幸而那次会议周恩来同志也代表中央出席了，结果

我被停止工作，没有像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那样严厉，带上“右派”帽子后，定为敌我矛盾，所以仍然保留党籍，不过“靠边站”而已。至于王明为什么特别恨我呢，因为在莫斯科时候，我是反“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积极分子之一，吴福海同志也同样是最反对王明一伙的，但是因为他是工人出身，比较宽大，没有立即处分。对陈郁同志也一样，还仍然让他参加中央政治局。然而不久，吴福海同志也被停止了工作，陈郁同志送到莫斯科去检讨，那时王明与康生已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陈郁同志被处分后，送到西伯利亚去劳动改造，在那里做了七年矿工。这些经过是一九五三年陈郁同志来上海时对我讲的。

海总自此以后，有许多人纷纷调离，因为王明认为大部分干部都“右倾”，不可靠，调来一批新的，继续执行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路线。随后组织不断遭到破坏，许多人被捕，有的牺牲，有的叛变。王明、康生一伙人就是这样从堡垒里面破坏了党的组织。多年来我一直在反复想：立三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吗？一直到党的七大，才澄清了问题的性质，但是极左路线给党带来的损失太严重了。

“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党接受了历史教训，使后来的白区工作找到了正确的规律，白区党的组织积极活动，开辟了第二战场，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我相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党将继续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新的胜利。

（一九八一年二月）

内 乱 之 中

——王稼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朱 仲 丽

（全国政协委员）

王稼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建国后的一个时期里，曾是我党我军的领导人之一。正如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的，王稼祥同志是有功的人。他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军队政治工作建设，以及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和国家的外交工作，都做过非常重要的贡献。

但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中……

新决定全家搬出中南海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北京的气候格外炎热，加上外界传来的种种消息，使人总有说不出的感觉。稼祥同志我们一家住在中南海里，也是浮想联翩。

一天，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机要秘书急急拿起电话，“好，……好，……好，”连答了几声，便放下电话，匆匆冲

着王稼祥同志说道：“有两位领导同志马上就来。”

“谁？”稼祥不安地问。

“是中央首长……。”听完回答，稼祥放下手中的文件，转身对我说：“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了。”我只见他平坦的前额露出了几道忧郁的皱纹。

客人来到，先问候了稼祥同志，接着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中央最近有决定，凡是不直接参加常委会工作的领导同志一律搬出中南海，已为稼祥同志准备好了房子，今天下午就可以去看看。稼祥听罢，没有细问，没有要求，也没有多说话，遵照党中央的决定，同意马上搬出中南海。

客人走了，稼祥叹了一口气，心情显得更加沉重，联系近日中南海内已陆续凄凄惨惨地搬走了好几家，真有说不尽的滋味。他深知，通知搬出中南海的借口是没有根据的，中央书记处这一党的最高办事机构，实际上已经不经宣布而悄悄撤销了，书记处的书记，几乎全部靠边站了。他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书记处的一员，恐怕也……

“这样处理政治思想问题，人为地拆散党的组织机构，在理论上毫无根据，在组织制度上更不符合党的原则啊！”稼祥叹息着，步出屋外，我赶紧跟上去，陪着他向中南海边走去。

去年秋的一天晚上，周总理曾受毛主席的委托来看过稼祥同志，从他参加革命开始一直谈至目前的形势，言多意重，及至深夜。“现在看来，那次讲话是和我打招呼的，肯定了我对革命的贡献，总结了我党各个历史关头的路线斗争。总理告诉我，人事变动极大，党中央的继承人或者是林元帅，或者是邓总书记，他自己却谦虚地开玩笑说：我只能干干跑龙套的演员，而不能掌舵。他赞

扬我在几次关键时刻都站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稼祥在自言自语，又似细声地告诉我。

“可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被赶出中南海呢？不给你工作，不通知你参加重要会议呢？”我停住脚，不理解地在他耳边问道。

“情况复杂啊，彭、罗、陆、杨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究竟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也模糊不清。我扪心自问，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党的事，不过在外交政策上提了些看法。”原来，六十年代初，王稼祥同志考虑到我们国家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工作上也有失误，再加上苏联背信弃义，逼我还债，以及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等等，在中联部的党委会上，谈了关于对外政策的一些看法。并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同志写信，提出自己的建议。王稼祥同志认为，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紧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对外工作上以采取缓和的方针为宜；针对一些国家对我们的诬蔑，建议发表一个对外关系的较全面的声明，阐明我们的对外政策；在对帝修反斗争中要注意策略，要警惕把局部战争引向我国，要避免帝国主义的全部锋芒引向我们身上。印度不是我们民族的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我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等。王稼祥同志的这些意见得到了中联部党委会的一致同意。但是，不幸竟被反革命阴谋家康生所利用。康生伙同王力一些人，藉此打击稼祥同志。后来，他们一伙又把稼祥同志向中央提出的这个建议，诬陷为“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投降，消灭各国革命的‘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

想起这些，揪心得很，我们无意在中南海岸边留恋，又折回原路。

刚跨进门院，我的一个亲戚打来了电话，告诉我们，稼祥所管

的中联部已经贴出了批稼祥的大字报，他特别告诉我们，以后不要和他来往了。

事情都是突然的，可似乎也都在“情理”之中。

送书信得到了短暂安慰

外界的大字报多起来了，特别是大中学校的“文革”搞得“轰轰烈烈”，使稼祥几次对我讲：“听说只搞一年就收尾搞生产，现在，客观情况好象不是那样了。我关在这个院子里，是无法分析什么了。”

一次，他说着说着，蓦地站起来，从客厅走到办公室，拿起笔纸写了一封信：

请周总理转呈毛主席：

我理应主动赴部里看群众贴的大字报，接受群众的意见，从而认识错误改进工作，但我最近心脏很不好，每分钟跳至一百多次以上，特此请求批准稍待身体好转再去部里与群众一块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此致
敬礼

王稼祥

他把这封信仔细地封好，交给孩子，让他即刻送至中南海收发室。然后，他又动员家中的其他人：“你们都分头到街上看看大字报，回来把详细内容告诉我。”

稼祥的信很快从电话中得到了答复，去部里看大字报的问题暂时搁下了，全家为此庆幸，这是一个好兆头，毛主席保了王稼祥。我也放了大半个心。

是委员不知道中央全会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很快召开了，当天《人民日报》送到了稼祥手里，他一口气读完，随后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步。

他得知，这次会议有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中央文革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首都高等院校师生的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十六条》。特别醒目的是：会议通过了林彪为全党的副统帅。

稼祥的心目中，文化革命的目的在于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要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废掉刘少奇继承人的职务，是要从群众中选拔一批适合于接班人五项条件的青年人……等等。但他不理解，为什么采取这种运动手段，把老干部一脚踢开，不要党委的领导。他对我说：“我是中央委员，开中央全会不通知我参加，这是不符合党章规定的，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

我安慰他：“可能是照顾你的身体条件吧？”

“通知总应该有一个罢，请病假是另外一回事。”

“你知道，”稼祥恳切地说：“目前局势高深莫测，我可能是斗争对象，即使毛主席保了我也很难保得住。平时我在工作中不吹牛拍马，还得罪了不少人，特别是康生，早年我们同是莫斯科的留学生，他紧跟王明，对我十分嫉恨；还有江青，我们两人把贺子珍同志从莫斯科疯人病院接回祖国，她会怀恨至极；那个林彪，在东北哈尔滨时，我纠正了他在城市管理上“左”的一套。再有历史上他曾经犯过很多错误，甚至反对过党中央、毛主席，当然我也不顺他的眼。唉，你一时也不清楚。总之，他们会找理由对付我的。”

他的声音低沉，见他摸摸头发后，以坚毅的目光看着我，说：

“我不是说泄气话，在这样的风雨中，我仍会精神抖擞，准备喝干这泪水酿成的苦酒。”

稼祥又说了许多话，最后禁不住语调升高了许多：“你晓得，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女人上台祸国殃民！”“康生是一个要做官的家伙，坏就坏在他的手中，什么反修战士，呸！”

兴许吐出了这些真心话，我们都觉得心情舒畅多了。

大字报进家办了展览室

在那个年代，在那么一种情势下，什么人都要出来表演一番的。

一天，负责院子警卫工作的一个人出现在房门口，他手里拿着一大卷红红绿绿的纸张，向我扬着手喝道：“好东西送来了，喂，收下吧！”他随手把东西扔在身旁的桌子上，面带着一副幸灾乐祸的阴笑。

一见就明白这些东西是部里送来的大字报，约莫有七、八十张。

“唉，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望着它发愣。

“要强加罪名有什么办法？现在是有口难辩。”稼祥翻着大字报，边看内容边答：“夸大，夸大，断章取义！”

“这毕竟是一些群众写的。”我说。

“难道没有后台？！指使的大头子我心里明白是哪几个！”他不愿意一张张细看，我赶忙卷起来收进了柜子。

“部里来电话，叫把大字报贴在房子里，天天看一遍，回答上边提的问号。”那个警卫人员的脸孔又出现了，他随时掌握我们的情况，向他的造反派组织汇报。这时，他索性站在了门口，看我们

怎么办。

“贴就贴吧。”稼祥泰然地回答。

“贴在哪里？”我问那个人。

“会客室里系上根粗绳，挂在绳子上，不够的话，可以用浆糊贴在四边墙上。”稼祥不等警卫回答，愤然而言。

一家人都出来帮着搬家俱，拉绳子，忙忙乎乎，会客室一下子成了大字报展览室。

望着墙上的一张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刘邓黑司令部的黑干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帮凶，假共产党员，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低头认罪是出路，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愚请求翻译校对无人应

喧闹中，时间过去了五个多月，虽然稼祥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但到底还没有人来揪斗他。对此，我微微宽了心，认为毛主席保了他一定起了作用。

稼祥看的不那么简单，他告诉我，就在运动前不久，毛主席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来看过他，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稼祥同志功大于过，今后多做些大事，日常工作少做。还表扬他能思考原则性的政策性的大政方针。可是事后不久，杨尚昆同志被打成了修正主义分子，这究竟为何，此中原因太蹊跷了。

他尽管不明白一些事情，可自己不愿意闲下来，只觉得不为党做一些工作是有愧于心的。

当他向我提出，是否主动到部里参加运动，和群众一块闹革命，检讨自己的错误时，我十分耽心，进而表示反对，认为他那样做，可能会带来新的麻烦。听了我的意见，稼祥十分懊丧，略停片刻后对我说：“算了吧，做一点不依靠别人，不要秘书和任何条件的工作吧。”他想起不久前偶尔看到的苏联报刊，上面把“红卫兵”译成“红侍兵”，这是翻译上的错误。

稼祥决心做做翻译、校对的工作，他高兴地快步进了屋，打开书柜，拿出一摞红色精装书籍，有莫斯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前三卷俄文版，马上聚精会神地看起来，发现有不适当的译语，一一记了下来。记着记着，他为党尽一份力量的情感又油然而生，于是提起笔来，写了一封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负责人的信，请求他们找一个比自己更好的俄语专家来回答他的问题。

信送出之后，他以党员对党的事业应尽义务和党组织对党员积极性应该支持的信念，耐心地等待着回音。好容易，来了个电话，回答此信已经转交给中央编译局俄文组处理了。稼祥照样以翘首急盼的心情在想着，不出一个星期，一定会有个明确的结果吧？可是，这件事他想的太简单了，得到的只是失望，直至最后，也没有人理会。

讲真理决不去诬陷同志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主席发出了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指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犯错误的干部是可以改正的。

毛主席的指示，传达到各机关、各团体，稼祥在家里也看到了，他心里的火好象又点燃了，对我说：“仲丽，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不是屡教不改的人。”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什么好消息呢？我在猜想。等我放下电话，紧张的脸色已被稼祥瞧见了。

“哦，是门上打来的，说有三个人来调查部里领导的材料。”

“来找我调查？”意外的情况使稼祥一下也没了主张。让进？还是不让？我把握不住。

“我们怎么好拒绝群众来访呢？”稼祥脚蹑着。

“如果你答应他们进来，那我要在场。……如果不让他们进来呢？”

“会不会给我扣大帽子？”老实的稼祥同志脱口而出。他为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遵守党的这个准则，终于决定接见这三位不速之客。

我存有戒心，先在客厅等着，不让稼祥直接出面。很快，那个警卫带着三个青年人进来了。

当我刚接上话，一个瘦而矮的人说：“今天要当面找王稼祥调查部领导材料。”我回答他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可以坐着谈嘛。”另一个接上话碴。

我想了想说：“我们没有接到上面的通知。”

“哼，群众来调查材料，从来没听说要什么批准。”

“王稼祥同志的工作岗位是属于党和国家机密范围，你们是知道的。”我严肃地说。

“谁的党？谁的国家？我们代表了革命群众，他到底能不能见我们？”领头的瘦小子不耐烦了。

“我是秘书，可以代表他接待。”看这种架势，我感到还是挡住为好，尽管我们事先并没有这样商量好。

“不行！要见他本人！……”正当我们争执时，只见稼祥同志自己走了出来，三个人先惊了一下，转又骄气横生，领头的指了指椅子说：“你坐吧。”俨然以主人自居。

“我们是来调查伍修权的，你要将你知道的情况全部告诉我们。”

几个家伙扯了一通说：“伍修权反对林副统帅，在东北他就和彭真勾结在一起，在外交战线上也犯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三降一灭’的罪行，你必须揭发。三天之后，我们来取材料。”

“你们出题目吧，我对他过去不了解。”

“就你知道的，全部写下来，不许包庇！”

三个人又扯了些有关稼祥历史上的事，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去。

怎么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决不能干诬陷同志的事！这是稼祥心里早就想好了的。他跟我畅谈了伍修权同志的革命历史，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开始伏案执笔……

恶语狂激起满腔怒火燃

三天之后，那些造反派果然来了，不过换了三个陌生人。这次，门上连通知都不通知，由那个警卫直接带进了我们屋里。

一个人从稼祥手中接过材料，漫不经心地塞进公文包，接着盛气凌人地冒出了第一句话：“你知不知罪？”

“我？……”对于“罪”，稼祥从来没有想过，他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你在外交战线上的修正主义‘三降一灭’是怎么出笼的？”

“是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授意的，今天你要老实交待罪行！”

“你们不是来取材料的吗？怎么……”我忙在旁插话。

“不是问你，你没权干预！”一个家伙转脸又向稼祥喝斥道：

“你回答！”

稼祥冷静地说：“我不知犯了什么罪，也没受过任何人的指使。外交政策上的事只是工作中的意见，而且不是我一个写的报告。”

“好一个工作意见，分明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对这种无理蛮横的话，稼祥根本不屑一顾。他在想，党和国家的机密，我不能泄露。

“告诉你，纸是包不住火的！今天对你客气，如果不赶紧认罪，以后把你揪到大会上斗！”说到“斗”字时，一个家伙的牙齿好象咬得格格响。开始接材料的那个人又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早已写好的提纲递过来，“哼！我们对你已经是最大的忍耐了，否则，早就把你揪到部里斗去了！”

几个人的车轮战，算是收场了。稼祥已经十分疲累，躺在床上，我见他把手捏得紧紧的，心里明白了许多，他内心充满了愤怒的火焰！

任批斗光明磊落心无愧

从此之后，四、五月份里，恐吓骂人的电话几乎天天打来，造反派的人每隔上三、五天，也必来一次，交给一批交代题目，进行

无休止的讹诈。不久我们得悉，部里“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换了康生，再加上一个王力，这两双黑手紧紧掐住了稼祥同志，他们指派一伙造反派来到家里纠缠了五、六十天，命令稼祥写“我的罪行。”稼祥实事求是，花了五天时间，把检讨写好，送交党中央一份，请求党的批准。不迟不早，就在那天，大门突然闯进了一百多人……

“喂，给你们送‘礼物’来了，而且是排着队喊口号哩！”又是那个警卫，他先跑来“通报”，脸上阴笑着，一副讥讽样。

“用不着你告诉，我们早就料到了！”我也没有好话，即刻把身体早已不适的稼祥按到床上，告诉他：“你躺下，我来应付。”

顿时，院子里已经写满了斗大的墨字标语，只见那个警卫殷勤地帮他们打浆糊、烧茶水，根本不管自己首长在干什么。最瞩目的，是我一眼看到了稼祥原来的秘书，他是为首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我先开口说：“今天有什么事可以找我。”

“你有什么资格，叫王稼祥出来！”一个长个子、小眼睛的人挥手喊道。

“他有病躺在床上，你们总不能对待一个有病在身的……”

“不理她，走！到里头去揪！”那个家伙一马当先，后面紧跟七、八个人，直冲里屋。

“砰”的一声，门被撞开了，随即有人喊：“王稼祥起来！我们群众叫你回答问题，你必须老实交代罪行！”话音未落，已有人一把掀开了被子。

就这样，稼祥从床上被揪至客厅内，外衣也未穿上，我忙拿来披在他背上，跟在他身后。”走开！这没你落脚的地方！”一个造反派猛地推开了我。

只见那个秘书指着稼祥的鼻子问道：“一九六二年你搞了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为什么不在当年的中央全会上检查？”

稼祥听到声音，显然诧异了一下，但这个问题是清楚的。

当年，稼祥曾面见毛主席，愿意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的中央全会上作检查，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必弄到中央全会上来，只同那些有意见的同志在小范围谈谈就是了！”他立即在部党委会上作了检查，承担了全部责任，事情已告结束。稼祥冷静地按事实作了回答。

“胡说！是邓小平不叫你检查的！”秘书自以为了解内情。

“我证明，他写过一封信给邓小平，王稼祥和邓小平的黑关系必须老实交代！”一个在首长身旁工作的人也呼应着。“王稼祥必须老实交代！”一群人喊起了口号。

稼祥听了口号，心中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了出来，记得部里讨论外交政策时，这个秘书正是记录，他亲耳听到过大家表示同意的意见，而且亲眼看到大家（包括那个王力）在报告上签了字，后又送交中央的。今天，他不仅不出来说句公道话，而“揭”得最凶，喊声最高，多么可耻啊！……

“我在进医院之前是写过一封信给邓小平，说明我已经在部里的几个负责人会上谈过了，并问要不要向他汇报，他批了几个字：快进医院检查吧，不必汇报了。”

“低头！”有人喊：“回答话低头！”众多的人又一齐大喊。

“明明是邓小平不叫你检查的。”那个秘书指着稼祥的前额，声嘶力竭地喊：“你要老实交代和刘邓合谋的详细经过！”他停了一下，又说：“还有，王稼祥一九六五年到杨尚昆家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人们喊着：“王稼祥老实交代和黑帮分子杨尚昆的

黑关系！”

稼祥迟疑了一下，只听得那些人乱喊一阵。

“我们谈的是些形势问题。”

“哼！你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就这么一句话？”那个秘书又跳了出来，这回他竟然猛压稼祥的头，使他下巴连连贴到了胸前。

稼祥在战争年代腹部受过重伤，他经受不住这种折磨。

“站起来！低下头！”

他站起来，低着头。

“坐下！”

他只好坐下。

“谁让你坐下的，站起来！低头！”

他又只好站起来，低着头。

他被人摆布着、批斗着。

“你莫想混过关，还有，你在家给彭真打过电话，为什么不主动向革命群众交代！”还是那个秘书的外省口音，他的两袖已经捋到了肘关节上。

“告诉你，你的罪恶性质是反对毛主席正确外交路线，是个罪魁祸首！”

稼祥被喝令站了起来，他回答：“我在电话里谈了病后再工作的问题，同时请求批给一些党内材料看看。”

“不老实！”喊声又起，压脖子的人跑上来两三个，狠狠地压着。

好一阵喧闹，可能那些人也感到累了。

“今天宽待你，你的罪行要向群众、向毛主席交代清楚，一件事，一件事，叫你写多少次就得写多少次。上次叫你写的罪行拿出

来交给我们！”一个主要的头头命令着。

“内容有机密，我送交中央审查去了，如果批准，会交给你们。”

“那你把底稿交出来！”一堆人拥了上来，逼着稼祥。喝令声、斥责声、谩骂声，加上挥舞的拳头，稼祥无可奈何地回答：

“在保险柜里。”

“拿钥匙！”刚听完这句话，那个秘书就伸出手来。

“我没有。”

“在什么地方？”

“在仲丽手里。”稼祥顺口而出，但他马上后悔了，他不该说……

“走！找他老婆去！”那个头头一把抓住稼祥，让人推他到另一间小屋，一批人又跟着蜂涌而上……

抢钥匙施淫威阴谋得逞

“你说！王稼祥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你说！你跟王稼祥一起搞过什么鬼把戏？”

“你说！王稼祥和彭真、杨尚昆怎么策划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一连串的质问象子弹一样射来，蛮横而又无理。他们把我围在当中。两个女青年怪喊着：“快回答！你是不是想坐‘飞机’？”

“低头认罪！”一个人带头喊起口号，接着群起呼应了一遍。他们见我仍无反映，又冲着我大声喊着：“王稼祥是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王稼祥是彭真、杨尚昆的合谋者！”

我按捺不住了，回答了一句：“王稼祥同志工作中可能有错

误，可他决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更不是什么合谋者！”

“那你说，杨黑帮为什么在运动前要去找王稼祥？”

“那是毛主席叫他来看王稼祥同志的。”

“你敢说是毛主席派的？”

“敢说，就是！”我一股劲上来，顾不得什么了，只觉得心中无愧，是什么就是什么。

“好啊，你还犟嘴！不想想……”

正在这时，我一眼瞧见稼祥被人夹持着进来，他头发蓬乱，衣扣已开，至我身旁时，他暗暗说：“他们要保险柜的钥匙”。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裤袋里的钥匙，扬头说：“他们不能破坏机要制度，不能给！”

“不给？我原来是机要秘书，有权打开保险柜。”那个秘书洋洋得意地说。

“不行。”我坚持不从。这时，两个青年人如狼似虎地用手压着稼祥的双臂，要挟说：“你下命令吧，叫你老婆拿钥匙。”

稼祥已经精疲力尽，他不愿意让我受过多的牵连，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把……钥匙……给我吧……”

……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当稼祥第三次向我伸手时，那个早已目无党纪国法的秘书一把夺走了钥匙，率领一帮人呼叫着冲进了办公室。

保险柜前，那个秘书知道机关和暗码，毫不费力地打开了它，在一大堆文件、材料里翻腾着，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一会功夫，这帮人好象完成了任务，向我们又咋呼了一通，便招呼着同伙离开家门，扬长而去。

望着敞开着的绿色保险柜和散落一地的文件、材料，再看看屋子里的一片狼藉，我和稼祥无言相视，他长叹了一口气，瘫坐到沙发上。我蹲下身子，慢慢地收拾着地上的东西。

真让人不可思议，这一伙人竟在院子里的四周围墙上，在水泥地面上，在一切稍大一点的空处上，统统写上了大字墨迹标语：“打倒王稼祥！”“把王稼祥揪出来示众！”……

我流着眼泪，仰天长叹：毛主席啊，不久前你还保了王稼祥，可为什么那些人不听你的话？你曾经有过指示，这场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可为什么与你同生死的王稼祥今日却蒙受奇辱？

我想起了，这一天正是稼祥整整六十周岁的生日，用什么祝贺他呢？难道就是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我苦笑着，只见稼祥点点头，似乎明白我的意思，他又用手指指门上的东西，我这才发现，门上被那伙人贴上了对子，左联是“魑魅死日”，右联是“魍魉穷途”，横联是一个脸盆大小的“丧”字。

忆往昔林江康丑史重现

稼祥默默地坐着，可好象总有些什么话要说，我再三地问他，才知道他刚才被造反派揪住头发，拧住胳膊，逼着承认是“三降一灭”的“罪魁祸首。”稼祥不同意，有人打了他几拳。几个家伙还说：“‘三自一包’是一条国内反毛主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三降一灭’是一条国际上反毛主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稼祥深感冤屈，但有一点他心里十分清楚，林彪、江青、康生这一伙人对他积怨甚深，是不会放过他的。在我的询问之下，他断断续续地告诉了我许多往事：

——一九三五年初遵义会议召开之后，林彪对毛主席、中央军

委的正确领导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时常以个人意志对抗组织。二月三日，军委通知各军团野战军迅速脱离强敌，集结行动，规定了“以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地区为总的行动目标”，指示林彪率一军团向扎西集中，林彪接到电令后竟拒不执行，回电质问：“野战军的基本企图如何？”军委不得已于当日复电林彪，申明理由，再次命令迅速由大坝地区开往扎西。此次，林彪仍我行我素，根本不把军委放在眼下，他复电言语刁钻：“盼军委将我们的情况详细研究，弄清我们在何处，再给我们命令。”为了不影响整个战局，王稼祥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以军委名义亲自拟稿、签字，再次发电报。而林彪却继续西进，把部队带到了兴文县建武营一带。军委命令他往南向军委和全军大部靠近，林彪却要军委和其它部队向他靠近。以后，林彪仍不执行军委命令，在军委令他打开扎西时，他竟把部队带到了罗海，愈走愈远。这样，军委忍无可忍，发电批评了林彪，他这才不得不向指定地区集中。

——红军进入会理后，林彪伙同其他人乘机起哄，要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他把毛主席的英明指挥诬蔑为“拖垮部队”，在会议上嚷着说：“这样下去不成，现在的领导不成了。”并且写信给党中央，要求撤换肩负中央和军委领导重任的毛泽东同志。会上，王稼祥同志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严肃的批评了林彪等人的无理行为。

——红军到达陕北后，林彪曾向中央军委发过许多信和电报，一再坚持要脱离红军主力去打游击，另立山头，遭到了中央和军委的严肃批评。当时王稼祥同志伤口发作，身体很弱，但仍对林彪这种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日本投降后，我军大批进驻东北，成立了党的中央东北

局。王稼祥同志在东北局主管城市工作。当时我党在东北不仅接管了一批中小城市，而且还接管了象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怎样管理城市的工作还没有经验，是我党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王稼祥同志在调查研究工作中发现，由于林彪在土改中推行“左”的政策，要把东北搞得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李富春同志同林彪谈话时，林彪说：“贫雇农坐天下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在“左”的政策影响下。促使农民进城抓斗工商业资本家，清算工商业资本家对农民的剥削，支持工人、城市的贫苦市民用农村斗地主的办法，斗争和清算资本家，并没收其财产，造成资本家恐慌不安，无心经营生产，致使城市秩序混乱，生产停滞，对当时支援战争，维持城市人民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王稼祥同志与东北局的其他负责同志根据党中央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支援战争的重大决策，反对各种各样的“左”的行动。在没收汉奸、特务、恶霸全部财产的同时，认真保护民族资本家的利益。王稼祥同志实事求是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却遭到了林彪等人的指责，谓之右倾机会主义，并调离了他的城市工作部部长职务。直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刘少奇同志指出，王稼祥同志在东北局关于城市工作中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的，这场斗争才算结束。

——建国后，王稼祥同志作为我国副外长和第一任驻苏联大使，来到莫斯科，时林彪也称病跑到苏联治疗。他见到稼祥同志时表示反对抗美援朝。后来，斯大林曾对王稼祥同志说：“你们党中央把林彪忘记了？他没有大病。”侧面反映了林彪的问题。

——一九四六年王稼祥同志利用在莫斯科治病的机会，想了许多办法，把贺子珍同志从依凡诺夫的疯人病院接了出来，并经毛

主席同意，与他们母女一同回国，安顿在哈尔滨市治疗休息。（听到这里我也想起，长沙解放后，我回家省亲，毛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嫂嫂李崇德，叫我当面交给，并多多慰问杨老太太，我照办了。这封信曾对杨开慧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并称杨开慧为毛泽东夫人。）江青对此事极为仇视，一直耿耿于怀。

——还在十年浩劫之前，康生就企图控制中联部这个重要机关，他三番五次伸手向王稼祥同志要机密文件，要各国党的有关材料，要与其它兄弟党会谈的情况。王稼祥同志对康生的这种无理要求，坚决予以拒绝。不经过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批准，就不擅自把党的重要文件给任何人。康生因此怀恨在心，拉拢中联部王力等人，散布流言蜚语，挑唆干部对王稼祥同志的不满。

——斯大林曾对周总理和王稼祥同志当面说过：康生有问题……。”

稼祥讲了很多很多，然而更多的他没有讲出来，因为他最后连说一句话都很费力，继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迫害深痛去苦来险身亡

下午，我感到稼祥神志有些恍惚，两眼直立发木，让人十分紧张。忽然，只听到他在屋里大声地叫喊起来：“我没有罪！”

我赶忙跑进屋，着急地问他：“你怎么啦？”

“我看见房门口站了一群人，他们要冲进来斗我！”

我不由自主地转头往门口看去，哪里有什么人，忙安慰他：“没有人，你安静地休息吧，不会有人来。”

“仲丽，你的衣裳上有墨笔写的标语，喏！打倒反革命修正主

义分子王稼祥。”他喃喃地念着。

“没有，你好好看看，这是件白衬衫，上面没有字。”我感到稼祥一定是在极度刺激和疲累不堪之下，神经失常产生了幻觉幻听幻想，我忙拉开抽屉，拿了一粒镇静药，端着水送到他的唇边。

我静静地坐在他的身边，见他没有再开口，便略微放了点心，走出屋门收拾整理文件、材料去了。

夜幕降临了。

真没有想到，就在我不在屋里的时候，稼祥跌跌撞撞地站起身子，走到绿色柜台前，拿出了一包安眠药……

他躺在床上，手里拿着昨日的报纸在看，一篇社论映入眼帘：掌握斗争大方向……就是矛头指向谁的问题……尖锐地、毫不含糊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一惊，这篇社论昨天登的，今天六月二日群众就来斗我，莫非自己已经被划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他痛苦的要命，因为谁也不能回答他的问题，他抓起安眠药片，吞服量比平日剂量大了一倍，他想安静一些，他想自我麻痹，他想驱赶痛苦，但是，不行。呆了一会，他又模糊地抓起安眠药片送入口内，……他，终于合上了眼皮。

我回到房中，只听到稼祥均匀的呼吸声，躺到床上却合不上眼，白天的情景，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稼祥痛苦的形象，使我止不住地淌着泪，我总想着，他不是反对毛主席的人……

还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一天，周恩来，彭德怀、谭政等同志正在稼祥的住地开会，这时，国民党的飞机突然袭来，低空盘旋，投弹扫射。稼祥为了保护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的安全，他带头冲出房门，喊着：“快跟我到防空洞去！”稼祥话音未落，

一阵轰鸣，弹片戳入了他的腹腔。他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身后的许多领导同志。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稼祥曾几度生命垂危，他以惊人的毅力，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他在没有全身麻醉和局部麻醉的条件下施行腹部手术，忍受了八个小时之久的刀割之苦，而不喊一声痛。他患着外伤性急性腹膜炎，坚持走过了万水千山，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起，领导我军胜利完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凌晨两点，我不放心地听着他的呼吸，感到沉重又浅表；打开灯光，又发现他脸色苍白，我凭着自己干过医务工作的经验，敏感地披好衣服，连喊稼祥几声，又轻摇了一下，接着翻开他的眼皮检查瞳孔，发现尚有微弱的反应，但是脉搏已无，呼吸越来越浅，随时都有可能停止。我瞬时间明白了发生什么意外，快！我急急忙忙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和医院，又找出强心药给稼祥注射一针，叫醒了全家人。

稼祥被送进了医院急救室，抢救了一个小时，总算脱离危险了。两天两夜过去了，经过不断输液、灌氧，第三天，稼祥才又一次睁开了双眼。

醒来的稼祥见我站在面前，用微弱的声音说了第一句话：“你，……快代我写一封请罪书给毛主席，……”

“你自己感到怎样了？”我觉得他话语不对，忙岔开了话题。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记得睡得不踏实，吃了好几次安眠药，那时我顾不得过量的危险了，我需要长时间的休息……”稼祥清楚地说了几句话，忽又指着我的衣裳，指着病房的四壁，嘟囔着：“写了这么多标语，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

“没有。”我靠近他，把衣襟扯给他看。

“有，那墙上也写了，听，喇叭里在喊打倒王稼祥。”他无力地说：“你快替我写请罪书，要不，党中央不会理我了。”

我暗暗地掉泪，稼祥的神经受到的刺激太深了、太多了，他处在幻觉状态，他处在神经分裂症的边缘。

谁又能不相信呢？就在这场“大革命”来临之后，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们的儿子、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王命先被株连迫害，几次在台上被抹黑脸，摔破眼镜，反拧两膊，逼得走投无路。他不愿再受酷刑折磨，投河自尽，尸骨无人打捞。我们在北戴河中直机关工作的侄儿吴报华，他是稼祥大姐的儿子，一贯老实，被株连迫害，跳海而亡。一九六八年我们的侄女翟新华，她是稼祥二姐的女儿，在阜外医院内科病房任护士长，一贯工作勤恳，株连被斗而致发疯，服毒自杀。稼祥的姐姐、姐夫，一九六七年被赶出北京，两位老人一路讨饭回安徽，栖身于破庙里，姐姐活活饿死，后来，姐夫患病而亡。……这些都一次次地刺激着稼祥的心灵！

我听话地走到小圆桌旁，提起沉重的笔，给毛主席写信，当我写到“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时，心里很不以为然，究竟他是下决心自杀呢？还是由于神经失常致使失去理智误吞多量安眠药呢？按照那天发生的幻觉来看，明明是病态，我把自己的意见告诉稼祥，他不置可否，淡然而简单地回答：“快请罪，不然真的要戴上叛党的罪名了。”他见我犹豫，又说：“这是一件有口难辨的事啊。”

稼祥的话我后来才理解，他对于“请罪”心里是明白的。

“请罪书”写好了，我递给稼祥过目，他用颤颤抖抖的手签了字。之后，我迈着沉重的步履，来到中南海西门，将信递进了收发室。

被隔离任审查以心见诚

稼祥是作为“坏人”住进医院的，当然受到的是对“坏人”的态度和要求。对此我们忍受着，不管怎样，总是得到了一个暂时休息的机会。慢慢地，稼祥由精神恍惚，时而逃离，时而困惑，到神志安定，正常地深思问题。不久，他出院了。

然而，林彪、“四人帮”并没有放过稼祥！

六八年秋的一天，刚刚吃过晚饭，五个素未见过面的人趾高气扬地踏进屋里，我们抬头一看，那个警卫跟在后头，顿时感到凶多吉少。稼祥放下手中的笔，缓缓问道：“什么事”

“到客厅里去！”

三个人跟稼祥进去了，两个留下看着我，“把你们全家人叫来！”他们命令我。干什么？我满心狐疑，不待我去叫，进会客室的几个人已经回来了。

他们向我们宣布：“你们听着！奉上级命令，从现在起，王稼祥立即隔离审查，你们之间不许见面往来。”

“你们代表哪一个上级？”我镇定之后问。

“卫戍区和中央文革专案组！”

这种事情在他们手上办的太利索了，转眼会客室就成了王稼祥的隔离室，里边放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一个茶几，门口站上了“卫兵”，寸步不离。我被赶到一间小屋。夜晚，“卫兵”守在床边，只许稼祥和他面对面，不许脸朝里，灯光直射双眼，白天又恰恰相反，窗帘全部垂下，室内暗黑。给稼祥最大的宽待是每天放风十分钟，可以在十来平方米的有限地方内散步。

他被勒令每天写材料，交代自己的“罪行。”

他被强迫干活劳动。一次大雪之后，我见他吃力地弯着腰，拿着一把大铁锹铲着积雪，装入小推车里，他的脸、手冻得通红通红，而一个“卫兵”站在身后监视着。不一会，稼祥体力不支了，心跳气喘，铁锹掉在地上。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王稼祥同志不得不违背自己心愿，委屈地痛苦地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一封长长的检查信：

我现在只能承认当时确实做了的事，而不回避，坦白向党交心，……

我的错误的外交路线之一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在另外的一个材料中已经交代说明，我以为原子战争核战争是两败俱伤的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战争，是带着毁灭性性质的战争，这种战争是不能打的，只能避免。……林副主席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指出“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的叛徒。”我当时觉得这个说法只能对内，对外则不适合。是的，我现在只有承认当时确有的观点而不躲闪，坦白地向党交心，所以，我提出了“内外有别”的说法；而且狂妄地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写了“一些问题对外的公开提法”的书面意见，公开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在原子战争时代，不要说“只有经过战争消灭战争”的毛主席的过去的语言。……

第二个问题是人民战争问题，我虽然亲自参加了人民战争几十年并且负了重伤，但是认为对于其他国家进行人民战争是有灵活性的，许多国家以其地理条件，和经济情况的不同而持有一些区分。……此外，在我们处于三年灾害的内忧时刻，要极力避免外患。因此，我主

张与苏联保持国家关系；……还赞成与美帝也应该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对印度反动派也主张坐下谈判，停止世界战争；又因为美金紧张，我提出向兄弟党的援助，只能量力而行，譬如对阿尔巴尼亚等国的经济援助等，鉴于国内人民勒紧腰带吃饭，工业农业建设迟钝而有所感触和主张。这样我的外交路线的看法就形成了，我曾在部里党委会上和八位同志提出了我上述的看法，经过讨论，他们都同意，写了一个书面报告给党中央，大家都签了字。这就是我的罪恶，这就是我的政治帽子“三和一少”后又升为“三降一灭”的滔天大罪。……我的这条路线的动机是好的；可是，毛泽东思想是效果与动机的统一论者，因此，虽则效果尚未见分晓，但已是承认自己罪恶的时候了，我为此很痛心。如果批判我对待原子战争的看法上，中了苏修的毒，成了赫鲁晓夫的应声虫；那末，我再一次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尊重地来叙述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当时不是对我敬爱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存有二心的，相反的，是同中央和中央军委一心一意的，我觉得如不呈诉自己的意见，那并非党员的本质，如不提出意见，中国若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我将后悔终身。我不想有任何因素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我着急，想啊想啊！与少数人谈论，找历史类比材料啊！

……我诚恳地请求中央、中央文革及革命群众遇事宽大，……分配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给我，藉以立功赎罪，请求保留我的党籍，即便是留党察看一时期也甘心，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请求！

他把这封骂自己然而又是襟怀坦白的检查信终于交给了专

案组。

不久，迎来了一九六九年，王稼祥同志又给周恩来同志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造反派指出我犯了极大的罪过，对我的教育、批斗和目前的隔离审查是应该的，我只能认识到这是在救我。

我请求给我一点工作做，就在这种囚禁的环境里，就在这有卫兵随时监视着我的时刻中，我仍渴望着将我的有生之晚年为党尽最后的努力。我要求很简单，只要你批准给我一本中俄字典，四卷《毛泽东选集》就足够我达到这个迫切的心愿了；假如，党尚有其他翻译工作给我做，我是雀跃地、诚恳地接受，而且一定按时完成这个任务，请你即日批示。

敬礼

王稼祥

但是，稼祥他哪里知道，康生、谢富治早已宣布，所有列入专案的人，都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决不能施“仁政”。

重相逢又疏散发配外地

稼祥被隔离审查一段后，我也遭到康生、曹轶欧的陷害，关锁在中联部的黑屋里半年之久。六九年五月的一天，我被宣布可以回去了，理由是“王稼祥有病要你去照顾，”而“并不等于你的问题已告结束。”

不管他们怎样整，我这时可以回家了！可以见到稼祥了！

在“卫兵”的“旁观”下，我从门缝觅见了稼祥，他瘦多了，身体显得更加虚弱。以后，我每天做完饭可以送到稼祥的门口，借空可以看他一眼。然而，这一点点自由，也如同烟云一样，很快消失了。

一天中午我正在做午饭，进来了一位身着灰呢制服、脚穿刷亮黑色皮鞋的熟人，他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负责同志。

“从今天起，可以解放王稼祥同志了。”

“什么，我可以把饭送进去了吗？”

“可以。”

“可以和他讲话了吗？”我又问。

“完全可以。”

我太高兴了。一会，那个人对稼祥和我说：“毛主席宽大、解放了你，今后，应该和工农兵群众一块锻炼。”

“是的，感谢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稼祥马上表态。

“感谢毛主席！”我也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为了使你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决定你们三天之内动身去河南信阳，到那里向工农兵接受再教育，路途一切已有人安排。”

什么？！一瓢凉水泼了下来。

“三天之内就要离开北京？”稼祥怕听错了，追问了一句。

“是的，这是中央的决定，不止你一人。”

原来林彪的第一号命令发出了。

火车直抵信阳，那个市的领导正在忙碌，为执行林彪发出的第一号命令，安排三位中央“疏散”下来的大干部，费煞心机。

条件还是好的，稼祥却不安，他几次向信阳市有关人员提出到工厂和农村劳动，一直没有人答复，他感到捉摸不透。

其实，我们等于软禁了。一晃就是一年。

返北京喜庆余盼国振兴

稼祥身患急性肺炎了，经急电北京，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批准，被送到北京医院治疗。愈后，中央又决定我们搬回北京居住。这时已经是批陈整风时期了。

不久，林彪一伙背叛祖国，折戟沉沙，葬身蒙古温都尔汗。之后，老同志陆续得到解放，他们欢欣鼓舞，感谢毛主席、党中央英明的干部政策。

我们家里也热闹起来了，不少老战友来看稼祥，王震、肖劲光、廖承志同志先后热情地告诉稼祥同志：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又一次对王稼祥同志的评价。一九七二年，毛泽东同志说：“王稼祥同志写了一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自己的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最早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他出了很大力，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指周恩来同志），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三和一少’是王力搞的嘛，王稼祥同志只是向党中央提出意见。稼祥同志听后，心情舒畅，多年未展的笑容重新展开了。他重又开始参加一些重要会议，看到党内的重要文件。一九七三年，当稼祥知道自己当选为党的“十大”代表时，对我高兴地大声说：

“啊！好极了！拨云见青天了！”就在这次大会上，稼祥重新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回来告诉我：“会议期间，我见到了周总理，他叫我仍旧搞外事工作，而且要我组织一个外交事务的领导班子。我们正在谈话之间，有人来找总理，就把话打断了。”

不几天，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副总理的职务文件发到全

国，稼祥更加高兴，他觉得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激奋之下，他拿起笔来给周恩来同志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在我有生的日子里，希望及早安排我的工作，目前，我是闲人，可以利用时间写东西，叛徒王明现在国外仍旧猖狂已极！我愿意写些文章批判他，如果可以的话，只要一二个助手就可以了。你的意见怎样？是否合时宜？请告之。

信送出去了，稼祥等呀等呀，可是杳无音讯。他心里难过，又猜测起来，是不是又有什么情况变化？……后来的事实证明，稼祥他想到了，当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身陷困境之中，他也无能为力了。

斥批孔心火起英魂永存

一九七四年一月中，江青一伙制造的批孔舆论已经甚嚣尘上。肖劲光同志找到了稼祥，说到党内存在的尖锐斗争，稼祥不安地提道：“批林就批林的反党罪行，为什么大张旗鼓地批孔呢？”

肖劲光同志气愤地说：“是呀？听说这是江青有所指的，矛头指的是周总理为首的老干部，包括小平同志在内。”

稼祥怒火满腔，他气得说：这样胡来，我们国家怎么安定？国民经济怎么搞上去？人民生活何日安泰？

两位老人你一言我一语，心中无限愤懑，预感党和国家即要遭到新的大劫大难。

几天来，稼祥一直闷闷不乐，忧心忡忡。

一月二十二日夜晚，他坐在办公桌旁的小沙发上，两手握着《北京日报》细细阅看，上边有一篇以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名义写的文章《新沙皇的迷梦》，稼祥看到文章最后一段醒目的话语，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三和一少’外交路线……”就象皮鞭一样抽

打在他的心坎上。他不理解，此时此刻出此类文章用意何在？

他把我叫来看这篇文章，“你瞧，又缠着不放。”

“那没有关系吧？对你，毛主席做的结论，周总理亲自在中央会议上传达，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要管它！”我说。

“哎，谁都听毛主席、周总理的话吗？！就看明天《人民日报》是否转载了？”稼祥怅惘地望着窗外。

第二天，稼祥急盼着《人民日报》，他两次跑到门口去看送报的人来了没有。中午时分，报纸来了，《新沙皇的迷梦》六个大字醒目地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啊，转载了！”稼祥顿时感到自己变成一叶孤舟在大海中飘泊，斗争真的又开始了。

这一天上午九点左右，有关单位连续来了三次电话，通知王稼祥同志明天上午十点准时参加在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

稼祥紧蹙眉头对我说了一番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最后一句，他严肃地说：“中国前途可虑！”

这一天，稼祥情绪极为低落，他几十年为革命奋斗的精神已经消耗殆尽，他为党为国耿耿于怀的意志受到连续的打击。……当夜，他在微弱的台灯下，看着书，……他感到气闷、心跳、突然失去了知觉，他的心脏逐渐衰竭……

他长眠了，他没有亲眼看到“一·二四”批孔大会的群魔乱舞，没有看到这一场大丑剧。他长眠了，他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残酷迫害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长眠了，但他为中国革命立下的功绩永存！

今天，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大有希望。稼祥同志，你可以安息了！

（一九八一年四月）

记二一二旅粉碎“十二月政变”的斗争

曹 普

(原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向我国大举进攻，爆发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

那时地下党派我在西北军杨虎城部队作“兵运”工作。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这个部队里官兵的抗日情绪，也十分高涨。我和部队中的一些进步青年，办了一张《抗日小报》，收登新华社的消息，宣传我党发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大纲领》。我们每天又采又写又编，用党的主张来教育这个部队。不久，部队接到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命令。我也随军开到河北灵寿县和山西忻口，在忻口与日寇血战了三昼夜。但那时的西北军还是旧军，他们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战略战术，都完全是旧军队的一套。在战场上消极抵抗，被动挨打，在日寇猛烈的进攻下，弃戈卸甲、溃不成军，和所有的国民党军队一样，节节败退，向后跑了一千多里，一直退到汾南荣河县境的王显镇，才算收住了脚步，准备过河。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如此溃退，留下的人民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我们这支部队退下来路过阳泉车站，只看见飞机轰炸后的惨

痛情景，群众随着我们部队一起后退，太原失守后更成了一支南退的人流，我问了不少群众：“你们准备到哪里去？”答复都是“谁知道，谁知道到哪里去。”真是大祸临头，走头无路。沿路不断传说八路军向北去了，我的心情得到一些安慰。我对旧军的败退极为不满。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们渴望的神圣的抗日战争打响了，日寇侵略的铁蹄已经深入我们的国土，践踏到我的家乡，我怎能跟着这些旧军逃过黄河呢？可是，这里是党决定我工作的岗位，又怎能随便离开呢？正在苦恼委决不下的时候，地下党负责人阎子祥同志来信说，组织上决定要我“立即离开旧军，组织人民自己的武装。”这个决定太使我高兴了。我携信立即动身，按照规定的联络地点，到运城第二师范学校，找到了党的河东道特委。啊！我回到“家”了，我要开展新的工作了，我要去组织党领导的人民自己的武装了。

组织人民自己的武装

一九三八年初，就要过阴历年了，在运城街上没有卖饭的，我这个地下党员吃饭就成了问题，想了好多办法，才就食于牺盟中心区灶上，凑合到正月初五，我被派到猗氏县牺盟会。

从一九三六年冬到一九三七年间，我们党在山西曾组织和运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进行了广泛的发动和组织群众武装抗日工作。各个县的牺盟会都训练了武装抗日自卫队的骨干。所以，芦沟桥事变后，山西各地武装抗日的烈火，便弥天而起，群众抗日的武装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有的县有几百人，有的县有几千。当时猗氏县训练的抗日自卫队骨干有三个中队，每队都有一百五六十人。

猗氏县牺盟会的特派员朱佩瑄、李一农、芦殿文都是共产党员，县长张天珩也是牺盟会派出的，亦共产党员。当时群众把牺盟会派出的县长，都誉之为抗日县长，张天珩同志当时由于只有二十二岁，被群众誉为“小县长”。在旧军队作“兵运”工作时，由于一切大权都掌握在反动派手里，一切工作只能秘密地进行。这个县的政权完全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可以大胆地进行革命的抗日工作，心里真有说不尽的高兴，身上有使不完的劲。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沿着同蒲路长驱直入，直奔风陵渡，国民党和阎锡山的军队望风而逃，地主官僚资本家席卷财宝，西渡黄河，汉奸走狗，恣意横行，汾南地区，处于一片水深火热之中。

日寇占领同蒲路沿线各个城镇后，将晋南劈为两半。在道西汾南地区，包括有闻喜、夏县、河津、稷山、安邑、新绛、解县、虞乡、永济九个县的部分地区和荣河、万泉、临晋、猗氏四个县的全部。这个三角地带被同蒲铁路、汾河和黄河紧紧地包围分割起来，四面背敌，活动余地只有几十公里，增加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困难。但也因为这个地区战争形势艰险，国民党阎锡山的那些反动军队，便都逃之夭夭，不敢在这里坚持；这就便于我们党更放手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了。当时我们的部队没有炊事员，没有管理员，没有侦察员，吃饭、睡觉、情报侦察都依靠当地群众，真是如鱼得水，活动自如，对敌情了如指掌。中共河东道特委根据这种形势，将特委分为东西两个工委。分别以党的工作基础较好的夏县和猗氏两县作为支撑点开展两个地区的工作。阎子祥、温建平同志到铁路以东，高平、王竟成同志到铁路以西汾南地区，分头进行领导工作。一九三八年秋，路西汾南的工委改为猗氏中心县委，划归乡吉特委领导了。

我被派到猗氏县自卫队不久，侵占了运城和风陵渡口的日寇，又于三月三日，向猗氏县城进攻，我们把自卫队拉上猗氏北坡，依托孤山，准备在焦家营、马家窑一带打游击，可是游击怎么打法，怎么声东击西？怎么敌进我退？我们谁也没干过，谁也不知道怎么弄法，甚至连部队如何吃饭睡觉，都不知道怎么弄。部队要撤出猗氏县城了，要不要带被子？不知该怎么办。研究了半天最后决定：不要。抗日嘛，连家都不要了，还要什么被子。结果把所有的被子都集中到猗氏县商会的一间大房子里，摞起来，等以后返回来再说。

当时从猗氏县城出发的武装有两个。一个是牺盟会组织的猗氏县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有三个中队，一个学生队，五、六百人。另一个是党从旧县政府接收过来的公安局武装，有一百五十多人。前者抗日情绪很高，但没有枪，后者虽然有步枪、机关枪，但他们中反动统治阶级的毒素太深，尤其是那些巡官和警察班长，动摇恐日，人心思散，无心抗战。不管怎样，经过耐心动员，忙乎了一天，赶晚上还是把大队拉出了城，开到了大阎村焦家营一带。

三月十日，乌云沉沉，天空飞舞着鹅毛大雪。北面隔着孤山，日寇攻击万泉县城，南面猗氏的敌人又出来配合，孤山一带回旋余地太小，又决定拉部队东上嵒王山。行军至漫峪口村，根本不懂军事，不会指挥的指挥员带着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没有经过任何战斗的队伍，加上许多逃难的群众，真是军不成军，队不成队。这时，那些本来就很动摇恐日的公安局的队伍，更加混乱，开始有的把枪往路旁一扔，逃之夭夭，后来在公安局反动巡官的煽动下，他们围着抗日的“小县长”，要求发饷，准许他们回家。还有的煽动着要抢劫闹事。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我们在耐心教育严肃批评他们的间

时，提出发饷回家可以，但必须把武器弹药交出来，让自卫队去打日本人。公安局那些巡官和警察接受了这些条件，纷纷交出武器，领了薪饷，四散回家了。

我们把枪支集中起来，分发给自卫队。自卫队有了枪，就神气了。这时自卫队也需要整顿一下，我们把队伍集中到一个大庙里。挂着牺盟会特派员身份的党的县委书记朱佩瑄向大家作动员，分析了形势，说明队伍要到秸王山的战斗任务。宣布把猗氏县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改为猗氏县人民抗日游击支队，县长张天珩兼支队长，特派员朱佩瑄任政治部主任。把阎锡山派来的自卫队总队长卫汇民宣布为副支队长，徐振本为支队参谋长。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党对游击队的领导权。支队下管辖三个中队。任命了三个中队的干部以后，队伍便向秸王山进发。李中和是一中队指导员，我任二中队指导员，王光前、郭洪江和邹良辰几个刚从运城中学出来的革命青年，担任了二中队里三个分队的工作员。我们一同带着队伍，高高兴兴地出发行军。部队到了秸王山沟东沟西北村驻下，又渴又饿又累，也不知道弄个管理员司务长管理伙食，支队长和政治部主任亲自忙着给大家烧开水。县政府那些人员被派出向各家各户收集蒸馍，真象乞讨一样，一时也讨不来许多，大家饿着肚子，意见很大。那时只知道民主，不知道集中，只知道自己带头干，不懂得指挥。支队长和政治部主任为大家烧开水，把眼睛熏的通红直流泪，我们还一个劲地批评说：你们两个光烧开水能行吗？

游击队在秸王山上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受到了锻炼，扩大了影响。后来回到猗氏县北坡上，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在秸王山西，孤山南面的焦家营、马家窑一带活动，逐步形成我们的根据地。在对敌斗争中，猗氏公安局也组织成一个中队，吴林泉同志任

公安中队指导员，游击队也逐步由一个大队三个中队，发展为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共有一千多人。这时，汾南其它各县的游击队，也很快发展壮大起来。

只有改造部队才能掌握部队

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在振奋群众的同时，更引起了日寇的重视和阎锡山的争夺。

日寇为了巩固它在汾南的血腥占领，在各县城镇修筑了星罗棋布的炮楼据点，并用纵横交错的公路，将各据点联起来。游击队就在敌人的格子网里活动、战斗。在艰苦的战争中逐步克服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幼稚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取得了不少进步。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把游击队建设成真正的人民的军队，和阎锡山派来的那些总队长、中队长旧军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强调：“只有军官才能指挥一切”，“政治指导员不能指挥部队”，“政治服从军事，指导员是附属的”。“官兵之间就是绝对服从”。“不打不骂不能管好军队，对军民关系就是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他们要把反动军队的一套推行到游击队，妄图使抗日的游击队变成他们的反动工具。他们更不甘心由牺盟会的县长担任支队长，而自己作副职，时刻妄想篡夺领导权。一九三八年五月间，日寇第二次进攻猗氏县城时，支队长张天珩留在县城，配合友军，进行守城战斗。反动军官卫汇民和徐振本乘机造谣说：“支队长张天珩牺牲在城里了。”要由他们来担任支队长，游击队的一切行动，要听他们的指挥。他们还想乘机谋杀政治干部和共产党员。正在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突城而出的支队长张天珩，回到了部队，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猗氏中心县委书记高平（即薛涛）亲自来到二中队驻地荣河县王午庄北七八里的小月村，给了二中队一个战斗任务，消灭驻在荣河县王午庄的一支反动武装。这支武装是阎锡山部下赵戴文侄儿，在荣河一带收罗散兵，假充八路军，组织的一支一百多人的武装。这支武装不消灭，荣河县游击队就搞不起来。我们当晚作了动员，召开了军事会议，研究决定战斗部署，只记得一句话“第二天拂晓进攻”。但是，那时部队谁也没有一只表，一觉醒来，天已大明，集合部队一口气跑到王午庄村北大门口，竟连敌人一个哨兵也没有碰到。敌人是否逃跑了呢？不管三七二十一，猛扑进去，一下子堵住了敌人的门口。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人全部被消灭，赵戴文侄儿和敌队长从南门口只身逃跑。后来了解，敌人并不是没有警戒，只是天明后，看到没有情况，就把哨兵撤回睡觉去了。这倒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这次战斗缴获了一百多只枪，俘虏的敌人比我们二中队的人还多。当天正是清明佳节，又是我们二中队组织起来，打的第一个大仗，大获全胜，战士们都高兴极了。

二中队返回猗氏后，针对着反动军官一怕死，二反动的特点，与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政治上我们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抗日团结进步的主张，揭露一切贪生怕死，妥协投降和反动倒退的活动。在部队内部提倡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反对打骂和体罚，提倡民主选举班长和分队长等。这些深得战士们的拥护。通过民主选举班长，把任命班排干部的 leadership 夺过来了，一半以上的班长、分队长，都由民主选举出的进步的优秀的战士来担任。这样一来，中队的形势大变，革命的一套占了上风。政治干部说话灵了，旧军官那一套就很不灵了。他们在群众中孤立了，变臭了，有些坏家伙被

淘汰了，有的不辞而别另找出路去了，阎锡山派来担任二中队队长的王颀成了光杆司令，最后只身跑进猗氏县城，投降日寇，当了县皇协军大队长，成了汉奸。

经过多次痛击敌人的战斗以后，猗氏县城的敌人部队，不敢轻易出来抢掠了。猗氏北坡上的七十二个村庄，都成了我们活动的地区。抗日县政府的政令，从孤山角下直到猗氏城下，畅行无阻。群众抗日情绪大为高涨。

生死的争夺和搏斗

一九三八年冬，牺盟会发展壮大山西新军，把汾南地区秸山、闻喜、新绛、曲沃、安邑、猗氏、万泉、虞乡、荣河各县的抗日游击队，集中组建成政卫一支队，下编十个大队。孙定国任支队长，王成林任政委，陈捷第任政治部主任。朱佩瑄、张天珩、曹普、薛克忠、郑方等同志组成党团，加强了党对这支武装的领导。

汾南地区有了这支抗日的骨干力量，再加上各县的抗日游击队和抗日公安局的地方武装，如虎添翼，抗战的形势更好了。猗氏县的游击队改编为六大队后，大队长是红军干部李明如，我是大队的指导员。部队升级了，打击敌人的地区扩大了。因而，日寇龟缩在据点里，伪军和顽军成连成排的来投降，这时，阎锡山也乘机在政卫一支队建立了以参谋长田雨亭为头子的特务情报工作，并在田周围集合了一批反共顽固分子。为了搞掉田雨亭，政治敏锐的朱佩瑄同志曾亲赴秋林，利用蒋阎矛盾，揭露田是蓝衣社成员，想通过合法手段，以秘密党员张跃同志任旅参谋长，换掉田雨亭。但诡计多端的阎锡山，只许张跃作参谋处长。没有及早把田雨亭的参谋长搞掉，给后来的斗争增加了许多困难。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武汉失守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进一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秘密颁发“限制异党实施方案”，准备向日寇妥协投降。军阀阎锡山更加蠢蠢欲动，制造妥协投降的舆论。这年冬天，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他确定了“重整旧军，压制新军”的反动方针，施展各种阴谋手段，妄图打击消灭牺盟会和山西的新军。在汾南，他极力想要把政卫一支队变作他投降反共的工具。一九三九年夏天，政卫一支队改编为新军二一二旅，孙定国任旅长，朱佩璋任政治部主任，张天珩兼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团：第一、三、五大队，合编为五十四团；第四、六、九、十大队，合编为五十五团；第二、七、八大队合编为五十六团。每团下辖三个营。六大队这时改编为五十五团的第三营，是这个团政治上最可靠，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阎锡山利用改编的机会，取消了政委制，并派了大批的反动军官到二一二旅各团担任要职，夺取领导权。肩膀上挂着上校军衔的田雨亭窃取了旅参谋长，反动上校军官、阎锡山的特务梁吉庆攫取了五十四团团长的职务，中校军官伍德铭做了五十五团的中校团副，反动透顶的程德又抓去了五十四团二营营长的兵权。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阎锡山还从随营学校派了几十名经他亲自训练过的团营级校官，全面夺取二一二旅各团营的指挥权。组织科长薛克忠和曹普及党团的同志研究后，采取一致的坚决顶住的态度，拒绝把他们分配到各个团营去。田雨亭和他的同伙们为此事暴跳如雷，骂声连天，薛克忠同志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使这一全面篡权的恶毒阴谋，未能得逞。双方经过激烈斗争，反动军官梁吉庆担任了五十四团团长的职务，共产党员原逸田担任了五十四团的政治主任，共产党员李明如、曹普担任了五十五团的团长和主任，共产党员杨鹏昆担任了五十六团的团

长和主任。在营连排基层干部中，除少数是阎锡山派来的反动顽固军官外，绝大多数都是坚决要求抗日要求进步，拥护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阎锡山派来的许多反动军官，则担任了大大小小的参谋，麇集司令部，在参谋长田雨亭的策划下，到处搞小恩小惠收买拉拢的阴谋活动。

正确的路线和方针

一九三九年三月，阎锡山在召开秋林会议后，加快了反动投降的步伐。同年九月，他通知所有山西新军的营以上干部，都到陕西秋林阎锡山的驻地集训。他要借此对新军的干部，进行摸底排队，收买分化，妄图把共产党员和坚决抗日的干部，一网打尽。那时我们的警惕性还不够高，我和李明如、原逸田、杨鹏昆及许多共产党员都去了。阎锡山、王靖国、邱仰俊这些反动头子，经常装腔作势的来“训话”。贩卖他们的“生存即真理，需要即合法”、“无条件存在”，“按劳分配，物产证券”……那一套“二”的哲学。阎锡山用这些“训话”一面制造投降舆论，一面借以观察人们的政治立场和对他的态度。每晚王靖国拿着花名册点名时，背后都站着两个人对照着名册，在他耳边嘀嘀咕咕，指指点点。

在牺盟总会工作的牛荫冠同志不断地向我们分析形势，警告我们：“阎锡山说天快下大雨了，要准备雨伞，我们也要准备雨伞。”

在秋林的四十天集训中，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们常当场揭露他们妥协投降的谬论。有一天晚上点名，有个反动队长“训话”说：“现在集训有些人就是不好好学习，有些妖魔鬼怪在活动……”，气势凶凶。与我们同去的旅政治部保卫科长肖

平同志站起来质问道：“请问队长，什么叫妖魔鬼怪？”那个家伙凶狠地说：“妖魔鬼怪就是妖魔鬼怪，要不你就站出来讲！”惯会幽默的肖平同志从队列中出来，站在台上，不紧不慢地说：“我了解妖魔鬼怪者，非人也，是不是呀？队长。”那家伙咬着牙说：“当然不是人！”肖平同志紧逼着说：“请队长指出来我们这里面那一个不是人！”这一问弄得那个家伙傻眼了，手足无措。这时，肖平同志愤怒地说：“司令长官要我们来集训，他骂我们不是人，我们能答应吗？再说，他这不是辱骂司令长官吗？！”

“不能答应！不能答应！”

“打倒顽固分子！”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队伍中喊出了口号，一下子沸腾起来了。那个反动家伙惊慌万状，连忙溜之大吉。

纪念“九·一八”那天晚上，牺盟总会的干部和我们集训的新军干部及当地群众，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示威，从牺盟总会所在地出发，直到二战区司令部门外，我们沿路高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口号。愤怒的人群通宵达旦，在这小镇子上讲演呼喊了一夜，显示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

这天晚上，阎锡山也命令他的那些喽喽们，集合起来，到秋林镇上游行。他们手里打着小白旗，有气无力地喊着“无条件存在”的反动口号，队伍稀稀拉拉，原来还想和牺盟总会的火炬游行搞“对抗赛”，可在一片愤怒谴责声中，这个为反动派摇旗呐喊的小小队伍，便很快的四散瓦解了。

在秋林集训期间，阴险恶毒、惯于玩权术耍阴谋的阎锡山，不仅对他训练的旧军官，也对新军干部，送巨款，以进行收买，封高

官广为拉拢。他把二一二旅旅长孙定国同志找去，跟他个别谈话，还做出姿态，给二一二旅拨款，发了几十挺轻机枪和大批弹药，以示信任和重用。

十月中旬，再有几天，秋林的集训就要结束了。阎锡山制订了恶毒的计划，密谋了具体的步骤，阴谋把新军集训中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在他正要动手的前夕，传来了苏军出兵波兰的消息，欧洲战场的新形势，使老奸巨猾的阎锡山又暂时收回了他的魔爪。他想要再观察几天。

洞悉了阎锡山阴谋的新军干部们，在党的指示下，乘此机会，连夜疾走，纷纷离开秋林。我和二一二旅的许多同志商定，赶快返回部队，考虑到阎锡山正在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生死搏斗，蒋管区敌人又不了解我们的政治面目，因此，回去的路线不能走阎管区，要走蒋管区。于是，我们沿着黄河西岸，从国民党军队的驻地一直走到韩城、潼关，但他们不让我们过河。下站就是河南会兴镇，再往东走，就回不到了汾南地区，回不了部队了。我们心急如火。我想，对任何反动派，都要善于和他们斗争。我把阎锡山发的上校军衔戴上，上街买了条武装带，着着实实的装扮了一番，弄个警卫跟着，大摇大摆的走到黄河渡口跟前。守渡口的是国民党九十三军的一个营。我拿出一付压倒对方的派头，和那个守渡口的营长寒暄了几句，他瞧着我的官阶比他高，气派比他大，就毕恭毕敬地让我们过了黄河。

在我们日夜兼程赶回部队的途中，听到阎锡山下令旧军，向驻在晋西的新军决死二纵队大举进攻。抗日战争中第一次反共高潮，反革命的十二月政变由阎锡山开了罪恶的第一枪而开始了。阎锡山撕下了抗日的伪装，凶象毕露，向新军向我党猖狂进攻了。

面对阎匪发动十二月政变的紧张局面，我们回到部队，立即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汾南工委和二一二旅党团仔细分析了二一二旅和汾南地区的力量对比。在二一二旅内部，五十四团掌握在反动军官手里，五十五团和五十六团的大部分完全能听党的指挥。政治部都是共产党员，是革命的中心，但反革命在司令部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争取旅长孙定国就成为关键问题了。当时，在汾南地区有彭之久、涂则生和北沙同志带领的八路军一个游击大队，有很强的战斗力。还有各个县的公安局和游击队，都在党的领导之下。但在荣河县活动的阎锡山部蔡庆山团，反动顽固，同日寇勾勾搭搭。我们决定坚决消灭这支反动武装，削弱反动派的力量，减少后顾之忧。我们找旅长商量，要打蔡庆山，孙定国同意了。李明如和我带领着五十五团，还有其他团采取远距离奔袭，把蔡庆山部队包围在四面是沟的荣河回龙村，一举将其全歼了，俘虏了一千多人，缴获了十几挺轻机枪和全部武器弹药，大获全胜。

打完蔡庆山，回到万泉县文村驻地，突然接到阎锡山来电：“任命曹普为荣河县长”。开始我们都很惊奇，正当反共高潮中间，阎锡山为什么把荣河县的反动县长撤掉，而派一个他明知是共产党的人去干呢？党团经过研究认为，这是阎锡山的调虎离山计，先把曹普调出，再把李明如团长搞掉，他就可以夺走五十五团的兵权了。这真是痴心妄想。党委决定，县长要当，部队也不能放。我们找到师宗洛同志，带上部队到了荣河县，枪毙了两个汉奸，出了一张布告，留下师宗洛同志担任秘书代理县长，我们带上部队，又回到了桔王山。

为了彻底解决好二一二旅的领导权，狠狠打击阎锡山反共投降阴谋，我们积极争取、团结孙定国同志。孙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作

过私塾老师，当过兵，尝尽了旧社会的艰辛。一九三六年，牺盟会成立后，他是阎锡山军队中第一批参加牺盟会的军官。他抗日热情饱满。阎锡山任命他作二一二旅旅长，是为了拼命的拉拢他。在秋林会议期间，阎说孙是“能够无条件存在的英雄人物”，又任命孙兼任七专区保安司令。据孙说，在秋林集训期间，阎锡山还曾向他面授机宜，给了他委任状，要他回来撤换李明如，另外委派团长。因此给他补充了大批轻机枪和弹药。由于阎锡山进行恶毒的高间工作，使孙对党的政策有疑虑。有一天，孙定国向宣传科长郑方同志问道：共产党是否主张暗杀？郑方同志诚恳地说：“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一切剥削压迫的罪恶根源，是旧的社会制度，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因此搞暗杀是那些历史唯心主义的民粹党人的主张。共产党人的主张是团结绝大多数人搞革命，现在统一战线就是团结绝大多数中国人进行抗日。”郑方同志中肯的解释，和他耐心的帮助，打消了孙定国的疑虑。

当时，在十二月政变紧迫的形势下，二一二旅党团内对如何对待孙定国旅长和被反动军官掌握的五十四团，有两种意见，争论的很激烈。有的同志认为既然阎锡山已经发动了十二月政变，向我们开了第一刀，因此，在汾南地区，我们革命力量要先下手为强，缴掉孙定国的枪，撤掉他的旅长，全部解除五十四团的武装，不然就要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革命受损失。但党团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孙定国同志出身贫苦，是第一批参加牺盟会的军官，抗日很坚决，如果积极向他说明目前的形势和党的政策，孙定国会跟着我们革命的。如果我们把孙定国的工作做好了，再争取中间力量都站在我们一边，只剩下田雨亭、梁吉庆等极少数顽固分子，那我们就会取得反顽斗争的全胜。因此，应该先礼后兵，为了

应付意外的情况，先把我们能指挥的武装完全组织好，居于绝对优势，然后谈判劝说，实在不行，再武力解决。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汾南工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张鸿毅到二一二旅加强领导。八路军汾南游击大队政委彭之久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把二一三旅的两个营从中条山调下来，到栾王山活动。把汾南所有的革命武装都集中起来，调动起来，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使田、梁控制的五十四团不能轻举妄动。然后派彭之久同志以共产党的公开身份，去找孙定国同志谈话，做工作，说明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反共投降的阴谋，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政策，诚恳希望他能接受党的领导，指挥部队坚持抗战，粉碎阎锡山的阴谋。孙定国表示完全接受，愿意跟着党革命到底，抗日到底。王成林、张天珩同志又同孙定国一起分析二一二旅内部的形势和部队的政治思想情况，研究了把三个团整顿好，把各县的公安武装和游击队集中起来，改编为两个游击支队。这时孙定国明确表示，要革命先把电台交出来，这就派沈钧和冯联同志去把电台从不可靠人的手里接管过来，以便应付紧急事变。

当时作为革命武装骨干力量的五十五团，牢牢记着毛主席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作好一切准备。我和李明如商量好，接受红二十四军军长、政委离队出去不幸都被惨杀的教训（史实可参阅本刊下期陈子毅的文章《在一个多月的日子里——红二十四军的片断回忆》），目前决不能轻易离开部队。如有特别需要，也只能一个人离开，留下一个人坚守岗位。这样，即使一个牺牲了，还有一个可以指挥，不至于使这个部队出意外，使革命受损失。李明如团长把五十五团的驻地布置的戒备森严，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决定没有团部命令，任何人

许接近岗哨。一天下午，孙定国旅长到我团来，哨兵不许他接近，他说我是旅长，找你们团长有事，哨兵说：“旅长也不行。”第二天集合部队讲话，刚讲话完毕，队伍即喊出口号：“谁抗日拥护谁，谁不抗日打倒谁！”旅长对警惕性这样高的部队，当面予以了赞扬。

汾南工委代理书记张鸿毅直接来到二一二旅工作后，他坚持不懈地要求党团作好团结孙定国旅长的工作，对左倾冒险的言行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斗争。他要求作好争取中间力量，作好团结大多数人的工作，要求把思想动摇的人，都争取过来。提出立即恢复政委制，在部队里发动士兵群众，开展反顽固分子的运动。顽固分子也猖狂凶恶，四处造谣，进行活动。

形势十分严重，眼看双方都要下手了。一天李明如同志找我说：“明天就要宣布恢复政委制了，恢复以后就不能乱搞了。趁这个机会今天发动群众，先把咱们团里那个坏蛋伍德铭搞掉。”商量好，他就派了两个战士，出其不意的缴了那个中校团副伍德铭的枪。然后押送到旅部，给旅部写了封信说：“五十五团的群众都痛恨顽固分子，不要这个顽固团副。”

旅部的领导正在开会讨论恢复政委制的问题。孙定国一看说：“好，这一下五十五团的问题解决了，可巩固了。”参谋长田雨亭那些坏家伙，可火儿啦，大嚷大叫：“好！这样干法，咱们都这样干！”并说：“这是目无上级官长和军法。”非要处分李明如和我。会上一下子闹的不可开交。朱佩璋赶紧解围说：“这事交给政委处理吧。”王成林政委也很紧张，怕出乱子，连忙打圆场，说要亲自处理这件事。最后决定，给李明如撤职处分，给我记大过。撤了李明如，谁去担任五十五团长呢？田雨亭提出，要派一个经过

阎锡山训练的随营学校的顽固军官去。朱佩瑄和党员领导干部都坚决反对。双方争吵的非常激烈，相持不下。那些反动家伙也知道五十五团党的力量强，旧军官也没有人敢去，最后还是派了共产党员薛克忠来担任了五十五团团长了。

决定性的胜利

紧接着，我们在栾王山丈八村，集合了数万军民，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对顽固分子大会。大会上宣布恢复政委制，狠狠打击了破坏抗日破坏团结的顽固分子的反革命气焰。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政委王成林找孙定国研究如何解决旅参谋长田雨亭和五十四团梁吉庆、程德的问题。

第二天一早，孙定国和王成林带着尚思光和康喜仁，到五十四团驻地下王尹去了。出发前，孙定国对他的警卫员说：“今天我们解决一个大问题，你把子弹上膛，要是有人用枪打我，你就开枪打他。”下王尹离东文村三十华里，一个多小时就跑到了。梁吉庆把孙定国迎到屋里，孙定国命令他集合部队，旅长要向全团战士讲话。梁吉庆即把队伍集合起来，孙定国大声宣布：“你们的团长梁吉庆另有任用，给你们另换一个新团长，同意不同意？”大家都喊：“同意！同意！”“那好，尚思光现在就是你们的新团长。”孙又问二营：“给你们换一个营长，派康喜仁担任你们的营长，同意不同意？”二营也呐喊着：“同意！同意！”就这样，出其不意地把阎锡山派来的两个坏家伙搞掉了。

五十四团的问题解决后，孙定国和王成林马不停蹄回到东文村政治部，立即派人到南文村司令部，请参谋长田雨亭到政治部开会。田刚一进屋，外面就下了他警卫员的枪。屋里，薛克忠上去一

把抓过田的手枪，笑嘻嘻地说，“让我看看你的枪！”这个平日凶狠的反动家伙，顿时吓的脸色惨白，浑身哆嗦地说：“旅长，旅长，我也想革命啊！……”孙定国说：“革命，好啊！你先到招待所把阎锡山的阴谋交待清楚！”

迅雷不及掩耳，孙定国和王成林又跑到南文村司令部，通知所有的参谋到司令部开会。那些反动参谋进屋后，孙定国讲话痛斥了阎锡山的反共投降阴谋，然后下令说：“来吧，把你们的枪都交出来吧！”参谋们大眼瞪小眼，看看房门被堵上了，一个个乖乖地把他们的枪都放在桌子上。当晚又向全旅发布命令，任命八路军汾南游击大队政委彭之久同志，担任二一二旅的参谋长。就这样，从早到晚，在一天的时间里，我们消除了气势汹汹的顽固势力，斩断了阎锡山派来篡夺领导权的魔爪，使二一二旅的全部武装掌握在党的手中，成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的抗日武装。这也是反动军阀阎锡山在山西反共阴谋，遭到可耻的全盘破产的一个证明和纪录。

为了彻底粉碎蒋介石、阎锡山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不久我们接到了朱总司令从太行山发来的电报，命令二一二旅开赴太岳区，向主力靠拢，实行新军大会合。我们对二一二旅进行了动员和整顿，又把汾南各县的地方武装整编为两个游击支队，召开了抗日讨逆出师大会，四千多人，三千多支枪，形成浩浩荡荡的铁流，从稷王山出发。在日寇占领区和顽军驻地的结合部，杀开了一条血路，向北进发。经过七个昼夜的浴血战斗，进军七百余里，终于粉碎了日寇、伪军和顽军的围追截堵，胜利地到达了沁源县。这里有八路军主力部队三八六旅，有山西新军的主力决死一纵队。我们和这些老大哥部队胜利地汇合了。从此，太岳区抗日根据地又增加了一支生力军。

红旗插上太原城

王 紫 峰

(全国政协委员 原北京军区副政委)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三大战役的决战，国民党反动派数百万军队已经全线崩溃，埋葬蒋家王朝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除绥远外，广大的华北土地只剩下太原一座孤城还在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统治下。但是，它早处于我华北野战军一兵团及晋绥军区地方部队的层层包围之中。

太原是阎锡山的老巢，由于阎锡山的残暴统治，使这座美丽的古城经济凋敝，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阎匪最后龟缩到了太原城内，企图作最后的顽抗。阎匪用人民的血汗在太原城内外筑起了一道道工事，碉堡林立，壕沟交横，这是他妄图作垂死挣扎的象征。但是，也正因为阎匪的残酷统治，已激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士兵中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增长，士气低落已经达到空前的程度。

为了解救苦难的太原人民，彻底消灭阎锡山匪徒，我华北部队在参加平津解放战役后，经过短时的休整，即接到向太原进军的命令。

我当时在六十六军任政委，部队驻在北平城北角郊区句邑地区的东石槽，接到命令后，经过简单的动员就出发了，我们日夜兼程往前赶，经过二十天的强行军，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顺利地到达目的地，距大孟镇不远的南郑村一带，作战前准备工作。

部队途经大孟镇时，一兵团政治部和晋绥军区政治部组织了一个大慰问队欢迎我们，他们在那里设立了鼓动棚，送水送茶，歌声连天。他们还给团以上的干部献了花。“向兄弟部队学习！”“解放太原，消灭阎锡山匪帮！”“为山西人民报仇！”口号声此起彼落，热烈的情景使广大指战员都挂上了激动的泪花。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华北部队统一编为十八、十九、二十三三个兵团，成立了解放太原前敌委员会，由徐向前同志任书记，罗瑞卿同志和周士第同志为副书记，统一指挥太原战役。总前委设在榆次大峪口，距我军驻地一百五十里。

我们到达目的地稍作休息之后，就接到总前委召开扩大会议的通知。四月四日早饭后，我即乘车去总前委，由于路上坑洼不平，又走错了路，一百五十里的路程直到下午四点才赶到。经过一天的颠簸，又困又饿，但却特别兴奋，因为一场新的大战就要开始了。

休息了一个晚上，基本消除了疲劳，第二天就正式开会了。这次会一共开了三天，首先由罗瑞卿同志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决议，使大家认清了全国即将胜利和工作重点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大好形势。

在最后一天会上，罗瑞卿同志正式作了太原战役的政治动员，指出了当时的全国大好形势、解放太原的伟大意义及我们必胜的条件。最后，彭德怀同志代表中央作了指示。他指出，从七大以来，由于我党路线的正确，使中国革命发展的速度超人预料之外，

现在南京政府已经分崩离析。鼓励大家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彭总特别提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重点的转移，干部要加强学习，尤其要学会准备管理城市，管理经济，彭总还就太原战役的具体战术问题指出，阎锡山匪徒虽已成瓮中之鳖，但困兽犹斗，阎部又是善守出名的，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一点，准备打攻坚战。他指示我们各部队首先扫清外围，然后集中力量攻城。

我和彭老总在井冈山见过，已经二十二年未见面，这次见到非常高兴，他比井冈山时期胖多了。他这次代表中央来太原作指示，是由于徐向前同志病了，他又实际担任了太原战役的总指挥。

会议于四月七日结束，第二天我就同肖新槐军长赶回部队。

战前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

四月十日上午，我赶到西黄水六十六军前线指挥所。翌日，即和干部们去看地形，视察了炮兵阵地、指挥阵地，选择了突破口，下午召集了各师首长会议，具体研究了作战部署。

为了防止阎匪在太原打响后突围逃跑，兵团又命令我军准备堵截突围之敌的任务。四月十四日，我即率两个师和一个骑兵团向静乐方向前进，十五日到达康家会、小店镇一线，准备在类坎、下静游地区堵击逃敌。

正在我军修筑工事，进行各种准备的时候，四月十七日下午，接到兵团首长电话，说太原总前委决定四月二十日向外围发起总攻，从各方面情报和观察判断，太原之敌突围的可能性不大，要我军除一九六师和骑兵团留在原地，待二十日返回作为总攻的第二梯队外，其余部队速归原驻地，准备参加总攻。因时间紧迫，我们于当日下午就乘车返南郑，第二天即赶往指挥所西黄水。

十九日上午，我与肖新槐军长、张连奎副政委、刘苏参谋长等分

头到各部队进行动员工作，我到了一九八师五九二团作了一次战前动员。会上，我列举了阎锡山匪徒的十大罪状，指出现在全国的解放形势很好，该是结束阎匪罪恶统治的时候了，同时分析了我们必须的条件。要求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为苦难的山西人民报仇。动员之后，请战书、决心书象雪片一样飞来，整个部队沸腾起来了。

晚饭后，就进入了指挥阵地。

四月二十日，天气晴朗，解放太原、彻底消灭阎匪的战斗号角吹响了。我六十六军除一九六师尚在静乐县外，一九七、一九八师都进入了阵地。按部署，一九七师四个团由阳曲弯、阳曲镇突破，直插黄花园、皇后院，一九八师两个团加山炮营、野炮、榴弹炮营由峰西以西突破。

驻守阳曲镇的是敌七十一师二二一团，该团赵团长早已与我方有些联系，因此，我军一开始发起攻击，他们就放下了武器，我一九七师很轻易就得手了。

峰西方面的敌阵地在我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压得抬不起头来，官兵乱作一团，炮火延伸以后，我军指战员就如猛虎一般扑了上去，敌军除击毙的外，纷纷举手投降了。

当日我们突破了敌第一、二道防线，占领了炼铁厂、化学厂，这天俘敌团长以下官兵五千余名，武器堆积如山。

四月二十一日，由一九七师的五九〇团继续扫清外围，此时敌人已成了惊弓之鸟，我军很快占领了工厂区，到下午三时，外围基本清理完毕，我军全部占领了北关，距城墙只二百米，敌人几次反扑都被击退，于是敌人只好用炮火封锁，妄图进一步顽抗。

外围已经扫清，就等着二十四日攻城了，六十六军是担任主攻的部队之一，经研究，决定由一九七师担任主攻，已经归建的一九

六师任助攻，一九八师为主攻方向的第二梯队。为了加强攻势，兵团还给我军配备了一个野炮、榴弹炮团和一个山炮团。

指挥部命令二十四日六点攻城，八点登城。

五点三十分，我军命令炮兵开始试射，大炮怒吼着，一排排炮弹飞向敌阵地，广大指战员为炮兵的准确射击叫好……我军士气旺盛，还未待炮火轰开城墙缺口，就架梯开始爬城了，指战员们蜂拥而上，六点二十分，五八九团指战员们，在团长赵培章、政委杨子安同志指挥下，英勇果敢，动作迅速，已经首先登上城墙，经过反复争夺，终于夺取了北面小城门，因敌人已用土石将城门填死，我们就用炸药炸开了。冲锋号咣咣地响，后梯队向潮水般向城内拥去。此时，助攻部队也登上了城头，七点二十分，友军也从不同方向攻进城内，敌人处于重重包围之中，我军的冲杀声，敌人的哭喊声，激烈的枪声响成一片。敌人的一切反扑都成了泡影，阎锡山匪兵，除击毙外，统统放下了武器。十一点三十分战斗全部结束，阎锡山经营了几十年的太原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来了。太原人民欣喜若狂，互相庆贺，热情地欢迎我人民解放军。

这一仗，除击毙之敌外，我六十六军俘敌一万二千三百多名，其中将级军官十九名，校级军官五百一十三名，尉级军官一千三百余名，缴获山炮三十四门、榴弹炮四门，其他军用物资无数。

这次战役，我军五八九团首先登上城头，为了给予嘉奖，兵团发给该团一面上书“捷足先登”四个大字的光荣奖旗。

战役结束后，总前委开了三天的扩大会议，总结了这次战役的经验，并布置了今后的工作。

我六十六军经过短时间的休整，旋又奉命开赴了新的区域……

(黄国平整理)

中央军委在上海情况点滴

黄 杰

（全国政协委员）

近来，不少同志要我谈一九三〇年前后中央军委在上海的情况。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再加上秘密工作的关系，只能了解一些表面的局部的情况。

一九二九年，我在湖北松滋县组织九岭岗起义失败后不久就到了上海，在军委机关里作秘密交通工作。

一九三〇年夏，立三路线鼓吹全国总暴动，夺取大城市。军委派曾中生同志到南京领导暴动，我也被派去了南京。说是有兵运工作，其实就一个姓吴的团长和几个士兵。规定夜间行动，以放鞭为号。等了一夜也没有放鞭，暴动没有成功，我和曾中生同志又先后回到了上海。

军委机关住在上海成都路，是一幢三层的楼房。曾希圣、朱瑞、傅钟等同志都住在这里。恩来、伯承同志经常到这里来，荣臻同志有时也来。恩来同志是军委的书记，欧阳钦是秘书长，朱瑞同志搞兵运工作。吴德峰负责外部交通、对外联络等。

恩来同志是我军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他亲自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自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直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为我军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在上海期间，他根据党的“六大”的决定，对党的军事工作实行全面领导。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他代表中央发出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对古田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对湘鄂西、鄂豫皖苏区以及长江局的一系列指示都对各根据地的建设和红军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恩来同志的精明能干是众所周知的。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有一次，恩来同志让我给伯承同志送一秘密文件，并请伯承来议事。文件放在一个茶叶筒里。我到了伯承同志住处，发现警号（窗上挂一条红线绳）没有了。周围情况又不象遭到破坏的样子。我在周围转了好几圈，不敢贸然闯入，只好回到机关。恩来同志正等得着急，见没有找到，很生气，以为我出去玩误了事。正在这时；伯承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了进来。我着急地问他那里去了。他说没有那里去。“那为什么警号没有了？”我更加着急。伯承开始一惊，一想，又和缓地说：“莫要急，可能是我们家里的人拿去拴鸡了。”大家虚惊一场。事后听说这次议的是国民党在蒙古的一个部队要哗变，急需处理和答复。

恩来同志要求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原则，从不随便和人来往。伯承同志在上海结婚的时候，在四马路的四川酒店摆了酒席。欧阳钦、吴德峰、戚元德、蔡纫湘，我们都去了。事后，被恩来同志知道了，对我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当时，上海的包打听很多，还有一些雇佣的印度警察，大家叫他们红头阿三，经常盘查行路人。恩来同志身着长袍，对外的身份是复旦大学教授。遇到包打听，恩来同志很坦然地让其盘查，说去复旦大学上课去，应付自如。

伯承同志住愚园路，是一座两楼两底的房子。家里有吴景春同志和她的母亲及弟弟。朱瑞同志也在那里住。伯承有一个老师，在上海有点地位，做他的保人。

我第一次见到伯承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在邓初民同志的家里。邓老是复旦教授，有地位，当时是进步的民主人士。他是湖北江陵人，和我同乡。所以我常到他那里去。他住的地方弄堂大，房子也大，敌人不易注意。有时也借以甩掉敌人的盯梢。那一天，欧阳钦的夫人蔡纫湘同志同伯承同志一起来，蔡也是江陵人，是同乡。

伯承同志曾去苏联留学，懂得一些俄语，凭借辞典可以翻译俄文书籍，他很勤奋，很刻苦。在上海期间翻译了大量的军事著作。他有时在家里翻，也有时在我们机关的三楼上翻，常常是彻夜不眠。有一天早上，我上楼喊他下来吃饭，见他累的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军委的领导同志常来成都路机关。贺诚同志还在上海办了一所小医院，掩护中央各机关在这里接头、开会。

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在敌核心内做秘书工作的钱壮飞同志把这一消息报告了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当机立断，命令军委机关迅速转移。我因事外出，在路上接到通知，说不要回去了，马上转移。我说还有印刷机要收拾。来说，已有别的同志负责转移了。以后恩来同志作了其他安全措施，使军委机关转危为安。不久，恩来同志就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去了。

我在上海一直呆到一九三三年。王明的路线比立三路线还要“左”。不顾条件的不足、环境的恶劣，到处组织“飞行集会”，使我党在白区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损失。那时，宋庆龄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御侮自救会”，支持共产党抗日救国。一九三三年“五

一”节，我们以“国民御侮自救会”的名义组织集会，要把租界的工人拉到中国地界去集合。敌人出动了大批军警进行镇压。游行集会的公开指挥、秘密指挥都很快被捕了。不得已又让我和陈一福两个做秘密工作的女同志冒险出去检查。在马路上也被敌人逮捕了。那一天，仅沪东区就抓了五、六十人。虽有宋庆龄聘请了有威望的律师辩护，但敌人还是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徒刑五年，因系无知少女减刑二年半。”这样，我于一九三五年底刑满出狱。先住在同乡熊得山先生家里，他是复旦大学教授，是进步的民主人士。他告诉我，上海很乱，有伪党，也有共产党，好坏难分，嘱我暂不要找党。后经他的安排送我去香港，和组织接上了关系。一九三八年初新四军成立，长江局调我去新四军军部服务团任女生队队长，数月后又调至鄂西，辗转回到延安。

以上讲的情况是我所经历的一个侧面，只能是“管中窥豹”，仅供研究这段历史的同志参考。

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侯绍裘

胡 耐 秋

侯绍裘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早期上海和江浙地区很有影响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虽已牺牲了五十多年，但不少同志至今仍对他怀着深切的思念。

青年时代的革命活动

侯绍裘同志，字墨樵，江苏省松江县（现属上海市）人，生于一八九六年六月（农历四月二十三日）。他的父亲开设了一片人参店，还有一些田产。他七岁时父亲的人参店经营失败，家庭经济情况下降。他十岁时，父亲病故，店铺倒闭，经济破产。侯绍裘读完小学，于一九一三年考入松江江苏省立第三中学，他学习勤奋，品学兼优，特别在国文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中国的政局动荡，外有帝国主义环视，内有军阀纷争。到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侯绍裘同志正在中学读书，他的爱国思想被大大地激发起来。他立时奋笔写了一个传单稿，和少数几个同学凑钱把它印了出来。可是传单没有发出几张，被校长知道了。威吓他们说：“镇守使要捕捉发起人。”镇守使是军阀政府派驻在各省重要地区的官员。当时侯绍裘同志因年

轻没有革命经验，就把传单交给了校长。后来他自己回忆那时候的情形说：“我们吓慌了，就把传单统统交出，由他去销毁了。”绍裘同志的性情本来是很热情的，从此他变得沉默起来。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的性情不是冷静的，但在‘五四’以前一年内不知何故却过了一个非常冷静的时期。”

一九一八年暑假，绍裘同志进入上海南洋公学继续求学。南洋公学是交通大学的前身，是当时国内一所很有名气的工程学校。这个学校除教授数学、物理等一般理工学科外，有两个特点：一是尊孔，每逢孔子诞辰，全校师生要集合祭孔；二是重视古文，每年要举行学生们国文比赛。

一九一九年，北京学生掀起“五四”爱国运动并有一批学生被捕。这一消息尤如一声惊雷，侯绍裘同志闻后热血沸腾，情绪激动，他从宁静中重新活跃起来。他后来回忆说：“‘五四’——我想这一天，总可以算做我从冷静的状态中回复到热烈的一个起点吧！”

五月七日，他带队和同学们一起到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参加国民大会。接着由一批同学组成宣传队分别到市区热闹的地方去演讲。在运动中，侯绍裘同志显示出他的勇敢果断，有组织能力等特点。

一天，上海江苏省立第二师范的学生被警察殴伤，二师的学生于深夜两点多钟到南洋公学找侯绍裘要求支援，希望南洋的同学于第二天举行示威游行。侯绍裘一口答应了他们。二师的学生走后，他立即唤醒同一间寝室的同学连他一共六人，有的起草和油印传单，有的书写标语，有的制作旗子，紧张地干了小半夜。到了清晨进早餐的时候，诸事都已准备妥当。向全校同学一宣布，大家为二

师同学被殴感到气愤，又佩服侯绍裘等同学办事敏捷，很快地就组成队伍，精神抖擞地走上了街道游行去了。

从此，侯绍裘同志得到多数同学的信任。到了六月三日，上海工人、学生、工商界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六三”三罢运动的时候，侯绍裘同志被推选为全校学生的代表，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设立在上海）的职务。

南洋公学设有学生评议会，由各班级的学生推选评议员组成。评议会对学校的措施可提出批评和建议。侯绍裘同志被同班同学推选为评议员，参加全校学生评议会，接着又被选为评议会的评议长。在评议会中，他曾提出要求学校当局废止祭孔和国文比赛的建议，他认为这两件事和“五四”运动所倡导的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时代潮流是背道而驰的。但是，由于多数的评议员不赞成，侯绍裘同志撤销了这两项建议。以后这两件事情的最后结果究竟怎样呢？侯绍裘同志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后来国文大会时，我适有事未到，祭孔时就托故规避了。但是我离校以后，唐校长（唐蔚芝校长）决定辞职以前，这两事终于废止。”侯绍裘同志的这两项建议，是对当时的封建保守思想猛烈的冲击。

侯绍裘同志在青年时期，无论是同社会上还是同自己身上的旧思想、旧风习作斗争，都是果断而不肯妥协的。由于他具有这种对旧事物不妥协的精神，所以他能够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提倡新文化 宣传新思潮

一九一九年暑假，侯绍裘开始阅读《新青年》杂志。他说：“一

看之后，如同拨云见日，顿时爱不释手。”《新青年》解决了他思想上的两大问题：一是文学观念，二是道德观念。他原来很推崇清代“桐城派”文章的简洁严整，自己也喜欢作古劲的文章，认为白话文除了通俗而外没有别的价值。读了《新青年》中有关的论述文章，他才领悟到文字的形式是和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一定阶级的思想相关连的。文章一定要能够表达新的思想，并且要使得尽可能多的人能够理解，才能收到沟通思想的效果。在道德观念方面，他一向是赞成民主主义的，但是他不明白中国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和民主思想有什么冲突。读了《新青年》批判封建思想的文章，才知道要在中国传播民主思想，非彻底批判封建道德观念不可。

“五四”运动后期，他认识到，青年人要承担救国的责任，不能只是做一些罢课，演讲、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事情，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进行革命。这样，革命才能深入人心。

他还觉得救国和思想文化革命都要依靠集体，都要有组织才能广泛地进行。他约集了九个同学组织了一个“救国十人团”，共同学习和研究问题。现任上海市副市长赵祖康先生，是当时十人团的成员之一。后来有一人退出，十人团就改为九人书报推销处。

书报推销处设立在教室的走廊里。他们把上海当时出版的以及可以买到的宣传新思想的期刊书报陈列出来，任同学自选自购。他们推销的书刊有《新青年》、《建设杂志》、《新潮》、《太平洋杂志》、《星期评论》、《民国日报》等。他们自贴车费买来这些期刊书报。

有一次，侯绍裘同志在廉价书摊上买到一本波兰的名剧《夜未央》的中译本。他深为剧本中波兰革命者的思想、语言和地下革命活动的情节所吸引。他向同学们宣传：“此书不可不读！”他不但

如饥似渴地吸取革命思想，也深深地向往着革命的实际活动。

他阅读的进步的政治和文艺书籍越多，他的思想就越加开阔和活跃。他经常和同学们议论，有时争辩得很激烈。一九二二年他写了一篇长文，回忆“五四”运动时期他的思想转变，文章中有一段说：“议论愈变愈激烈，而社会主义思想或者也就在此时不知不觉地入了我的头脑之中。其实我在那时，意识上还并不曾明白什么叫做社会主义。这可以见得政府的压迫，资本家的专横和法律的不平等这类事实，实在是制造社会主义的原动力，无待所谓‘过激党’的宣传了。”

侯绍裘同志和他的一些同学，通过阅读进步书刊，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他们学会用新的思想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考虑如何挽救和改造落后的中国。

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

一九一九年“六三”上海工人大罢工和大游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工人阶级大规模的政治行动。侯绍裘同志从工人的这一行动中，看到了产业工人是一支声势浩大的群众队伍，工人中间潜藏着雄厚的革命力量。他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以后，为了配合行动，他同工商界人士和工厂职工都有一些接触。他认为“惟有劳工阶级在我那时的心目中，是真挚笃实，可与共事的。”他肯定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认识到知识分子应该和劳苦工人结合，而且他想到，要工人们能够持久而坚定地参加革命斗争，必须对他们宣传爱国思想，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他意识到这是时代所赋予知识分子的任务。如何履行这一责任，他和同学进行了尝试。

一九一九年暑假，侯绍裘同志和南洋公学同学赵景濂（十人团的成员）办了一份小报，名叫《劳动界》，从工人的角度谈国家和社会上的事情。先是灌输爱国思想，后来就着重地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这个小报每两天出一张，每期印一千份，寄给上海华界（当时上海有外国租界，华界就是中国政府统治的地区）南市从老西门到小东门一带的各家工厂和各个工团。暑假两个月共出版了三十期，暑假期满学校开学，这项工作才停止。

另一种尝试是办义务学校。这是从露天演讲发展起来的。

“五四”运动初期，南洋公学的学生组织演讲队分赴上海的热闹地区进行街头演讲，这是从五月大罢课就开始的。当时他们认为露天演讲虽然不是唯一的、但是确实是最简便而行之有效的对群众进行宣传的方法。暑假中一部分留校的同学仍然轮流出去演讲。侯绍裘观察到：听众不象开头那么热心听讲，甚至有人流露出厌烦的神情说：“不过是爱国救国，听他做甚！”就掉头走开了。他和同学们仔细琢磨，觉得演讲虽能刺激人的情绪，但只能收一时的效果，听多了就会厌烦。再因劳动人民文化低，常识缺乏，对所讲的内容感到没头没脑，自然就没有兴趣听了。他们就改变办法，固定地到离学校较近的法华乡和徐家汇镇两处地方，每天讲些常用知识，还有劝人识字，差不多成了一个露天学校，比较受群众的欢迎。

后来又进了一步，就在南洋公学办起了义务学校，专收徐家汇、土山湾、法华乡一带工厂的工人、商店的学徒和南洋公学的校工，每天讲解时事、常识，并教学文化。义务学校这种方式坚持的时间较长，一直到侯绍裘同志离开了南洋公学以后，义务学校还继续办了很久。

他们在办义务学校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办校的目的。侯绍裘同志曾在《南洋周刊》的《南洋义务学校特刊》上前后发表了几篇文章，他起初发表的文章中说：义务学校的目的，“自然是在宣传爱国思想和灌输国民常识。”后来他十分明确地主张：义务学校以培养“劳动运动之中坚人物为宗旨”，“务使该校学生一人能造就劳动界数十百人，为社会主义效力，以谋阶级地位之提高。”他不但肯定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而且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了。

全国解放后，侯绍裘同志最亲近的同学赵祖康先生，曾见到一个工人出身的干部，就是他们办义校时播下的革命种子。赵祖康先生回忆几十年前他们办义校的往事，想起绍裘当年的久远，他表现出抑制不住的兴奋。

经过“五四”运动，侯绍裘同志已经是一个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已经从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向无产阶级立场。他的这一转变，不但是通过理论学习，更重要的是通过革命实践和自觉的思想改造而实现的。他不再把工人看作仅仅是“可与共事的”朋友，而是把自己看作是工人阶级中间的一分子了。

一九二〇年的暑假，侯绍裘同志回到松江家乡，推动组织了暑期回籍学生会，发动抵制日货运动。这时，忽然接得南洋公学的通知，以“举动激烈，志不在学”八个字的评语指令他退学。他就这样被学校秘密地开除了。

他原就打算离开学校，专门致力革命，曾托过几个工会介绍他去杨树浦工厂工作，所以他对被秘密斥退，脱离南洋公学这所“高等学府”倒也并不在意。

可是，他托工会联系都没有得到合于理想的结果，去工厂做工

人工作的愿望因而未能实现。

对革命事业全力以赴

侯绍裘同志被南洋公学秘密开除之后，到了江苏宜兴县和桥镇彭城中学教书。一九二一年夏回到松江，正在组织一个暑期共学会，作为青年进修的团体。这时听说一所私立女子中学因经费困难，濒于停办。他设法邀请了地方上的几位热心人士，共同担负经费，帮助学校维持下来。由他和朱季恂先生二人担任校务委员会的专职委员，负责学校的兴革事宜。半年之后，原任校长离校，即由他担任校长，完全接办了这所学校。这就是松江景贤女子中学。侯绍裘同志接办景贤女中，不是为办教育而办教育，而是为了宣传新思想，培养新人才而办学校，是把学校当作革命活动的基地。首先学校的宗旨是造成学生的完全人格。除智育、德育外，同时注重体育和美育。除了正课外，也重视课外活动。学校明确宣布提倡女子解放、婚姻自由和改良家庭，主张废除束缚女子的旧风俗、旧习惯。还让学生推选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学校有什么兴革措施，都和学生商量，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打破了那种不尊重学生人格的死板的管教方法。经过改革，景贤女中成了一所政治民主空气非常活跃的新型学校。

一九二二年，景贤女中逐渐上了轨道，侯绍裘同志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又创办了一所私立松江中学。

一九二三年春季，朱季恂、侯绍裘二人创立了一个团体名叫“三五”社，宣传孙中山先生著述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与此同时，他们和松江的一些进步青年又筹办《松江评论》，也是八开报纸，五月一日创刊。先是出周刊，由于经费和人力不足，十一月起

改为月刊。因月刊时间过长，一九二四年四月起又改为旬刊，前后办了不到两年。

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五日，《松江评论》周刊第三期出版一期“五九”特刊。特刊上登载了侯绍裘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五九’纪念和五月中其他各纪念节之关系》，他主要的论点是：要洗雪五月九日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的国耻，应该同时纪念“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提倡“新文化和社会改造这两大方面的运动，便是中国国民觉醒的动机。这不但使中国腐败的政府见了不寒而栗，连国际侵略主义也瑟缩地抖将起来。打破国际侵略主义和国内军阀官僚政府的原动力就在于此了。”侯绍裘同志在一九二三年国内革命群众运动还没有普遍地大规模地兴起的时候，他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寄希望于人民的奋起，可见他在政治上具有远见卓识，并且对革命抱着必胜的信念。

一九二二年和二三年的夏天，侯绍裘同志都在京乡办了暑期演讲会，他用景贤女中校长的名义邀请了沈雁冰，邵力子、恽代英、杨贤江等人到松江演讲，很受听众欢迎。从这时起，他和恽代英同志就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就在一九二三年，侯绍裘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就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改为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领导上海和江苏、浙江两省党的工作，有人简称江浙区委，也有人简称上海区委。侯绍裘同志在工作上随时可以得到党组织的领导。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他是怎样参加中国国民党的。一九二二年八月，孙中山先生从广东来到上海，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剑

同志从北京前来上海，同中山先生恳切地商谈中国革命问题。九月，中山先生在上海召开了商讨改组国民党的会议，进行改组的准备工作。在一情况下，侯绍裘同志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两党合作。朱季恂先生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并受命筹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他回到松江，就和侯绍裘共同运用“三五社”这个组织，宣传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侯绍裘同志主持了国民党松江县党部的工作。五月，他协同朱季恂先生筹设临时省党部，就设在“三五社”内。七月将临时省党部迁到上海。从这时起，直到一九二五年八月省党部正式成立，柳亚子、朱季恂和他三人当选为常务委员，他大力抓了筹组江苏省所属市县党部的工作。他的视野已经不仅是一个松江县，也不仅是一个上海市，而是扩大到全省和全国了。

一九二三年的九、十月间，江苏、浙江两省的军阀发动内战，松江景贤女中曾迁来上海在宝山路宝通路找的一处校舍避难。战争平复后又迁回松江。上海的校舍保留，改为景贤女中上海分校。

一九二五年上半年，邓中夏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大学总务长。侯绍裘同志任上海大学附属中学主任。下半年，侯绍裘同志又被苏州乐益女子中学请去主持校务。乐益女中是苏州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张冀镛先生所创办。侯绍裘任校务主任，由他约请他的好友和同志张闻天同志任教务主任。不久，侯绍裘同志又兼任了张冀镛先生创办的另一所学校——平林中学的校务主任。

在侯绍裘、张闻天同志的指导下，乐益女中的学生去和苏州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职业女子中学，私立振华女子中学和景海、英华、惠灵三所教会女中的同学联系，成立了妇女联合会。

侯绍裘同志和张闻天同志联合苏州教育界的进步力量，推动苏州各界女中等学校先后改组了学生会，并成立了在进步力量影响下的苏州学生联合会。他们还推动成立了左派领导的国民党苏州市党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苏州支部。

以上提到的这几所学校，都是以办景贤女中的经验作为办校方针的，是以培养青年革命骨干为宗旨。侯绍裘同志不怕肩膀上的担子重，只考虑为发展革命事业而培养的人才越多越好。他主持过的学校，都有学生被吸收加入共产党，建立起党的组织。女作家葛琴就是苏州乐益女中的学生，在侯绍裘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现在上海、江苏、北京以及国内其他地方，都有侯绍裘同志的学生。如果以植树比喻培育人才的话，那么，绍裘同志可以称得起是一个不辞辛劳，尽心竭力，具有远见，卓有成效的植树人。

一九二五年，上海掀起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革命风暴。这时绍裘同志正担任上海大学附中主任。恽代英同志和他两人被党指派参加以罗亦农同志为首的指挥部，指导这次的运动。他担任上海学联的总指挥，同时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领导成员。为了推动反帝斗争，他日以继夜地工作。中国工人、学生和市民的反帝斗争的烈火，在上海熊熊地燃烧着，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先后点燃起来，使得帝国主义大为惶恐。他们大肆谩骂和攻击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指挥者，日本和英国国内的报上指摘侯绍裘同志是“过激党”领袖。

侯绍裘同志除了在学校这个阵地和革命斗争的前线注意培养锻炼青年而外，他还重视把一些青年骨干送到国内外的革命干部培训单位进行深造。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他实际主持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期间，从全省分批选送青年骨干去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妇女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学习。为培养有一定理论修养

的领导骨干，也曾分批选送干部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对于干部的培训当然是在党的统一领导和安排下进行的。但是，精心挑选，及时输送，这就和侯绍裘同志对这一工作的重视，以及他一心为革命多谋善断的思想作风分不开的。

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二届二次中央全会以后，朱季恂先生留在广州，柳亚子先生回家乡，侯绍裘同志在实际上成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同时也是共产党江苏省区的主要负责人。因为那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组织在工作上是秘密结合的，在省一级是这样，在市县一级也是这样。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更加表面化，江苏省党支部所经受的艰难以及反右派斗争的任务，更为加重，侯绍裘同志成为一位应付艰危的中心人物。可是他在反动势力非常猖狂的时刻，不但毫不示弱，而是把反右斗争的旗帜举得更高。

绍裘同志一向生活俭朴，甘受艰苦，敢于负责，勇于斗争。他对同志平易近情，热心待人，善于做团结说服工作。他通达乐观，遇到任何困难，从不愁眉苦脸，工作顺利的时候，也不形之于色，情况紧急，仍然稳若泰山。这种从容不迫的态度，感染了许多共同工作的同志。革命的乐观主义是绍裘同志对革命事业能全力以赴的精神支柱。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以江苏省党部为主的国民党左派在南京举行中山陵墓奠基礼。这一天，上海和沪宁铁路沿线不少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党员都到南京参加这一典礼。柳亚子、侯绍裘还有省党部的其他同志都去了。当时许多左派的国民党员，为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坚决执行三大政策，反对右派破坏革命统一战线，上午在陵墓基地举行群众大会，会后形成小规模

示威游行。下午到山上参加奠基礼，一群右派雇用的打手，追着要殴打柳亚子、侯绍裘等人。柳亚子先生被一些同志保护着转移到别处，侯绍裘同志挺身而出，对这些想要行凶的打手严词斥责，因而受到暴徒的狙击，头部受了重伤。

绍裘同志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还从不放掉学习。他为了能从日本进步书籍中研究社会科学，在上海南洋公子读书时，曾经利用空隙时间，去日本人在上海办的同文书院学习日文。

他还经常出入上海一些藏书较丰富的图书馆，因而也就有机会结识了一些革命同志。在上海松坡图书馆，他认识了张闻天同志，后来他们就成了革命的知心朋友。他在苏州乐益女中的时候，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或者晚饭以后，一定要到图书馆看报，或者看书，也看看同学们课外阅读的情况。

侯绍裘同志好学的精神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在努力革命实践的同时，必须是一个勤奋的学习者，有了真才实学，才能够肩负革命的重任。

勇敢战斗 浩气长存

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全国人心大震，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革命群众运动势如排山倒海。一时“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的歌声响彻云霄。

旧军阀的根基已经动摇，可是新军阀，大阴谋家蒋介石，正在勾结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想要砍杀革命势力，窃夺国家大权。

眼看一场狂暴险恶的大搏斗即将到来。这是进入一九二七年早春的国内形势。

侯绍裘同志面对这一形势，更加勇猛刚毅地向反动派进行战

斗。三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他率领左派国民党员和革命群众，从莫利哀路（今香山路）中山住宅到环龙路四十四号（今南昌路一八〇号）“西山会议派”设立的国民党伪中央党部进行声讨，声讨他们违反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声讨他们压制工农群众运动，声讨他们分裂国民党另立中央。通过这次行动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貌，教育和鼓舞了群众。侯绍裘同志被特务殴打，遍体伤痕，可是他还是强撑着前后奔走，指挥群众示威游行。他对反动势力勇于斗争，毫无惧色。他对前来慰问他的同志说：“革命一定有牺牲，受这一点伤不算一回事”。

侯绍裘同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就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进入一九二七年春季，他在中共中央特派前来上海领导工人起义的周恩来、赵世炎同志和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同志的领导下，对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多所谋划，他是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由七人组成的指挥部的成员之一，因为他熟悉上海的情况，做了许多具体的动员和组织工作。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战胜了直鲁军阀的反动军队，于三月二十六日解放了全上海。这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胜利，也是世界无产阶级武装起义史上的辉煌胜利。

在三月二十七日欢迎北伐军的群众大会上，侯绍裘同志对广西军阀白崇禧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龙华按兵不动，迟迟不进军上海市区，坐视工人纠察队流血牺牲，加以痛斥。

三月二十九日召开了市民代表大会，选举临时市政府，侯绍裘同志当选为临时市政府委员。这就说明，从“五卅”运动以来，他在上海人民中间是有一定的声望的。

比上海解放晚两天，即三月二十四日，南京被北伐军攻克。南

京的党、政、群工作，百事待举，全省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应当立即从上海迁移南京。一九二七年三月底，侯绍裘同志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的第一任书记，这时他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江苏省政府委员，责成他筹备江苏省政府。他于四月二日率领中共江苏省委其他委员和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同志，从上海火速到了南京。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南京安徽公学暂时设立办事处。绍裘同志立即着手筹组江苏省政府的工作。

四月八日，蒋介石从上海动身来到南京，他已准备好动手戕害革命。九日侯绍裘同志领导南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举行了一个名为欢迎实为声讨蒋介石的大会。当时南京的革命空气十分高涨，反动派惊恐万状，他们眼看，如果任凭革命形势发展，将对他们大大的不利。

同在九日这一天，左派领导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办事处和南京市党部被一群武装暴徒捣毁。十日，侯绍裘、刘重民等组织了三、四万工人群众到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请愿抗议。就在十日当天晚上，侯绍裘同志和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刘重民同志在玄武区，莲花桥居安里约集南京各方面革命组织的负责人秘密开会，南京市警察局长温建刚派侦缉队长亲自带领一班武装队员到居安里、将侯绍裘，刘重民同志和所有参加开会的人全部逮捕。因为这次逮捕是见不得天日的，在侯绍裘同志等被捕以后，有人打电话向南京警察局询问，警察局不承认有此一案。

后来知道，温建刚原来是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务处的副处长，也是三月二十三日在安徽省会安庆屠杀中共党员和工会干部几十人的主要刽子手。

大约是四月十五日的晚上，侯绍裘同志等人被捆绑强行按进麻

袋，然后用刺刀乱刺，血流满地，再用卡车装走。车开出南京市东南角的通济门，到离城一里多路的九龙桥，麻袋一个个地被抛入秦淮河中，沿河向西流入长江，被激流冲走。

侯绍裘同志等被残害是世界上所罕见！可是他们为革命而死，死得光荣！

侯绍裘同志殉难时才三十一岁，他们在“四一二”前两日被捕，后三日被害，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首批死难的革命烈士。柳亚子先生在《三哀诗》痛悼侯绍裘同志的一首中有“指天誓日语分明，功罪千秋有定评”的诗句。

国民党反动派不但残害了侯绍裘同志的躯体，连他生前所办的教育事业也横加摧残。松江景贤女中被蒋帮劫夺，改为松江女中，上海景贤女中分校被封闭。

但是，党和革命战友，还有知道他的人民群众是不会忘记他的，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来到南京，又从南京来到睽离十多年的上海，特地派人找到侯绍裘同志的夫人胡鸣鹤，代表周副主席向她和她们一家表示深切的慰问，并赠送了一些钱表示党对侯绍裘同志家属生活上的关照。

长江东流水，悠悠五十春，烈士的忠骨难以寻找，但是侯绍裘同志的浩然正气是永世长存的！

我见到的夏曦同志牺牲经过

饶 兴

(中央气象局顾问)

编者按：本刊第二期刊登袁福生同志撰写的《夏曦同志牺牲的经过》一文后，一些老同志陆续来稿谈到这一问题，现选登其中一篇。

夏曦同志一九二〇年十月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创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到苏联学习，搞过工运、学运和统一战线工作，到湘鄂根据地时，任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

我和夏曦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当时，我在红六军团五十一团任总支书记。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经过艰苦转战到达贵州，准备同红二军团（当时的番号是红三军）会师。红六军团的四十九、五十一团之一部，活动在黔东沿河地区。有一天在行军途中，突然遇到敌人的袭击。我所在的五十一团后卫营被敌人切断，经过一场激战，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和大部队失掉了联系。在找部队的途中，意外地遇上红二军团的收容队，我和四十九团总支书记李栓同志来到红二军团司令部。我们是六军团的团级干部，在红二军团很受优待，一直同夏曦同志住在一起，达半月之

久。

夏曦同志为人谦和，对我们六军团的同志十分关切，每当谈起六军团从湘赣到贵州的艰苦战斗历程，他都深深地表示钦佩。他尤为敬重任弼时同志，因他俩在上海工作时就认识，弼时同志有着卓越的才干。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六军团在黔东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夏曦同志高兴地对我说：“这是我参加党以来第二次伟大胜利。”二十六日在川黔交界的酋阳县南腰界开了会师大会，二军团并恢复了原番号。二、六军团八千英雄健儿经过英勇卓绝的斗争，终于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在湘鄂西根据地时，夏曦同志曾错误地执行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在肃反中搞了左倾扩大化，犯了严重错误。一九三五年三月，对他的批评基本结束。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来电对夏曦同志所犯错误提出了处理意见，随后夏曦同志下到六军团任政治部主任。那时，我在政治部当总务处长，和夏曦同志在一起，接触多了起来。当中央关于夏曦同志问题的指示在团以上干部中传达以后，我们都担心他会从此泄气，打不起精神来。但是，日子久了发现夏曦同志对于组织和群众的批评不仅能虚心、诚恳地接受，而且力求在实际行动中改正。在贵州时战斗异常频繁，部队伤员很多。如何妥善安置伤员是一个十分繁重的任务。夏曦同志找到我，让我到卫生部当政委，帮助戴正华部长解决伤员安置问题。谈话中，他提到了湘鄂西肃反问题，沉痛地对我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既有负于党，又有负于人民。这次你去卫生部，一定要解决好伤员问题。受伤的同志都是有功之人，你不能再让我有负于伤员啊！”听了这番话，我很受感动，当即表示，一定好好完

成任务。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部队攻占了毕节城。在此休整了十来天之后，国民党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郭汝栋等部共七个师一个旅，气势汹汹地向毕节逼进。由于敌众我寡，军团部决定撤出毕节。那时我已回到了政治部总务处。撤退前一天，夏曦同志忧虑地对我说：“前几天敌工部李部长到土匪部队席大明部做争取工作，至今没有回来。部队撤退的时间，李部长是知道的，不知出了什么问题。万一部队转移后，李部长再回毕节就麻烦了。”我见他忧心忡忡，就劝他别着急，李部长会回来的。

第二天拂晓前，部队开始撤离毕节。夏曦同志又来到总务处，对我说：“李部长还没有回来，我们到前边去等他吧。”他向军团部王震同志打了招呼，嘱咐我带一个警卫连同他一起前往。我马上集合了部队，向土匪盘踞的野马川、七星关地区进发。

天还没有亮。部队借助启明星摸索前进，周围的树木、山峦黑乎乎一片。走了大约十来里路，天已大亮。我们登上一座山顶，向下俯瞰，只见一条河横在面前。悬崖峭壁一直延伸到河边，覆盖了河面的一部分，河水从山岩下流过，形成一个旋涡。从崖顶到河边只有一条陡峭的小路，上下都很困难。河的对面，是缓坡的山地，山坡上是一片稀疏的耕田。我对夏曦同志说：“前边就是土匪活动地区，这里是李部长回来的必经之路，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吧！”。夏曦同志同意了。

我让警卫连布置警戒，注意河对面的小路。

我们一直等了几小时，大约到了中午十一点钟，李部长还未回来。夏曦同志更着急了，他问我：“现在还不回来，是不是被土匪扣了？”我说：“不会吧。红军在这里声势很大，他们不会不考虑后

果，未必敢扣李部长。”夏曦同志说：“这次派李部长去，是我考虑不周，急于求成，又犯了左的错误。我不应该一开始就派这样重要的干部去。要是出了事，我真该除（湖南土语：“该死”之意）！悔之晚矣！”说着，便要过河去看。我连忙说：“这样过去不行！对面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了解，贸然过河要有危险的。”我抬头看看太阳已升到头顶，就提议先作点饭吃。离山顶不远，有一家小客店。我们拿了些米到小客店去请店东老太太给夏曦同志做饭。

饭后，大约又过了一点来钟，李部长依然没有消息，夏曦同志焦急万分，非要亲自过河去看看不可。我马上到山顶加强警戒。回来时，夏曦同志已带着一个警卫员和两名战士顺着小路下了山，正在徒涉过河。

这条河河水很急，大约齐腰深。他们趟了二十来米，突然对面山坡上出现了两个农民装束的人，向河边走来。警卫员一见，立刻高声喝问：“干什么的？站住！”两个人也不答话，仍径直朝前走。一个警卫员拔枪“呼呼”放了两发子弹示警，另一个警卫员随后同夏曦同志往回蹙。

贵州的三月，阴雨连绵，天气乍暖还寒，夏曦同志身上还穿着一件皮大衣。连日来由于紧张的工作，使他很少休息，身体疲惫已极，在河里走起来摇摇晃晃。蓦地一股急流冲来，一下把夏曦同志和警卫员都冲倒了，他们两人都不会游泳，很快被急流卷进了漩涡。

我在山顶听到枪响，以为有了敌情，立刻赶下山来。来到河边，早已不见了夏曦同志的身影，在山岩下，只见河水冲激着，旋转着，发出一片哗哗的响声。从山岩朝里看，山岩和水面之间只有窄窄的一条缝隙，黑压压的什么也看不见。战士们想下水进去，无

奈水流很急难以进去，随后，找来一条小船，因为山岩和水面之间的缝隙太小，也进不去。我们围着那里转了足有几个小时。这时，李部长突然回来了。他为了争取席大明的土匪部队，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政策，因而耽搁了很长时间。黄昏，在旋涡下游不远，我们终于看到了夏曦同志和警卫员的尸体。夏曦同志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我们先把警卫员的遗体掩埋在河边的山坡前，接着将夏曦同志的遗体放到他平日骑的牲口上，怀着沉痛的心情立刻追赶部队。

走了一夜，第二天凌晨在云贵交界处赶上了军团部。王震、肖克同志听到噩耗，悲痛难禁。随即集合部队，给夏曦同志举行了追悼会。

记得追悼会是在一个山坡上举行的。远处响着敌军的炮声。没有祭台，只有六军团部分英雄战士，持枪站在夏曦同志的遗体前面。指战员们的脸上呈现着悲痛的表情。在一片悲壮、肃穆的气氛中，王震同志开始讲话。王震和肖克同志虽然同夏曦同志相处时间不长，但是他们认为夏曦同志对党忠诚，有能力，有水平，十分尊重他。王震同志曾对我说：“饶兴呀，夏曦同志年纪大了，你们要劝他注意休息，生活上要多照顾他。”王震同志在讲话中回顾了夏曦同志的革命历程，追述了他对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功绩，肯定了他在六军团所做出的成绩。这时敌军的炮声越来越近，王震同志指着远处愤怒地问大家：“同志们，敌人又要上来了，我们怎么办？”指战员们举枪高呼：“同敌人血战到底”！“为夏曦同志报仇！”呼喊声震撼着附近的群山。

我们把夏曦同志的遗体安葬在山边，附近有一座石桥。

（彭家栋整理）

阴谋与斗争

郑亦胜

(原宁夏军区副政委)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了达到其投蒋反共的罪恶目的，将我党在新疆的全部人员（包括我党派驻新疆的工作人员、学习航空的人员、从苏联归国的人员以及在新疆养病的人员）拘禁，并捏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本文主要记述了盛世才在拘禁我人员中所采取的卑鄙手段，和我党同志所作的坚决斗争。

——编者

急电回迪

一九四二年，是我党和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六个年头。由于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占领了苏联西部的大片领土，盛世才看到这种形势的急剧变化，对苏联抗德失去了胜利信心，于是背信弃义，卖身投靠了蒋介石。从一九四二年六月开始，他先后用急电把我党根据协议派到新疆外地工作的同志调回迪

化（即今乌鲁木齐市），把他们和在迪化的同志一起秘密软禁起来。

那时，我在叶城县财政局当局长。叶城是于阗、和阗通往北疆中途必经之路。我们一些在于阗、和阗各区工作的同志，调回迪化路经叶城，都在我这里过夜。我们在秘密交谈时，大家都认为盛世才是墙头上的草，见风就倒，靠不住。他把我们的人调回迪化，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盛世才背弃协议，玩弄阴谋诡计，想把我们这些共产党人一网打尽，作为他投靠蒋介石的“进见礼”；二是可能形势发生了变化，盛世才要留条后路，暗暗地把我们送出新疆。由于当时八路军新疆办事处党的代表团从抗日大局出发，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避免引起盛世才对我们的怀疑，很少同我们在下面工作的同志联系。因此，我们无法得到可靠消息，接电后，一个个回到迪化，先后落入盛世才设下的圈套。

每个路过叶城的同志，我都叮咛他，到迪化后，见到徐先生（即当时代表团负责人陈潭秋同志，他在新疆化名徐杰），他有何指示，一定给我写封信来，把情况告诉我。并且约定了暗号，如果形势不妙，情况恶化，信上就写：“路上偶感风寒，住进医院”。如果盛世才已经逮捕了我们的同志，信上就写：“这里多数人都患了病，是危险的传染病”。他们回答说：“你安心等着，我找到徐先生弄清情况后，一定立即给你来信。”

谁知，一个个同志回去后，均如石沉大海，音信全无。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变化呢？我深深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

正当我思索、忧虑、心神不定的时候，八月底，突然接到盛世才的一封紧急电报，命我“立即回迪，另有任用！”

接到这封电报，我心里反复盘算开了，去，还是不去？去，很

可能凶多吉少，如果盛世才玩弄阴谋诡计，设下圈套，我岂不是自投罗网，正中奸计？要是不去，违抗盛世才的命令，岂不是会使他找到借口，给党惹麻烦。

过了没几天，盛世才又接连发来两封急电催促。我经过再三考虑，觉得还是到迪化去，找到党组织，探明情况，再做处置。于是，我匆匆交接完工作，动身赶往迪化

寻找组织

汽车到达迪化。下车时，来了两个警察，不怀好意地上下仔细打量了我一番，声言要检查行李。他们当场打开我带的两个行李箱，把里面的东西全翻了个遍。箱子里除了我的衣服，再就是几本书。他们空忙了一阵子，未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这才放我走了。当时，我并没有料到，我一到迪化，盛世才已经派人盯上我了。

为了预防万一，下车后我没有直接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也未去财政厅，而是雇了一辆马车，把我和行李拉到离车站不远的一家“骡马大店”（旅馆），要了一个单人房间，住了下来。

我在“骡马大店”匆匆吃过晚饭，顾不得旅途疲劳，来到南梁八路军办事处驻地，急于想找到党的组织，找到我们的同志，把情况摸清楚。

南梁是一个偏僻的小山坡。我来到办事处的房子前面，黑黝黝的大门上挂着铁锁，几幢房子里都黑古隆冬，没有灯光，没有声音，周围也没发现一个人影，他们都到那里去了呢？我又急步来到羊毛湖徐先生住的地方，这里也和南梁一样冷清。

从羊毛湖出来，我又找到原来在财政厅工作时和我很要好的一个同事家里，向他打听厅长周彬（即毛泽民同志）的情况，这个同

事说：“七月里报纸上说周厅长是去养病，也不知到那里去了。盛世才怕是没安好心肠，你可要当心呵！”

我悻悻回到“骡马大店”心绪焦急，怎么也难以平静。预感到，同志们可能被盛世才秘密关押起来了，也可能回到了延安，要是回了延安，那多好啊！

我正想着，忽然店老板敲门进来说：“外面有两位先生要见你，说是盛督办派来的。”我顿时警惕起来，说：“让他们进来。”不一会，店老板领进两个人来，我一眼认出其中一个是盛世才的副官。那副官见了我，满脸堆下笑来，说：“这不是郑局长吗？”他假惺惺跟我寒暄了一阵后，收敛了笑容，装做一本正经的样子说：“郑局长，你回来了怎么也不跟督办报个到？一个局长，住在这肮脏的，骡马大店里，你就不嫌寒酸？害得我们到处找你。走吧，盛督办要亲自接见你，让我派车接你来了。”

我整理了一下东西，副官旁边站着的那位随从给我搬着箱子走出来。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上车后，车子往督办公署开去。

来到督办公署，副官把我领到副官处，说：“你先坐一下，我向督办报告去。”不一会，他就回来了，装做十分抱歉的样子说：“哎呀，实在对不起，督办刚刚在召集一个会议，脱不了身。他说你刚回来，一路乘车辛苦，先安排下来，休息两天。工作嘛，先不忙着谈。”他又说刚才已打电话给我安排好了，让我住到三角地的一个招待所里，这个招待所即现在的林基路招待所。

在招待所

我在这位副官和一名随从的“护送”下，乘汽车来到林基路招待所。

这是一栋旧式的四合院，两层楼房，周围五米多的高墙，门口安着大铁门，有岗楼，有一个武装警察日夜站岗。

我下了汽车，进到屋子里，一眼看到我们有二十多位同志都在这里。他们见到我，顿时围上前来问这问那，那一番亲热劲使我一下子感到无限温暖，几天来的忧虑、疲劳、孤独感全都不翼而飞了。我忍不住问：“怎么你们都在这里，是不是盛世才要把我们集中起来送回延安？”我一问，大家都不做声了，一个个脸上露出十分气愤的神情。原蒲犁县边防司令胡东说：“老郑，你还蒙在鼓里，盛世才这只老狐狸把我们软禁起来了。”接着，他们就告诉我，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都被秘密软禁起来了。盛世才已经撕破了脸皮，投靠了蒋介石，把我们这些人关在这里，成了他的阶下囚，不准出大门，不准往外面写信，不准接见任何人，吃饭睡觉都在这里。我一听，这才恍然大悟，以前猜测完全被眼前的现实证实，我惊异地说：“原来盛世才玩弄了一个恶毒的阴谋，设下了圈套，他真坏的透顶了。”同志们说：盛世才已经现了原形，我们要和他作坚决斗争。

在林基路招待所，我们秘密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党代表陈潭秋指定林基路同志担任的。委员有高登榜、王模。党代表还指示说：“盛世才是个小军阀，是个又狠又蠢的狼种猪（其狠如狼，其笨如猪），他把我们关起来，说明他已经成了我们的敌人，不是统战的朋友了，我们要坚决和他作斗争。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党派到新疆来的八路军战士，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斗争到底，决不能妥协。要相信我们党的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要揭穿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当时，临时党支部作出了决定，盛世才要是把我们关进监狱，

那么，今天晚上关进去，明天早上我们就要绝食，要向他们提抗议，写抗议书，要盛世才把我们全部宣布无罪释放，送我们回延安。

临时党支部的决议，迅速秘密传达到每个党员，同志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决心和盛世才斗争到底！

入 狱 斗 争

我们在林基路招待所被软禁了八个多月。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晚上，门口突然来了四辆小卧车，盛世才的副官跟来了。他站在门口干咳两声，用阴阳怪气的腔调说：“诸位先生，嘿嘿，列位长官，今晚盛督办要接见大家，请大家当面叙谈，兄弟奉督办之命，特来迎候。”他说：“请诸位穿好衣服，带好手套，每两人分乘一辆汽车去见督办。”接着，大家上车，送走一趟，再拉一趟，往返几次，把我们招待所的人全部拉走了。

我和胡东是第二车拉走的。汽车不走市区大道，而是拐弯抹角地走一条偏僻的土路，一直把我们拉到新疆第四监狱（即两湖会馆后面）。一下车，立即上来两名警察，把我俩强行架到一间房子里，衣服口袋全部进行搜查。我们严厉地提出抗议，愤怒呼喊说：“我们要跟盛世才打电话，他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些抗日有功，建设新疆有功的人关起来，我们坚决抗议这种非法行为！”一位警官模样的人连忙说：“两位先生别生气，兄弟奉命把你们接到这里来，不是要关你们，而是因为近日迪化国民党兵增多，多有不便，怕你们不安全，这才把你们接到此处，完全是为了保护你们。”我俩更加生气，拍着桌子大声吼道：“好一个‘保护’，关进监狱‘保护’起来了，亏你们说得出口！我们不需要你们‘保护’，赶快把

我们释放！”那位警官冷冷地说：“兄弟是例行公事，还望两位多加包涵。”

搜查后，我们的手表和身上带的钞票、钢笔、纸张、衣服扣子、皮带等物品都被拿走了，然后把我俩分别强拉出去，关进了牢房。我那间牢房里关的有蒲犁县县长许亮、和闐区骑兵大队长谭桂彪、和闐区军需处长谷先南等四个同志。

当天晚上，在黑暗寒冷的牢房里，我们四个人根据临时党支部的决议，成立了党小组，由许亮担任小组长，并召开了第一次小组会，决定从明天早上起，开始进行绝食斗争，并口头向盛世才提抗议。

第二天天刚亮，看守送来了早饭，我们谁也没吃，大声对看守说：“快让盛世才来见我们，他要无条件把我们释放！”

看守把我们的话带给监狱长。下午，盛世才派了两个代表来跟我们谈话。他们竭力装做很温和的样子说：“你们还是要吃饭，当心饿坏了身体，有事可以商量。”我们坚定地表示说：“盛世才要是不答应把我们放出去，我们就绝食到底，决不妥协！”代表顿时板起面孔，威胁道：“你们再继续这样下去，可要当心后果！”我们愤怒地揭露他们说：“是你们逼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一切严重后果都要由你们来负！当初，盛世才和我们谈判，同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六条协议……，我们共产党人严守协议，竭尽心力抗日救国，建设新疆，没有一点对不起盛世才的事。如今，你们把朋友关进监狱，破坏抗战救国、建设新疆，只能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有利。你们犯了大罪，人民不会饶恕你们的！”

当时，第四监狱除关押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外，还关押着一大批新疆的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和反对盛世才统治的人。他们都趴在牢

房窗口，仔细听我们的慷慨陈词。这时，他们都纷纷为我们鸣不平 and 耽心我们受害。同时，他们也骂盛世才是杀人的刽子手、丧心病狂地谋害无辜好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群情愤怒之下，两位代表见势不妙，害怕再闹下去难以收场，只好软下来说：“你们的意见我们一定向督办报告，多有得罪了。”说完，就灰溜溜地回去了。

我们这次绝食斗争，共进行了三天。第三天傍晚，盛世才不得不派人来答应了我们提出的条件，说等形势稳定后，到内地的公路恢复了交通，立即送我们回延安；同时，允许我们在监狱里看马列的书和看报，生活上决不虐待，每餐四菜一汤，有了病给予治疗。这是我们在新疆监狱第一次绝食斗争所取得的胜利！

但是，盛世才答应我们的话是决不会轻易兑现的，他那奸险毒辣的罪恶阴谋至此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过了不久，他就捏造了“四·一二阴谋暴动案”的罪名，强行扣在我们头上，对我们进行了更加残酷的迫害……

（李世欣 贾铁铮整理）

前仆后继十六年 ——忆贵州地下党

秦天真

开头的话：贵州地下党自一九三四年初创建起，经历了十六年的艰苦斗争，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的领导下，坚持白区工作的方针、路线和任务，为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长期以来，对贵州地下党及其武装组织，要么不承认，要么强加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土匪武装”等等罪名，进行恶毒地诽谤。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贵州地下党的历史终于恢复它的真实面目了。

二十年代末，贵州仍为旧军阀盘踞，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有志革命的一些先驱，早年先后出省活动。周西城主黔，虽搞了点建设，但目的在于对付各派军阀，加强统治。周西城在军阀混战中败死后，毛光翔继起掌权，鉴于周西城专横暴戾，禁锢思想，乃失败原因之一，而稍微放松了些。这样，新思想才得以有所传播，新友、协同、东业书店相继开设，被周西城查封的达德学校，中华书局得以恢复，早年出省参加革命的同志这时寄来和带回的进步书刊

较多。大革命失败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血腥的大屠杀，在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中引起震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在追求进步的人们中间，产生了反响。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的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掀起了抗日反蒋的怒潮。它冲破万山屏隔，唤醒了还在军阀统治下的贵州人民。

在省会贵阳，我和一批爱国青年学生发起组织“学生抗日救国团”，上街游行、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主办发行《救国旬刊》（由贵阳高中学生丁树奇主编），广泛宣传抗日反蒋，揭露蒋介石的卖国投降阴谋，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口号。影响逐渐扩大，许多爱国教师、店员、职员、手工业工人，同青年学生一起，卷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省内各城镇的抗日民众运动也相继兴起。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威，震慑了贵州的反动统治者。他们力图通过破坏学生运动，扑灭燃烧起来的民众抗日怒火，受命于他们的少数学生，出面宣传蒋介石那套“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卖国政策，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性质，否认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他们打击的矛头主要指向《救国旬刊》。但是，邪不胜正，他们的反宣传活动，遭到爱国师生的痛击。教育界著名教师田君亮、刘方岳、朱穆伯、李叔元等痛感民族危亡，奔走声援抗日救亡运动，在他们的影响下，学生内部的阵线更加清楚，那一小批宣传国民党反动谬论的小丑陷入非常孤立的地位。

一九三二年，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商界人士中顺应协力的也不少。贵阳有两家商号，自恃与军警素有勾结，隐匿日货，抗拒验查，竟出手殴打学生，激起群众的愤

怒。我们组织群众集队游行，冲入商号，捣毁店铺，随即包围省府，要求当局惩治奸商，查办军警。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慑于群众的抗日声威，被迫出面公开道歉，立即下令没收奸商资产，撤职查办宪兵营长。

一九三三年，伪教育厅宣布贵阳各学校举行会考，企图转移学生的注意力，破坏抗日救亡运动。我们又发动和组织了反会考斗争，质问教育厅长，揭露会考阴谋，又一次迫使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宣布取消了会考。

抗日救亡运动在贵州日益深入。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书刊、文艺作品在进步青年中秘密地广泛流传，争相阅读，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的胜利，在一些进步人士中普遍传颂。革命理论同革命群众运动的结合，为贵州地下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九三三年初，我离贵阳赴黔东北、湘西一带寻找红军，途中受阻，返经贵阳去家乡毕节活动。毕节是贵州西北一个县城，与川、滇两省接壤，地处所谓“一步踏三省”的边界。地方军阀连年混战，相互削弱，客观上有利于革命活动的开展。“九一八”事变后，这里的民众抗日活动日渐发展。我利用在毕节中学任教的有利条件，进一步组织爱国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在进步师生中，组织关于十月革命和苏联文学的秘密讨论研究，逐渐形成了民众运动的中坚力量。同年秋冬之交，早期被迫离乡，辗转重庆、上海等地，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林青和缪正元，一起返回毕节。他们很快就同我联系，投入这里蓬勃兴起的抗日民众运动。林青、缪正元的到来，是贵州建党的直接条件。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毕节由林青介绍我入党，并和缪正元组成

了贵州地下党的第一个支部——毕节党支部。在这个支部的领导下，以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徐健生、宁起坤、宁起加、熊蘧竹、王树艺、孙师武等为骨干，成立了草原艺术研究社。通过文艺研究、演剧、歌咏、绘画等活动方式，在进步青年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发动群众，推动抗日民众运动的发展。草原艺术研究社这种公开的群众组织，培养了党的骨干分子，发展了进步力量，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时，我们还积极开展武装工作。当地有一个脱离军阀部队的连长范建章，为人爽直，看不惯军阀统治，以“上等之人挣我钱，中等之人莫照闲，下等之人跟我去，每人每月块半钱”为动员口号，聚集力量，在黔西、大定、毕节一带活动，很得这一带劳动人民的好评。我同他接触后，向他宣传革命道理，他欣然赞同，表示愿意一道革命。后来，毕节党支部通过范建章在靠近云南镇雄地区一带秘密开展武装工作。当地的军阀、土豪劣绅十分惊恐。不久，当地发生驻军军官调戏一女学生，学校反将被调戏的学生开除，以致逼死人命的事件，激起公愤。毕节党支部组织力量，抗议交涉，发动了广泛的社会声援，揭露了反动当局的可耻行径。反动当局恼羞成怒，妄图以镇压手段平息民怨，并趁机打击进步力量，破坏抗日民众运动。我们获悉反动当局的镇压计划，为保存力量，隐蔽精干，党支部的三个党员和三个进步青年立即转移，草原艺术研究社停止公开聚会，转入分散活动。这次事件后，出现的表面上的暂时平静，却促成了党的组织在各地的相继建立和发展。

一九三四年七月，我和林青等从毕节辗转到了安顺，同早在这里组织抗日民众运动的谢速航、陈汉民等取得联系。以后，又到贵

阳把原来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已建立的进步关系高言志等组织起来。八、九两月，先后发展徐健生、李策、孟昭仁等入党。随后又在贵阳一中、高中、女师、达德等校开展建党工作，相继建立了党的支部。同时，党所领导的在群众中具有秘密性质的读书会、文学艺术研究社、社会科学研究社等组织也很快建立起来。这时共产党员邓止戈、黄大陆由四川来黔活动，同贵州地下党的支部取得了联系。一些有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进步人士如尹素坚、刘方岳、严金秋等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都有较大发展的情况下，为防止暴露党的组织和力量，一九三四年九月，在贵阳由林青、秦天真、缪正元和邓止戈商定吸收高言志、王石安、肖世铤等人开会，分析贵州形势和部署工作。这一时期，党的工作重点是继续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抗日民众运动，同时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稳慎发展党的组织。许多同志被派到各地工作。

同年十一月，刘梦隆同志（即刘雪苇）由上海返黔活动，我同他交谈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贵州的革命形势，整顿党的外围组织的意见。这时，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由于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均归失败，正集中一切力量准备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无力他顾于贵州。及至十月，中央红军主力退出江西苏区，长征西进以后，贵州军阀又忙于应付蒋介石推出地方军阀部队正面拦堵红军以保存其嫡系力量的诡计，使我们争取了一段有利时机，发展了革命的力量。

二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在攻克黎平，进入贵州，连夺剑河、镇远、余庆、黄平、瓮安等县，强渡乌江天险之后，占领了黔北重

镇遵义。林青同志在遵义同中央取得联系，向中央负责地方工作的领导同志罗迈（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经中央批准，建立了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确定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组成，林青任书记。

遵义在一九三四年，即有由四川梁山来的地下党员周司和与由成都回遵义的地下党员周守如在省立三中、女中和社会上活动，组成了反日反帝大同盟，参加的有李小侠、何恩余、谢树中、罗红等。红军长征到遵义，即改名为红军之友社。红军离开遵义时，红军之友社的许多成员参加了红军，红军由云南扎西回师贵州，二渡赤水，大战娄山关，再占遵义后，红军派政委王友发、队长周凤山率领数十名红军干部和战士，会同原红军之友社参军的部分人员，组成黔北游击队，转战遵义、湄潭、绥阳一带，几经苦战，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政委王友发和一些同志先后在战斗中牺牲，有的如谢树中等突围后，与杨天源、陈光型等开辟遵义、湄潭一带党的工作。

毛泽东同志在红军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在贵州迂回转战，足迹遍于二十余县，影响深入人心。这正是贵州省工委建立以后，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壮大进步力量的极为深厚的基础。此间，我代表省工委赴安顺召集主办进步刊物《晓鸡声》的骨干和三一读书会的一部分成员，举办训练班，主要讨论形势，学习革命理论，建立革命群众组织，发展党的组织，确定谢速航为安顺县工委书记，尤树黔为组织委员，陈汉民为宣传委员，同时积极进行武装工作。红军入黔之前，安顺驻军是军阀尤国才部队。红军离黔后，尤部被国民党改编，辖二个师。其中一〇三师参谋长是我党

党员黄大陆。通过他，派进邓止戈任参谋，缪正元、邹凤逸和王树艺到师部电台工作；另外，又派丁沛生打入一二一师任警卫连长。此后，我同安顺县工委通过丁沛生组织了一二一师二个排的哗变起义，拖出人枪到郎岱、盘县一带山区，以中共黔西第七支队名义游击。又利用一二一师与国民党中央嫡系李觉部队火并的时机，挤走李觉，使安顺仍由一二一师驻防，造成客观上对党的活动较为有利的形势。两军火并情况和我党的工作，曾由谢速航写了报道，发表于巴黎由党所主办的《救国时报》和上海《少共真理报》。短短期间，贵阳、安顺等县建立了县委，黔西、大方、毕节、织金、赤水、桐梓、仁怀、惠水、贵定、都匀、独山、镇远、凯里、德江、思南等十余县，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小组；在军事工作方面的关系由省工委单线领导，掌握了一些民间武装，在地方部队中的工作也有了一定基础。

革命的力量在发展壮大，反革命势力也加紧伸入贵州。在红军离黔入滇，挥戈北上以后，蒋介石实现了他的挤垮、兼并贵州地方军阀实力的计划，把魔掌直接伸入贵州，建立了法西斯特务统治。中统在贵州的头子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收罗反动学生伪装进步，混入群众活动之中，充当其耳目，破坏抗日反蒋运动，打击进步力量。当时，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中，对红军离黔以后反革命势力向人民的反扑估计不足，大规模的群众活动仍在发展。一九三五年五月，在贵阳发动组织纪念“五四”、“五卅”的活动，就引起了敌特机关的注意。接着林青同志的化名通信又被邮检截获，查明了他的笔迹。敌人感到了贵州的革命力量给予他们的威胁，便步步围逼，形势日趋紧张，白色恐怖气氛日愈严重。省工委审势采取措施，布置隐蔽转移，并在党内进行应付突然事变和坚持革命气节的

教育。

但是，敌人也加紧行动。同年七月十九日上午，特务闯入刘梦隆的住所，当即拘捕了他和同住于此的李忠良、郑成思两人，并就地埋伏守捕。不久，党员李策前往，被羁盘问，他机智地利用党曾派他接触过一些反动学生头目，见过一些特务，对其内部人事关系有所了解的有利条件，佯称是中统特务头子派他来此找人的，从容应付，不露破绽，才摆脱危难。在判明没有特务尾随之后，他急速赶到省工委机关（贵阳忠烈街八号），向我汇报告警。我们除立即转移外，并派两位同志赶到出事地点附近的街口，隐匿警戒，防止我们的同志再入罗网。天黑时，被派去警戒的两位同志，见无人再来，一位自行撤回，一位失去警惕，意欲探察虚实，进入出事地点而被捕。林青同志随后由郊外回城，不知情危，径直而往，我们的警戒既失，他亦遭逮捕。这次事件中有七个党员、四个群众被捕。林青等同志在狱中，遭敌特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维护党组织和同志的安全，坚持革命气节，同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被判死刑。被派看守林青和刘梦隆同志的董亮清，曾于一九二九年底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在上海参加过工人运动。运动失败后他流离到社会上，后被迫到伪中央财政部税警团当税警。之后，随该团来贵阳，看守监狱。当他得知林、刘被捕原因后，便暗中与他们商议越狱。及至行动之日，因按狱规看守每次只能押送一人上厕所，林青同志决定刘梦隆同志利用这种机会，随董潜逃。刘、董脱险以后，林青见无动静，也破壁翻墙而出，因刑伤过重，摔倒被拘回。省工委在刘梦隆脱险后，决定他迅即取道广西梧州，再转赴上海。同时按董亮清的要求，资助他回山东。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国民党反动派在贵阳公开杀害林青同志。敌人

惧怕他赴刑途中宣传革命，揭露黑暗，竟用短刀横勒其口。林青同志含刀沿途艰难地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刀口由唇角两侧切入面颊，血流满身，犹呼喊不绝，直至英勇就义。沿街目睹的人，暗叹不已。这是反动派在贵州第一次公开杀害共产党员。而林青同志视死如归，忠贞不屈的英雄气概，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七一九”事件造成了林青同志遇难，贵州革命形势暂时出现低潮。

三

从一九三五年“七一九”事件发生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日民族救亡运动爆发，贵州地下党实行隐蔽精干，分散活动，重点转向农村，在边界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军事工作。

一九三五年八月，省工委决定邓止戈到毕节组织武装。我先去盘县、郎岱整顿丁沛生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后赴上海找党汇报。贵阳等地分散隐蔽的党员，我们通过孙师武、高昌华等在广西梧州大学建立的联络点转由徐健生负责联系。遵义、安顺等地基础较好，继续深入农村工作，发展党的组织。黔东南由李光庭在凯里、雷山一带建立了武装力量。同年十二月，徐健生到毕节与邓止戈向当时在毕节的红二方面军领导同志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情况。就地发起贵州组织抗日救国军，推举当地爱国进步知名人士周素园担任司令，率部参加长征。邓止戈随军北上，徐健生仍留贵州坚持地方工作。一九三六年四月，我从上海返回梧州联络点，与由贵阳赶到那里的徐健生相会，交谈了情况，先后返回贵州，五月我先回到都匀，给高言志等布置工作，六月在黔桂边界通过原来建立的社会关系毛景周、龚泽霖等，争取了活动在这一带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的领导权。贵州

抗日救国军总司令是穆守先，毛景周是纵队司令，我（化名余汉生）是政治主任，王石安是秘书主任。经过我和王石安的工作，使这支队伍确定了反蒋、抗日救国的方向，成为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

“西安事变”发生，我们派人去广州了解国内政治形势，与华南党取得联系。根据党的指示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停止“抗日反蒋”的口号，在群众中进行“逼蒋抗日”的宣传教育。一九三七年六月，我再次由黔桂边界取道梧州、香港转赴上海，在那里碰上贵州在上海的一批进步青年。我与刘雪苇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抗日主张，并动员他们回黔开展工作。不久，“七七”事变发生，“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了。我即由上海去西安，在西安办事处向博古（秦邦宪）同志作了汇报，经他决定转送我到了延安，向中央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

一九三七年九月，蒋介石被迫宣布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团结救国的必要。于是，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由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日的路线，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党的工作仍然处于复杂艰苦的环境。一九三八年二月，中央决定派我和邓止戈回贵州工作。临行，李富春同志指出贵州进步力量比较薄弱，工作还有不少困难。但抗日形势是会影响贵州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形成的情况下，应放手发动群众，改变过去用读书会、文研、社研等组织群众的办法，要利用各种公开的社会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民众运动。同时还指出贵州是后方，与敌后情况不同，不要在蒋管区搞武装游击活动。贵州省工委由我们和先期从延安返回贵阳的黄大陆和原在贵阳的李策同志组成。

同年二月，当我和邓止戈回到贵阳时，黄大陆、李策、严金

声、王斌等四人已被国民党贵州绥靖公署诬为“托匪汉奸”加以逮捕，并妄图在此罪名下杀害他们，即贵阳的学联事件，又称“二一九”。我们决定组织营救。当时决定由隐蔽在国民党电台工作的孟昭仁同志，密电向武汉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报告，又以李策同志家属丁毅的名义，公开用明码电报拍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同志报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公开营救，揭露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进一步发动群众。很快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分别致电贵州军政当局，证明黄、李等是十八集团军的干部，要求立即释放。国民党反动派口头上答应放人，实则刁难拖延。这时八路军贵阳兵站已经建立，兵站负责人袁超俊又继续交涉督办，但国民党仍拖延不放。黄、李等四人于狱中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他们被敌人秘密杀害了。

省工委在这一时期，根据中央指示，认真分析了贵州形势，理清了各地党的组织状况，停止了武装活动。党主要是通过和利用社会上公开合法的一些团体和组织进行工作。党员黄奇鑫、任虹、方士新、杨斌毅等在筑光音乐会，沙陀剧社中活动；社会进步知名人士田君亮、梁元东、郭一琴、吴澄华、高韬等一批大学教授和作家，在党员何战白等的联系下，出面积极争取建立了中苏友协；刘方岳在党员蒋蕩如等的参加下，组织了社会科学讲座。党还利用红十字会、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俄文补习班、时事讲座等，开展活动。党员王启霖在社会职业掩护下，开展县政促进会的活动。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建立，由吴之平、郎德服、陶浩三人负责，工作完成得很好。生活、读新书店建立了党的支部，熊蕴竹任书记，公开工作很活跃，而党的秘密工作一直没有暴露。这一

时期，贵阳县委书记先后由谢凡生、陶信镛担任；思南县由肖次瞻、熊大瀛负责；安顺县由谢速航、杨斌毅领导；遵义县由杨天源、湄潭县由陈光型、金沙县由李少夫、兰芝夫、镇远县由田伯萍负责领导，各地工作都有较大发展。通过群众活动，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推动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

为了积极培养和输送干部，一九三八年三月省工委决定派徐健生、周晓山、张震生等同志第一批赴延安学习，介绍他们到当时尚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转送去延安后，由徐健生代表省工委向中央汇报了当时贵州党的工作情况。此后即分批选送党员和革命青年陆续去延安学习。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从武汉派张益珊到贵阳开展民先工作。组织工作、活动方式和内容都由民先武汉总队部直接布置。由于当时贵阳民先领导人同贵州地下党没有接上党的关系，我们只好派出一些党员以群众面目出现参加进去，设法接触其领导人，引导民先工作的正常发展。但民先活动早被敌特注意，企图一网打尽。同年八月，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登报通知，要一切抗日团体登记。民先领导人未能识破敌人的阴谋，希图通过登记，借以争取合法地位和公开活动的权利，遂自行交出民先的部分名单进行了登记，并于八月十三日集合民先队员七十余人，打出民先的旗帜，集队前往国民党省党部指定的贵阳民众教育馆集中。队伍到达后，立即被军警武装包围，中统在贵州的特务头子借口将民先成员集中训练送到抗日前线，实质是将他们逮捕起来，不让他们活动，民先队员据理批驳抗议，群情激愤，反动派理屈词穷，竟横蛮逮捕了民先领导人和一些成员共三十多人。事情发生前夕，地下党

获悉民先已登记并要游行集会，当即布置派往民先中进行工作的党员黄慧珠进行劝阻，未被民先负责人采纳。事后，地下党才接到张益珊的党的关系，而他已被捕入狱。一九四一年他和另一民先负责人凌毓俊被敌特杀害。其他被捕的民先成员于一九三八年秋全部释放。民先遭到破坏，由于其中党员的身份未公开，没有影响地下党组织，而在斗争中一些表现坚强的民先成员，后来经过审查先后加入了党。

四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发动了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〇年三月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第二次反共高潮即将到来，情势十分危急。党在这种情况下，紧急组织疏散隐蔽，一部分经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先后护送去延安；一部分早在一九四〇年初输送到新四军；一部分转省外隐蔽活动，但暂不转党的组织关系，叫转地不转党；一部分就地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保存了党的力量，防止了敌人的大破坏。一九四〇年四月，南方局调我去延安。省工委的工作由邓止戈负责。一九四一年春，南方局曾派张叔成来与邓止戈、肖次瞻负责贵州工作。“皖南事变”后，邓止戈离黔，肖次瞻牺牲，贵州工作由张叔成、杜守敦、陈又平、刘载铭、黄齐鑫等人负责联络、疏散工作。同时，张叔成、陶含春在桂林，陈又平在重庆，杜守敦在昆明，刘载铭在贵阳，具体负责地下党员的疏散、联络工作。刘载铭同志一直坚持斗争到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贵州地下党坚持长期斗争，分散隐蔽各地的党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利用一切可能条件，积极进行工作，成功地贯彻了党的隐蔽精干方针。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发生，贵州地下党随即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白色恐怖笼罩全省，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打击进步力量，进步人士和进步青年被威胁、殴打事件不断发生，被捕关押多年的黄大陆、李策、张益珊、凌毓俊等，新近被捕的肖次瞻、陈光型、陈法轼、李少夫、兰运斌、王定一、冠叔彭等十多人都先后被杀害。另有极少数人动摇、消沉，甚至有的叛了党。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同当时在遵义尚稽的地下党员赖映棠，在浙大的地下党员李晨联系，直接领导当时在贵州遵义，涪潭的浙江大学的地下斗争。

在一九四四年初，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新进攻，八个月内从河南打到广西，进逼贵阳，在日军占领独山以前，贵州地下党着重于准备组织武装抗敌，建立了黔东、黔南地区民间武装力量，一九四五年日寇撤出贵州，根据中央指示，原来准备打游击的党员又重新隐蔽。

解放战争后期，一九四八年秋，华南局一方面派回贵州地下党疏散到川东的党员张立和同时调来的刘镛铸返黔负责；后又派宋之平、张鸣正等人由四川来贵州协助张立工作；一方面陆续派姚国安、安毅夫、梁燕等人来贵阳工作，并由他们三人组成贵阳特别支部，直属华南局领导。同时向国灵、温凯庭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由四川来黔单线工作。邻省边界处，如川南与黔交界的赤水一带，有廖林生、周生；黔滇边界有龙腾霄、王纲正、龙德霖、段一方、王秉璠黔桂边界有黄焕民、熊亮臣等领导的武装力量，组织群众，开展斗争。同时，抗日时期就地长期隐蔽下来的党员也积极利用社会职业的掩护，自觉进行工作。这段时期，地下党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反美反蒋的民主运动，在蒋介石集中其兵力进攻解放

区，他的后方空虚的情况下，组织民变武装牵制蒋介石，呼应解放战争。在武装工作上，黔东北游击纵队、黔北游击队、安顺、紫云、长顺游击纵队、盘北游击大队、盘县游击团、兴义游击团、安龙游击团、威宁游击团都有发展。一九四九年王舍人等组织发动的郎岱暴动，以及其他地方的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使蒋介石腹背受敌，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大军南下西进。

在国民党反动派从贵州溃逃前夕，地下党为保护城市、使工厂免遭敌人破坏，发动群众组织了护厂、护校，保卫人民财产的斗争。从抗日战争时长期隐蔽埋伏的党员陈廷维、张振声等，此时积极策动贵阳电厂经理奚长年，晓以大义，组织工人护厂供电，在工人、技术人员积极主动的参与下，实行武装护厂，使企图破坏电厂的反动军队的计划未能得逞，成功地保护了电厂，坚持供电。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时，全城人民张灯结彩，一片光明，迎接解放，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嘉奖。

李光庭、李长青等同志在卢山、凯里一带，执行党中央隐蔽精干政策，长期埋伏，此时则率所带的武装迎接卢山解放。毕节、威宁、安顺、盘县、遵义、湄潭、赤水、松桃等地区在党的积极争取下，促成了一些国民党部队的武装起义。

国民党反动派愈临近死亡愈疯狂。伪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和驻贵阳的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他们都准备毁灭贵阳。由于我人民解放军的进军神速，地下党和革命群众多方保护，才使贵阳得以保存下来。尽管如此，反动派还是对革命者疯狂镇压。这一期间，被杀害的优秀共产党员有岳恭彦、王启霖、张凤鸣等二十余人。为了贵阳人民的安全，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号召，组织维持贵阳治安的负责人、西南知名人士卢涛先生，也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杨勇、苏振华同志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张立同志代表贵州地下党在贵阳胜利会师。深受压迫剥削，历尽千辛万苦，贫穷落后的贵州各族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信心百倍地建设祖国，建设家乡，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昂首阔步，奋勇前进！

陈克寒同志早年革命活动片断

齐 速

一个共产党员忠心耿耿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一生，即使是极平凡的一生，也是很光荣的。

我和克寒都生长在上海，相识于一九三三年，那时他十六岁，我也只有十八岁。三四、三五两年在一起做地下工作。克寒这一段早年的革命活动，当时知道的人就不多，现在就更少了，我把它记下来，作为对克寒的悼念和纪念。

陈克寒，浙江慈溪人。他曾讲过：父亲早年只身从家乡到上海当裁缝，后来在法租界西门路上开了家小成衣铺子，但家里人口多，境况不太好。克寒在通惠小学念完高小后，就不得不出去做事。但他自小勤奋好学，他的字写得很好，国文也不错。有一个在报界工作多年的亲戚介绍他到国民党办的《晨报》馆当练习生。克寒年纪不大但有痔疮，所以在椅子上放了一个软垫，不料有一次被当时《晨报》馆负责人——国民党市党部头子之一的潘公展看见，立刻不问情由地大加训斥，克寒不服，争辩了几句，于是被辞退了。他那亲戚不错，又把他介绍到《大美晚报》做事，到我认识克寒时，他已是《大美晚报》的外勤记者了。

三十年代初，上海是外国人作威作福的地方，上海的租界可以

说连殖民地还不如。比如说当时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但上海的印度和安南巡捕却可以欺侮中国人。外国人统治久了，就会出现一些拍外国人马屁的人，连年轻人也不例外，比如当时有一些上海人就以替洋人效劳为光荣，说起话来夹几个外国字就自命不凡。当然也有少数青年讨厌这种情况，想加以改革，但又不知从何着手。克寒身入社会早，他的职业使他接触到的社会面比较广泛，从各阶层到租界上的工部局、捕房，以至国民党的法庭他都去采访。他知道的黑暗多，有时就不禁要问：“光明在那儿？”他目击当时日本兵的蛮横和国民党的不抵抗，就担心地想：“怎样才能不当亡国奴呢？”克寒不是醉生梦死的青年，他自幼比较严肃，心底善良，好思索好学习，想探索个人和国家的出路。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青年，靠自己勤奋学习，十六岁当外勤记者，但并不是那种为自己和家去向上爬的人。

我和克寒是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的英文夜校中认识的。我们在一起学习社会科学的书籍。当时上海的租界上，如四马路的旧书店还可以买到一些进步书籍，如《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讲话》、《辩证唯物论教程》等。克寒看书快而理解力强，他有社会实际可以联系，进步很快。一九三三年冬，克寒参加工人夜校的工作，当时我们在法租界和虹口办了两个工人夜校，克寒白天当记者，晚上奔波于两个夜校，非常热情和积极。通过工人夜校工作，与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发生关系。上海左联当时除创作和理论研究外，还有一个工农教育委员会，从事于工人夜校、工人读书班、郊区农民小组等工作。左联除常委会外，也有区的组织，如沪西、沪东区、法南区等。法南区是法租界和南市的意思。虹口在沪东，属左联沪东区委领导，先是何家槐的区委书记，后何升任常委、组织部副

部长，书记由周钢鸣担任。下面是街道小组，克寒曾任组长。除在夜校教书外，有时还和林耶两人深夜去工人区贴标语和撒传单。他当时是记者，每月有几十元的收入，他很慷慨，对夜校经费的捐款，对生活困难的同志的帮助是很多的。但他自己的生活很朴素，和当时没有职业收入的同志或流浪者一样，每天过两角钱的生活，早上一碗豆浆一个饭团，八个铜板；中午两碗米饭，一个黄豆豆腐或菠菜猪肝汤，二十二个铜板；晚上在粥店吃粥加一碟小菜，所以两角钱够了。他剩得的钱都交给他母亲，帮助他父亲维持家用。

克寒除搞工人教育外，也从事文艺工作。他在聂绀弩和叶紫编的《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上，用李肖为笔名发表过不少杂文。记得有一次在八仙桥青年会礼堂开大会，会议本来是李公朴的主席，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反动头子潘公展突然光临，非要上台讲话不可。只得让他讲。这家伙无耻挑衅说：“我是赞成唯生论反对唯物论的，谁要是不服气，欢迎上台来公开辩论！”他好像很开明讲民主，其实谁不知道他来早时早已布置了便衣特务，谁会去上他的当呢？回答他的是震天的口号和飞舞的传单。第二天克寒在《动向》头条写了篇杂文，辛辣的讽刺了他那个过去在《晨报》馆的上司，记得杂文四周还特加了个“花边”。三三年底，国民党成立了个什么“铲共团”，专门同左翼和进步的书店或团体作对，办法是突然来一帮打手，打碎价值几百元的大玻璃。有一次神州国光社就遭到了袭击。克寒去采访后写了篇报导登在《大美晚报》上，文中有扬长而逸之句。这篇报导被鲁迅先生在《准风月谈》杂文集的后记中引用，且说：“扬长而逸写得最有趣。”克寒看到后非常兴奋，因为他对鲁迅先生是非常尊敬的。

一九三四年“九一八”纪念日的晚上，“文总”预先决定所属

各团体举行一次示威游行。虹口街道小组由当时左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何家槐同志亲自布置，林耶负责撒传单，克寒率领虹口和法租界夜校中进步同学参加游行。预先规定家槐把大衣领子往上一翻大家就跟着他走。示威地点是从卡德路的卡德电影院门口开始，到泥城桥解散。当晚七时，卡德电影院一场电影散场，影院门口和马路上挤满了人群。忽然，一个电灯泡在柏油马路上“轰”的一声碎了，一个沙嗓子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站在台阶上的林耶把藏在袖管里的传单往空中一抛，何家槐把大衣领子往上一翻，队伍就往泥城桥冲去了，沿途口号声震天响，传单满天飞。那天的示威是几年来少见的，各团体到的同志不少，克寒带了一些夜校同学在队伍中最活跃，等到敌人的囚车呜呜的开到时，大队已分散，未受损失。克寒被一个巡捕拦住，但他沉着地掏出记者证，说是恰巧路过此地，正想采访一番，那巡捕无奈，只得放行。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陈克寒同志被吸收入党。在他提出入党申请时，组织上曾要求他去国民党部队当兵，做兵运工作。克寒表示只要能入党当兵也行。其实他身体很弱，但入党的决心是坚强的。克寒加入党组织后，分配做情报工作，组织纪律和机密性比一般地方组织严得多。克寒从在左联工作开始，他的记者工作就被革命工作耽误，终于被《大美晚报》辞退。党组织要他再去找他那个亲戚，最好还是在新闻界找个职业，以便于党的情报工作。克寒去找他那个在上海新闻界多年的亲戚，结果在南京路大陆商场二楼的一个通讯社谋到了一个文书的职位。他进去不到一星期，就探知这个通讯社其实是国民党将领蒋鼎文设在上海的一个情报站。他们每周要克寒复写一次情报，克寒总是偷偷的多复写一份，下班后立即交给我，我又交给陈雷同志（现任山东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可惜这个差事搞了不到三个月，由于一个偶然的不慎，克寒同志不得不撤走。原因是当时从安徽省的游击队出来两个同志，他俩才到上海一时未能安排好工作，组织上叫我给他们一些文件看，让他俩一面学习一面等待分配。他俩在一个绸厂内有几个当工人的同乡，那个厂正在搞罢工，他俩就去参加。本来我们的组织是不允许参加地方上的活动的。他们问我借公园派司，我自己没有，就向克寒要了他的公园派司转借给了他们，可是克寒的公园派司上填的是他的真名和在大陆商场的公开职业。不料这两位安徽同志由于参与罢工，与工厂中的亲戚一起被英租界捕房逮捕，身上带着克寒的公园派司。幸好我及时知道了此事，立即请示陈雷同志，经指示后便通知克寒称病离开了那个通讯社。

这样，上级又决定派克寒到福建去工作。克寒走后不久，一九三五年七月上海党遭受一次较大的破坏，不得不疏散一些人到外地去，这样我被派往四川重庆，从此与克寒不在一起了。

后来听别的同志讲：克寒到福建后，一面做情报工作，一面在国民党的一个县政府内工作以为掩护。不料那个县的农民起来暴动，冲击县政府，克寒无法暴露自己，又恐农民不谅解，只得从后楼跳出窗外，从县政府走脱，经领导同意回到上海。到上海后，直接在邱吉甫的领导下工作。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邱吉甫被捕，幸好夜校女生，这时已入党的吴竞同志事先得到从敌人内部传来的情报，立即通知了克寒，克寒又一次免于被捕。这以后克寒曾到重庆工作一段时间，在一个通讯社内工作。通讯社的社长是个老同志，他领导克寒一面在重庆新闻界展开合法斗争，一面向上海党提供情报。到一九三六年夏，克寒从重庆调回上海，那时上海党已与陕北中央联系上，克寒和几个同志一起去了瓦窑堡。他曾经在红军大学最后一期

学习，又在延安《新中华报》工作，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后到了山西前线，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一段，后奉周总理的命令调武汉《新华日报》工作。他到晋察冀采访，写过一个《晋察冀印象记》，那是第一篇系统的介绍晋察冀边区的报导，以后他在太行山《新华日报》华北版任副社长，辗转敌后，其时也不过只二十二岁。一九四二年他回延安，在中央党校二部被审查，但他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好了，以后许多事，别的同志比我知道得多，我就写到这里吧。

（一九八〇年九月）

同林彪反党集团 英勇斗争的王诤同志

李 而 炳

一九六八年八月，祖国的上空乌云滚滚，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四机部部长王诤同志毅然站了出来，公开写下了三张反对林彪的字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四机部部长王诤同志去世的时候，党中央在悼词中称誉他为“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斗



叶剑英同志和王诤、秦岩同志合影

争的英勇无畏的战士。”下面记述的，就是王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反党集团英勇斗争的事迹。

王诤同志江苏武进县人。一九三〇年参加革命后，就一直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创建通信部门的工作。他以卓越的成绩赢得了党的高度信任。但是，这样一位忠诚的战士，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残酷的迫害。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王诤同志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经常被揪斗，无法开展正常工作。周总理只好把他接到中南海作短暂的休息。四机部的一些造反派就围攻中南海，逼迫周总理交出王诤，甚至还贴出了矛头指向周总理的反动大标语。开始，周总理派人耐心地说服他们，要他们回单位闹革命，不能随便抓人。他们不听，最后周总理亲自出面，严厉地批评了他们。但是不久，周总理也无能为力了，王诤同志被非法关进了“牛棚”。

这场暴风雨来得如此突然、迅猛，使人来不及认真思考就被卷进去了。在“牛棚”里，王诤同志开始认真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一方面，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倒了，周总理和朱老总都受到了攻击。而另一方面，林彪却爬上了接班人的尊位，还要人们高喊什么“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是为什么？王诤同志紧张地、反复地思索着，本来对林彪就没有好感的王诤同志渐渐地看清了林彪的野心。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下定了为捍卫真理而战的决心。他想过自己可能招致的灾难，想过老婆孩子会被株连，但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一九六八年八月，在专案组审讯他时，他郑重地讲出了经过长时间考虑的三点意见，

“我认为，自从反多中心论的问题提出以后，提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比提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好些。因为这样，突出了以毛主席为中心。林彪他自己也讲过，要以毛主席为轴心，我们作磨盘嘛！”“林彪犯过错误。”“至于你们问我林彪犯了什么错误，我只能简单地告诉你们两点：第一，他历史上犯过错误，第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他在支左中犯了错误。”专案组人员听后大吃一惊，他们问：你敢说，敢不敢写下来？王净同志毫不畏惧，毅然挥笔写下了上述内容的三张字条。

之后，灾难接踵而来，对王净的批斗升级了。触及灵魂的“革命”变成了对皮肉的折磨，让他跪下他不跪，让他低头他不低。有一次批斗之后，脸被打肿了，嘴上流着血，腰直不起来，经三〇一医院检查，腹内有积血。被送到河南叶息“五·七”干校后，他除了被迫参加大量的体力劳动之外，就是接受频繁的批斗。每天的菜金只有几分钱，本来很瘦弱的王净同志只剩下皮包骨了。最后不得不住进了平顶山煤矿工人医院。

在逆流滚滚的日子里，王净同志始终对党抱着坚定的信念，坚信林彪一伙的倒行逆施是不会持久，真理终会见光明。在“牛棚”里，王净同志孜孜不倦地读毛主席的书，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坚持摘抄了几百页毛主席语录，设法转送给他的夫人秦岩同志。当拿到这本语录的时候，秦岩同志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这是用血写的，它浸透着王净同志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凝结着多年共患难的革命情谊。在平顶山煤矿工人医院里，他保持着一个老革命的高尚品质。他心里想着群众，处处注意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在那“踢开党委闹革命”，“不为修正主义生产”的年月，一切规章制度废

除了。医院里到处垃圾满地，厕所里臭水横流。王诤同志病情稍好，就一个人把病房的周围和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天天过去了，同院的工人病友们开始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这个默默无闻的老人，他们好奇地打听这个人是谁？工人们很快清楚了，他就是满街大字报，名字上打了“×”的四机部部长。工人们困惑了，这样的好人怎么会是“走资派”，怎么会是反革命呢？同情、尊敬、不平，终于迸发出正义的呼喊，几十名工人联名给周总理发电报，声诉王诤同志是革命的好干部，决不会是“走资派”！

在医院里，王诤同志和工人们促膝谈心，启发他们正确对待革命和生产，和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工人们把他请到家里，用红薯招待他。王诤同志吃着工人兄弟的红薯，觉得又香又甜。直到他重新工作之后，工人们出差来京，还忘不了给他带点红薯来。一九七八年，王诤同志因患癌症生命垂危，平顶山煤矿工人闻信后，十分痛心。当得知急需AB型血时，他们自发地献血，并发来电报，说随时可以送来北京。王诤同志去世后，治丧委员会作为特例，批准他们派两位代表来京参加了王诤同志的追悼会。

王诤同志身在河南“牛棚”里，心向着北京。天天盼着毛主席、周总理发来指示。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在林彪死党李作鹏的授意下，四机部军管会上送了将王诤从河南干校拉回北京游斗，然后定性关押的报告。给王诤同志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自然，反对林彪当列首“罪”。毛主席得知后，作了“王诤同志是有功的，处理要慎重”的指示。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当即作了长段批示：“王诤同志建立红军电信是有功劳的，对他的处理要慎重”。指出，对王诤同志上纲过多，过高。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象阳光照亮了黑暗的小

屋，温暖着王诤同志的心。使他更加坚信，党性不可侮，真理不能灭。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使林彪反党集团进一步迫害王诤同志的阴谋未能得逞。

斗争并没有结束。林彪死党李作鹏及其一伙，自以为有林彪的支持，自以为手握王诤反林彪的三张条子，有恃无恐，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阳奉阴违，迟迟不作传达。由于王诤同志在几乎每一次批斗会上都旗帜鲜明地揭露他们的错误，所以他们很害怕王诤同志回到北京。当王诤同志病重，要求回京治病时，他们又作出了“以黄河为界，不能过黄河”的禁令。又是周总理了解了这一情况，指示要王诤同志回京治病。他们的阴谋又一次遭到失败。

王诤同志回到北京后，林彪反党集团仍抓住他反林彪的三张条子不放，逼他检查反林问题，说什么“江青同志讲，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革命，即使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写。”王诤同志听后针锋相对地说：“还有比这更恶毒的，林彪架空毛主席、周总理，要搞政变。”这句一针见血的话，击中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要害，使林彪死党暴跳如雷，报之以更加疯狂的反扑。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晚，林彪反党集团的三员大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亲自出马，在西山召见通信兵部和四机部军管会负责人。在会上他们还是抓住王诤反林彪的三张条子，抓住那句所谓比三张条子更为严重的话，咬牙切齿地说：“毛主席说王诤有功，不等于他政治上不反动！”黄永胜还破口大骂说：“王诤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革命！欠账要还利息，王诤决不能回四机部，部长不行，副部长也不行。”这伙口蜜腹剑的家伙，口口声声说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可是在违背他们的意愿时，连半句也不顶。

在林彪反党集团的疯狂抵制下，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迟迟不予落实。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林彪自我爆炸之后，在李先念同志再次过问下，王净同志才恢复了组织生活。

面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种种诬陷和残酷迫害，王净同志坚贞不屈，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高尚情操。被林彪一伙长期治“罪”的所谓反对林彪的三张条子，成为王净同志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英勇斗争的历史见证。

是江青、康生一伙害死了他

——王美兰谈李六如同志

黄 霭 玲

当我访问知名的革命老前辈李六如的夫人王美兰同志时，她告诉我的第一句话是：“六如同志平反了！党中央为六如昭雪了！”

李六如同志早年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是同盟会会员，一九二一年即由毛泽东、何叔衡两同志介绍入党。他经受过枪林弹雨的考验，也曾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过，特别在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长期间更是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他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线索写了一部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深受读者的欢迎。但是这位老战士却在十年浩劫中受尽折磨，最后含恨离开了人世……。

美兰同志向我叙述了六如同志及其一家的悲惨遭遇：

“六如同志十年浩劫中所受的迫害，正如人们常说的是事出有因”。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期间，六如得罪了两个人，就是江青和康生。

“在六如任毛主席的秘书长期间，服务人员常因江青蛮横无理、反复无常而感到为难，长期敢怒而不敢言。六如考虑再三，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决定把大家的意见向主席作一次汇报，提请

江青注意。没想到说话间，江青闯了进来，有些话被她听见了，顿时大叫大嚷、又哭又闹，说是毛主席和六如同志合伙来欺负她。还拍着桌子说：“李六如，你没有资格批评我！”毛主席喝她住口，并说：“秘书长比你参加革命早得多，你摆什么老资格！”事后，毛主席要江青向六如同志道歉，江青执意不肯。从此，江青每次遇见六如，都昂首而过。六如也从不给她陪笑脸。

“五十年代初，六如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副检察长兼党组书记。一次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见到毛主席，江青当时也在座。六如以为事过境迁，出于礼貌，问道：‘江青同志身体好吗？’那知江青把脸一转，理也不理。毛主席忙从旁插话，才结束这尴尬场面。‘文化大革命’期间，每当听到江青煽风点火的讲话时，六如就叮嘱我做好思想准备，以应付最坏的情况发生。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六如这个人不管对谁，有意见就提。他曾对当时过左的行为提出过一份书面意见，康生当时就不接受，由此怀恨在心。

“一九六四年，因为六如是平江人，虽曾一再推却，还是在《平江革命斗争史》一书编委会里挂了个主任的名。书中记叙了平江起义的经过，却只字未提领导者彭德怀同志，但还是被扣上‘替彭德怀翻案’的大帽子，挂名的主任当然地成了罪魁，因而也从全国政协常委降为一般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天，一群造反派抄了我们的家，并要揪斗正发烧卧床的李六如，说他是‘叛徒、反党分子’。我问：‘你们有什么凭据？’其中一人脱口而出：‘是康生同志说的，你还要什么凭据？’提到这个专门整人的阴谋家，我能说什么呢？原来康生在一次接见湖南造反派时指名道姓地说：‘李六如是反党

分子、叛徒’并特别点明说：‘就是写《六十年的变迁》那个李六如。’

“一九六九年，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后不久，作为‘叛徒和反党分子’的李六如和我不由分说地被送出北京。临行前，我苦苦要求把年仅十三岁的女儿带走，但遭拒绝。致使这个女孩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最后惨死在西藏高原。

“我们被软禁在广西山区里，不许通信，不许串门，不许走出一定的活动范围。夜里，经常有人向我们住处扔石头，使我们俩惶惶然不得安宁。

“六如生前常说：‘不写完《六十年的变迁》我死不瞑目！’但他眼看自己已年逾八十，余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一种欲写不能，欲罢不甘的焦灼之情，始终折磨着他，精神极为苦闷。每当阴雨连绵的长日，更添人愁绪。六如便常常仰天长啸，声音又响又长，以致邻近的人都奇怪地问：‘老头儿怎么这样子叹气呀？’而我，听到他的声声长叹，便凄然泪下。同时禁不住怒从心中起：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这个革命了一辈子的老人？

“一天，六如少有地拿起镜子，照看出镜中自己头发长长，胡子拉碴，活象个囚徒的样子时，悲愤地用手指点着镜子说：‘为什么还不死！为什么还活着！’说罢老泪纵横。但是，考虑到《六十年的变迁》宿愿未了，更盼亲眼看到康生、江青一伙的末日到来，因此，他顽强地挣扎着。

“一九七一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毛主席曾问起李六如的下落，周总理亲自查问，终于批准我们回到北京。六如闻讯后真是喜出望外，话也多了，脚步也轻快了，真是‘漫卷诗书喜若狂’，催促我尽快一起动身。他满以为林彪垮台了，情况也许好转了，没想

到，一出北京站，竟是一辆在修的破车和两张冷漠无情的脸在迎接他。六如心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风烛残年的老人，再也经不起接踵而来的打击了。他的病迅速恶化，人越来越瘦，腿越来越肿，诊断为晚期肺癌。在那嘈杂不堪的大病房里，六如受不了周围人的冷眼，又回到家里。不久病危，我只得向隔壁某单位借来一辆拉货的三轮，把他拉到医院去。临终前，他用发硬的舌头，声声呼唤着：毛主席！周总理！老同志！……悄然离开了人世。”

王美兰同志心中充满了悲痛，但她继续说道：

“因人又祸及其书，曾在五十年代蜚声文坛的《六十年的变迁》，因书中写了刘少奇同志在安源的革命活动，被诬为‘反党小说’；当然，即使书中没有这一段，也会找出别的理由来。又因书中主人公季交恕即为李六如三字所变，被诬为‘为叛徒树碑立传’，书遭‘枪毙’，从此在国内书店绝迹，图书馆亦难找到幸存者。

“六如晚年倾全力创作的《六十年的变迁》毕竟没能写完。第三卷计划用二十多万字去讴歌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可惜只写了八万字。

“但是，严冬终要过去，春天定要到来。现在，六如的冤案昭雪了。《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第二卷即将重版，第三卷遗稿亦将同时与读者见面。前两卷还被改编为电影剧本。这对已故的人来说是个珍贵的纪念，对后人也是个有意义的教育。”

听完王美兰同志的长谈，我想了很多。一位为革命奋斗了大半生的老前辈，竟在十年浩劫中惨遭江青、康生一伙的诬蔑迫害，不幸早逝了。然而，象李六如这样遭遇的人又何止一个！

教训是深刻的。

红九军团的建立与沿革

苏 士 甲

红九军团在中央红军中是一个新的军团。它刚一建立，便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火之中，因此有关红九军团的文字材料至今甚少。好在尚有一些老同志健在，现把他们的回忆，结合有关的文献材料，简要地整理出来，仅供参考。

三十年代初，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入发展，“围剿”反“围剿”的斗争日趋尖锐，为保卫革命、保卫中央苏区，扩大红军势在必行。一九三一年，粉碎敌人三次“围剿”之后，毛泽东总政委与朱德总司令商议：再建立几个军团。一九三三年冬战局更紧，中央红军便先后建立了七、八、九三个军团。

红九军团是根据中央一九三三年十月下旬的指示，开始组建的。由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委。翌年元月三十日，红九军团在江西省黎川县樟村举行了成立誓师大会。这时参谋长为郭天民，政治部主任为李湘怜（李涛）。该军团由三师和十四师组成，以三师作基础。师部编制取消，直属军团部领导。

三师：

一九三三年五月，根据苏维埃军委命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警卫团（中央模范团）、模范一师二团和瑞金新兵师、

一军团随营学校（教导队）合编为一军团三师。周昆和蔡树藩担任师长和政委，刘英为政治部主任。成立后继续在赣南、闽西南线作战，不久参加第五次反“围剿”，归建红九军团。先后在安远、会昌、筠门岭等地进行游击战争。翌年，参加广昌等战斗。

三师下辖七、八、九三个团。

七团由中央政府警卫团（一九三三年初中央政府警卫营扩编为警卫团，又即中央模范团）等组成。下辖三个营：一营即原中央政府警卫团，由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组成。这是个老部队。它的前身是总前敌委员会特务大队（一九三〇年八月成立，担任保卫毛泽东同志的任务）。二营是在一九三二年底由红军学校的“无产阶级团”（因为学员均由农村和小城镇选调来的手工业工人和雇农而得名）改编成的。由四个连组成，排以上干部都是由红军学校派来的。三营由闽粤赣新成立的红军两个小独立师合编为四个连组成的。这个营的排连干部基本上都是红军学校第三、四期的毕业学员。七团第一任团长龚楚，政委伍修权，参谋长原七军二十师师长黄子荣，政治处主任庄振凤（庄田），团总支书记周生珍（周彪）；第二任团长（待查），政委方强；第三任团长刘华香，政委庄振凤；第四任团长冯玉良（三八年在河南某游击区牺牲），政委周生珍。遵义会议后部队整编，团总支书记为吴融峰。

八团由中央模范一师二团改编。二团班长以下人员，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从俘虏中挑选其成分和表现都好而自愿当红军的。排连干部是由红军学校第四、五期毕业学员中挑选的；营团干部是由上级调来的。该团组成于瑞金。第三任团长杨梅生，第四任团长崔国栋。这个团的第一任政委是谢季芳，之后是辛世修、刘生胜。

九团由一军团随营学校（教导队）和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成立的瑞金师（新兵）合编组成。该团班长以上人员都是一军团随营学校的人员担任。这个团第一任团长是王玉凤（亦说王玉洪，一九三四年四、五月间在福建省连城县内的温坊反击战中牺牲）；第二任团长是李国柱（担任过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第三任是刘华香（原七团团长）；该团第一任政委姜启化，后在四方面军西路军征途中牺牲。

十四师：

原师长程子华，后为张宗逊，政委朱良才，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一九三四年春第五次“围剿”中，在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战役后，全师编散，其中两个团编入一军团，一个团编入三师。此时，九军团仅一个三师。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九军团在右后侧担任掩护全军的任务。同年十一月长征到达湘兰山时，奉中革军委的命令，改编八、九军团，并分编二十一师、二十二师，二十二师两个营补充九军团，两个营补充一军团，一个营补充五军团，并把这两个师的电话队补充给九军团一排人。这时九军团仍一个第三师，辖三个团。一九三五年一月，根据遵义会议精神，部队进行整编，精简机构，充实连队，九军团把三个步兵团改编为三个步兵营（仍以团称呼），编余的班以上干部集中起来，组成一个教导营。时军团政委为何长工。遵义会议之后，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前，红九军团的任务是策应主力长征，执行后卫任务。

一九三五年夏初，一、四方面军会合，在八月的毛儿盖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分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九军团划归左路，于九月被张国焘改编为三十二军。军领导人按原任。但在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率左路军阴谋南下的途中，先后撤换了军的领导人，李

干辉接任何长工的政委，朱明（原九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长）接任黄火青的政治部主任，以后又换辛世修（原八团政委）为主任。一九三六年二、六军团长征至甘孜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合，二、六军团奉中央命令，在这里于七月二日成立第二方面军。贺龙同志按照朱德同志的意见，以向二方面军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为理由，巧妙地把三十二军从张国焘那里要归第二方面军。这时，军长仍为罗炳辉，政委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李干辉。辖两个师，原二方面军的五师编入该军为九十六师，师长王尚荣，政委谭友林，参谋长刘华香，政治部主任余宜光。三十二军原三个营（团）改为九十四师，师长肖新槐，政委辛世修，参谋长彭上坤，政治部主任曹家庆。军的番号未变。长征到甘肃后，参加了由刘伯承、邓小平负责的援西支队，于三七年的五、六月间又回到三源，仍归二方面军指挥。

一九三六年底，三十二军在怀县奉命整编，取消师部，九十四师部队和军直属队缩编成二八〇团、二八二团，九十六师部队缩编成二八六团。团由军直辖。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以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我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十二军为一二〇师（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三五九旅（陈伯钧为旅长，王震为政委）七一八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二八〇和二八二团编为第一营，二八六团编为第二营，同时以中央警卫营两个连和前总特务团三营的两个连组成第三营。一二〇师开赴抗日前线，留下七一八团归陕甘宁留守兵团（主任肖劲光，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参谋长曹里怀）指挥，后来改为警备一旅第一团，团长龙将元，政委余非，之后团长陈文

彪，政委谢德忠。在陕甘宁边区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八年，胜利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光荣任务。同时，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建设边区。这期间曾先后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接见，部队受到很大鼓舞。

一九四五年六月，警备一旅和留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五九旅（老三五九旅已于一九四四年随王震同志南下）南下，至河南省济原县境时值日本投降，此后奉命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当年十一月部队到达锦州和冀热辽军区的三十旅合编。警备一团与原三十旅所属之一四七团合编为六十六团（团长张荣森，政委任荣）。八月在古山、黑水改称为独立十六旅四十七团，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在辽宁建平县编为东北民主联军八纵二十三师六十八团。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师在辽南腾鳌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四〇一团。在解放战争中从东北一直打到祖国的南大门，把五星红旗插上了万山群岛。这支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参加了甘、青平叛，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这支部队从它成立那天起，就受到党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培育，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周恩来同志曾称誉它为“战略骑兵”。这个部队南征北战，驰骋疆场，足迹遍布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参加大小战斗两千多次，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保卫祖国、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了不朽的贡献。